



维吾尔自治区
人权报告





维吾尔自治区 人权报告

Huseyin Rasit Yilmaz
Ilderya Avsar
Mehmet Yegin
Rabigul Hacimuhammed

目录

1. 前言	6
2. 中国在维吾尔地区做了什么?	7
2.1 安全化与汉化	11
3. 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些?	14
3.1 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14
3.2 打击“民族分裂主义”	17
3.3 全球霸权	18
4. 维吾尔自治区的基本自由	20
4.1 母语教育问题	20
4.2 信仰自由	21
4.3 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	25
5. 集中营	28
5.1 集中营的种类	28
5.2 后现代时代第一个集中营实验	30
5.3 大规模拘留的开始: 2016-2017	34
5.4 集中营的物质条件	36
5.5 集中营里的女人们	50
5.6. 奴役劳动中心	56
5.7 儿童集中营	62
5.8 海外的维吾尔人	64
6. 对家庭结构的干预	69
7. 针对女性的强制绝育政策	72
8. 维吾尔自治区的器官贩卖	74
9. 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77
10. 国际法中的集中营	79
11. 文献	90

1. 前言

维吾尔自治区人权报告的重点是由我们在2021年2月至6月间对集中营直接受害者在内的53人进行面对面和在线访谈的记录组成。接受采访的证人来自12个国家（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巴林，丹麦，芬兰，发给，荷兰，英国，哈萨克斯坦，挪威，土耳其）。采访对象中，维吾尔人42人，女性19人，集中营直接受害者6人，受害者亲属40人。经受访者同意，录制了70多个小时的视频记录。

报告的正文由阐述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与其背后的目的开头，分析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的维稳措施从911袭击事件前后开始的历史背景。剖析中国共产党如何操纵全球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来打压维吾尔人为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给他们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尤其是2009年之后，随着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进一步剥夺，母语教育、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遭到彻底破坏。所有这些在本报告受访者的证言证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证。

报告中，根据被关押在这些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受害者亲属的经历，详细分析2014-2016年期间零星出现，2016年底开始随着大规模逮捕变得普遍的集中营内幕。集中营物质条件之恶劣已经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未见的程度，而这些在报告里通过幸存者陈述的酷刑和性暴力的例子体现了出来。另一个角度，由于其父母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儿童被中国政府“没收”或设置儿童集中营的事实也在报告中专门分一个章节进行探讨。被关押在这些集中营的儿童完全远离他们原本所属的文化环境，与父母和亲戚强制分开，成为系统性“汉化”计划的牺牲品。

报告还详细讨论了作为全球供应链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维吾尔地区奴役劳动中心和其运作方式。受害者亲属的陈述揭示了这些被奴役的劳工遭受的强制性无偿劳动和社会性隔离的剥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和其它少数民族也面临着许多的压力。其中包括中国政府让他们强制断绝与家人的联系或他们的家人受到警方的监视和各种限制，以及他们普遍面临的“返回中国”的威胁等情况在报告中专门设“海外的维吾尔人”标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传统家庭结构的激进干预，尤其是针对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等各民族，各年龄段妇女的大规模绝育政策，以及维吾尔自治区在国际器官贩卖中的作用，通过目击者的陈述呈现给了读者。

关于维吾尔地区所发生的人权灾难普通中国人是否了解的问题我们单独设一个章节进行了探讨。因为这个问题也跟“信息自由”密切相关，而“信息”是中国一党专制的控制下，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事实。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国际法框架内的集中营，其依据是在研究期间采访的53人中6人的陈述。他们作为集中营的直接受害者，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集中营里受到的酷刑和非人道待遇。报告中依据他们的陈述，结合国际法中的“种族灭绝”指控在法律的层面进行了讨论。

维吾尔自治区人权报告以4种文字编写、中文、英文、土耳其文和维吾尔文。您可以在 uyghurreport.com 访问不同语言的报告和高分辨率插图。

2. 中国在维吾尔地区做了什么？

中国根据其成为国际体系中扮演主导者的目标，试图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相关问题上将自己定位于全球事物的重要参与者。对于这一目标的安全方面考虑，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国际社会承认维吾尔人是“全球恐怖主义”的一部分。尤其是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时代的政治机遇中受益匪浅。当时，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播下了今天以反恐为名奉行的强压政策的种子，并开始在国际平台上为这些政策进行辩护。



200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声明中承诺，尽管两国之间存在各种分歧和摩擦，但他们将全力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并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挥积极作用¹。袭击发生仅两个月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表的声明清楚地揭示了这场斗争的含义。

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001）。江泽民主席通过电报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并与布什总统通电话，表明中方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2021年5月14日访问。

在题为“‘东突厥斯坦’组织开展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与奥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的联系”的文件中，中国政府称“东突厥斯坦”组织在不同国家有 40 个不同的分支机构，该组织1999 年加入了奥萨马·本·拉登所领导的基地组织。该文还声称本拉登和塔利班从 2000 年 10 月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期间向该组织提供了30万美元的援助²。这份简短且没有包含任何证据的指控文件，只是加了一些90年代在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暴力冲突作为例子，把该地区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都与本拉登或塔利班关联起来。

该文件发表大约一年后，联合国安理会承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一个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有关联的组织³。然而，联合国这一决议之前中国政府发表的另一份声明已经开始发出信号，表明将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何种行动。一篇题为“不允许‘东突厥斯坦’恐怖势力逍遥法外”的文章声称，突厥人作为一种民族身份是一个虚假和捏造的术语⁴。该文称，8世纪末，各突厥汗国一一瓦解的同时，剩余的突厥人因混入不同的民族而消失。而 11 世纪之后的文献中提到的突厥人只是说突厥语并且历史上从未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实体的人群。同样，“东突厥斯坦”也不是指地理区域，而是被分裂中国的殖民主义者创造的政治术语。这份由中国政府准备的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文章很大一部分致力于从历史和文化上对其身份进行问题化。这预示着中国政府将来以反恐为名的镇压走向安全化，汉化和文化灭绝的方向前进。事实上，随着维吾尔自治区的镇压和逮捕力度的增加，随之而来的警察暴力、酷刑和死刑判决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局势升级之际访问中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 (Mary Robinson)，对美国主导的反恐运动，赋予中国政府加大对本国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镇压的“合法性”表示了担忧⁵。

2000年代成为主要安全话语的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之风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继续加大对维吾尔自治区镇压力度的辩护。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的暴力事件被中国政府描述为“中国版911”⁶之后，至少25名参加示威的人被判处死刑；大约有40人“被消失”，至今仍未音讯。另一方面，2011年中东和北非引起巨大政治波动，甚至在叙利亚演变成内战的阿拉伯之春给中国政府提供了新的政治氛围和机会。中国政府看到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并蔓延到不同国家的趋势，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加强互联网控制和审查，特别是加强对社交网络的控制，一度想获取阿拉伯之春信息的人在互联网上搜索的“茉莉花”或“埃及”等关键词和相关信息成为被过滤的词汇。与此同时，政府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预算几十年来首次超过了国防预算⁷。

²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001)。“东突厥斯坦”组织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与奥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的联系。2021年5月14日访问。

³ 联合国安理会。(2009)。关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决议。2021年5月14日访问。

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2002)。“东突厥斯坦”恐怖势力无法逍遥法外。2021年5月15日访问。

⁵ 伊丽莎白·罗森塔尔 (Elisabeth Rosenthal)。(2001)。联合国官员担心中国将反恐战争作为镇压的借口。纽约时报，2001年11月10日。

⁶ 单伟 (SHAN Wei) (音译) 和陈刚 (CHEN Gang) (音译)。(2009)。乌鲁木齐暴动与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东亚政策，(2009): 15。

⁷ 袁敬东。(2011)。阿拉伯之春与中国不断演变的中东政策。世界政治评论。2011年12月20日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变得越来越强大，尤其是随着加入伊斯兰国的外国籍战斗人员的剧增，瞬间成为新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而这也成了中国的转折点。这一时期，2014年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摩苏尔市之后全球感知的恐怖主义威胁达到了顶峰。同年，伊斯兰国也开始在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展开行动。摩苏尔被占领后，奥巴马政府于同年8月对伊斯兰国发动空袭。几乎同一时期的8月份，中国政府在维吾尔人密集生活的喀什噶尔一处的秘密设施里关押259人进行再教育的消息传了出来⁸。同年，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县5000人分为A至D类，送往另一所设施接受强制教育。这些人当中，反政府倾向和安全风险最高者识别为A类接受强制教育20天，被认为难以改造者识别为B类15天，优柔寡断者为C类7天，被认为不危险的则接受为期4天的强制教育。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把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进行测试⁹。

2015年，伊斯兰国在世界许多地区接连实施恐怖活动，世界各地媒体和舆论的焦点聚集在这些报道时，中国政府开始公布几个月前发生的恐怖袭击并声称自己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目标。例如，伊斯兰国在巴黎实施的连环袭击之际，中国拿出两个月前在一家煤矿发生的冲突进行大肆报道，似乎想给外界这两期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影响，显得中国吹捧自己是全球恐怖主义的目标之一的说法是合情合理的¹⁰。其实，在巴黎发生的恐袭之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王毅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事件应被视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他补充说到“中国也面临着像法国一样的威胁，必须做好应对这一威胁的准备。”¹¹ 正如王毅部长所说的，中国政府加快了该计划范围内的集中营建设和测试进程。有一则新闻中提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一所集中营里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在15天的关押期内就接受了从婚姻法到观看宣传视频的不同科目的培训，其中有42名上述A类人员¹²。同年，在和田接受强制培训的人数增加到了3000人，也有媒体报道了围墙上布满铁丝网的集中营照片¹³。

2014和2015年随着在伊斯兰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危险增加，美国为首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空袭日益增多，全世界的目光911事件之后再次聚焦在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上。此时，在中国正在实验阶段的集中营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以此为契机的中国政府在2015年12月颁布的反恐法中，2016年开始将继续把维吾尔人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活动视为安全隐患，同时加快建设大规模集中营¹⁴。某些类型的胡须、头巾、清真餐厅和符合宗教教义的屠宰场都被列为极端主义的表现。戴头巾的人接受医疗服务等很活动和行为被中国政府称为“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名义下受到禁止。

⁸ 阿德里安·曾兹 (Adrian Zenz). (2018). “彻底改造他们，使他们养成健康的心态”：中国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运动. 中亚调查, (2018): 1-27.

⁹ 中国日报. (2015). 新疆伊宁县开展“去极端化”教育. 2021年5月16日访问.

¹⁰ 玛丽娅·特瑞达尼尔 (Marie Tredaniel) 和 朴K. 李 (Pak K. Lee). (2017). 解释新疆“恐怖主义”暴力的中国框架：来自安全化理论的见解. 民族文集 46. No.1 (2017): 13.

¹¹ 本·布兰查德 (Ben Blanchard) 和 迈克尔·玛蒂娜 (Michael Martina). (2015). 巴黎之后，中国呼吁世界支持新疆. 路透社. 2015年11月15日.

¹² 阿德里安·曾兹. (2018). 彻底改造他们，使他们养成健康的心态”：中国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运动. 中亚调查. (2018): 12.

¹³ 洛普县政府. (2015). 自治州对我县去极端化工作进行绩效评估. 2015年11月21日.

¹⁴ 国际劳工组织 (ILO).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2017年3月30日.

同年1至3月，伊斯兰国在9个不同国家实施了十几次恐怖袭击。中国政府以这些事态发展和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为由，与该国的五家大型科技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并轻松获取了维吾尔人的数据。

2016至2018年，中国建立的集中营占地面积增长465%，达到了270万平方米¹⁵。在此期间，由于世界舆论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或者这些组织试图通过在叙利亚的发展蔓延到其他国家的事态上，因此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继续被忽视或被作为一种“指控”。这表明，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中国在有效操纵全球反恐气氛方面相当成功。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卫星图像揭示了中国正在加速建设大规模集中营¹⁶。与此同时，跟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亲人联系不上的海外维吾尔人在社交平台和海外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同年，在人权观察对曾被关押在拘集中营的人及其亲属进行的采访响亮时¹⁷，尽管为时已晚，但人们目光终于开始转向中国这种“奇怪”的现象上。

2018 至 2020 年间，曾3次前往维吾尔自治区的德国之声记者马蒂亚斯·伯林格 (Mathias Bolinger) 的观察也反映了该地区的紧急状态：“为了不让警察知道我的踪迹，第一天我没有直接去酒店。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我是持记者签证来的，他们就不会让我自由采访，我也无法看到集中营。这就是他们对待每一位记者的方式。于是我直接去了一个集中营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后打开相机开始拍摄视频。后来，他们在摄像头中发现了，然后立即过来并一边审讯我，一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其实，他们到达前我已经拍了足够多的照片。他们没有把我关起来，而是在一座行政楼里向我进行了审讯。那个集中营的大部分警卫是维吾尔人，但他们的长官是汉人。集中营周围有很高的围墙和铁丝网。我看到人们排队等候看他们的亲戚。这是在2018年。它建造的像监狱一样，里面有瞭望塔和巡逻车。集中营的墙壁上用大字写着：“忠于党、服从党、民族团结、学好国语是成功的唯一途径”等诸如此类的标语。走在阿克苏市的大街上，他们随意让路人停下来检查身份证，每个路口都有检查站。在这里排队等候检查的全是维吾尔人，我没见到汉人被检查。跟随我的警察还让我删除边走边拍的照片。即使在市中心，每隔100-200米设立的警务站也在不断进行身份检查。在这里，他们用铁丝网围住了城市，你只有在检查站检查身份后才能进入城市。我在这里看到的是维稳措施实际上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当警察没有跟踪我的片刻，我走在道路上，在一个红绿灯等处停了下来准备过马路。当绿灯亮是我没有穿过马路，因为我决定等出租车。没过多久，两个警察来我身边，问我在等什么，在这里做什么。”¹⁸

¹⁵ 弗格斯·瑞恩 (Fergus Ryan)、丹妮尔·凯夫 (Danielle Cave) 和 内森·鲁瑟 (Nathan Ruser). (2018). 绘制的新疆“再教育”营地图.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2021年5月16日访问.

¹⁶ 弗格斯·瑞恩 (Fergus Ryan)、丹妮尔·凯夫 (Danielle Cave) 和 内森·鲁瑟 (Nathan Ruser). (2018). 绘制的新疆“再教育”营地图.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2021年5月16日访问.

¹⁷ 人权观察. (2018). “消灭意识形态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运动. 2018年9月.

¹⁸ 2021年3月23日对马蒂亚斯·伯林格 (Mathias Bölinger) 的采访

2019年，中国政府有关集中营的400页秘密文件泄露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外界获得了有关建设集中营目的和运作方式等重要信息¹⁹。文件中称这些强制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是思想被病毒侵蚀的患者，强调对这些因思想被病毒侵害而接受治疗的人不能表现出任何的怜悯。之后，随着中国政府有关集中营政策的正式文件越来越多的在媒体上披露，许多国家向中国政府做出了反应。中国政府先是对这些反应保持沉默，然后否认了集中营的存在，最后声称这些集中营实际上是为维吾尔人开设的职业培训中心，并警告美国为首的多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²⁰。然而这些反应并未能阻止中国政府对集中营里被拘押的人实施的虐待行为被曝光和被称为21世纪最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

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我们通过访谈，在安全化、汉化和种族灭绝的背景下，审视中国对集中营内外的维吾尔人日益增加的压迫和暴力，同时，讨论中国打着反恐之名进行镇压的细节。

2.1 安全化与汉化

维吾尔人的民族和宗教身份被视为原罪并成为维稳对象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我们的采访中受访者提到的所谓犯罪行为也暴露了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镇压之严重性。在我们采访中，人类学家达伦·拜勒（Darren Byler）举例说明了针对维吾尔身份的宗教和文化禁令：“学校禁止讲维吾尔语，安装在教室里的麦克风监控学生是否说维吾尔语。在学校第一次违反规定会被警告，而二次则受到惩罚。虽然中国政府说清真寺是开放的，但只是象征性开放的清真寺并没有任何功能。多年前，当我在该地区时，我观察到维吾尔人饭后祷告。而现在饭后不再允许祷告了。甚至，诸如“Salamu Aleykum”或“Inshallah”之类的表达也是被禁止的。在葬礼和婚礼上需要公务员参加。结婚前，一定得唱中国国歌。许多维吾尔作家已被监禁。那些被允许出版的维吾尔书籍也只是中文的译本。拥有悠久传统的维吾尔文学很大的程度上已被抹去。维吾尔人是喜欢诗歌的民族，针对维吾尔文学的禁令可以说世界文坛不可估量的损失²¹。

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自认定为穆斯林的人都可以实践的，不被视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所有伊斯兰教基本习俗，都被中国政府作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进行维稳和惩罚。更过分的是，这种欲加之罪的态度可以追溯到比建立集中营更远时间段的行为上。在我们对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的采访中，获得了关于他在小学生时期封斋的人所面临压力的重要细节：“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问，“有人在封斋吗？”，我们都说，“没有”就过去了。我们那儿（库尔勒）的政策首先在喀什、和田和阿克苏实施，然后到我们这儿，最后在乌鲁木齐实施。封斋的问题上，像之前那样一问一答就带过的检查形式，从2004-2005那会儿开始被发糖，发水的检查模式所替代。为了防止封斋，孩子们被迫吃糖和喝水。斋月期间学校禁止学生中午放学时回家，而要求学生带食物到学校吃。每周五中午，为了防止孩子们去做礼拜，学校强制他们留在学校。在斋月期间，每天凌晨保安在小区内检查房屋灯光，以此排查有没有人在起来吃开斋饭。根据这些检查，人们会被计分，分数下降的人会被送入监狱或集中营²²。

¹⁹ 奥斯汀·拉姆齐（Austin Ramzy）和克里斯·巴克雷（Chris Buckley）。（2019）. 新疆文件—“绝无怜悯”：泄露文件揭露中国如何组织大规模拘留穆斯林. 纽约时报，2019年11月16日.

²⁰ 本·韦斯科特（Ben Westcott）。（2019）. 中国否认有“集中营”，告诉美国“停止干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9年5月6日.

²¹ 2021年4月9日对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的采访

²²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的采访

萨图克（Satuk）提到的对封斋或想去礼拜五祷告学生的控制，最初从施压和胁迫开始，随后由保安等政府指定的人员监视和报备，最后到了被送往监狱或集中营的地步。与萨图克（Satuk）同时接受我们采访的另一名集中营受害者之一的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在采访中说道，封斋，做礼拜，去清真寺做周五礼拜和跟阿訇通话都是被送到集中营或强迫劳动的常见理由²³。被中国政府关押的著名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Cevher Ilham）通过举维吾尔人在电话交谈中不得不改变或自我审查宗教问候语的例子揭示了压迫的程度。根据伊力哈木的说法，穆斯林用来互相问候的，意思是“愿您平安”的“Salam Aleykum”一词在维吾尔人的电话通讯中改为“愿共产党与你同在”，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惩罚或被送到集中营²⁴。

我们的采访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打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名义进行的镇压，其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对维吾尔人进行文化灭绝来重新塑造和汉化维吾尔人的民族和宗教身份。特别是2000年代初实施的移民政策，或者按中国官方话语的“西部大开发政策”，鼓励汉人移民到维吾尔人聚居的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的民族结构开始迅速变化。旅居在德国的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这样总结了这个过程：“2002年，我们居住的地方开始被系统性地接管。我们有农田和果园。政府说他们将在我们的土地上建造新建筑并给一些钱要从我们这里购买我们的土地。然后政府大楼搬到离我们居民区三公里的地方。他们就这样一步步接近我们的生活，直到2014年，汉人搬来后，附近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常听到人们“我们的生活完全被颠倒了”之类的抱怨。新移民来到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故意做我们反感的事情。我们不能公开反对，只是大家都在抱怨。政府大楼建成，是一个豪华大楼。我们得知政府工作人员鼓励汉人移民搬进我们的社区。这样做的目的是疏散我们的社区并在那里建造新建筑来安置那些汉人移民。当时，也有人上门说：“政府要收你们的房子，搬出去”之类的狠话。我们家所在的位置是伊宁市维吾尔人聚居的一个社区，而我们的学校的学生已经一半是汉人，一半是维吾尔人了。2010年我们社区普遍收到一条指令，我们必须将空余的房子出租给汉人移民²⁵。

从塔什买买提（Tasmemet）的陈述中我们可以了解政府鼓励汉人迁移到维吾尔社区的做法的细节。从中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为了向该地区移居汉人，给他们提供了免费住房、高额补贴、额外收入来源和许多其他的财政支持。生活在巴林的教师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在我们的采访中提到当时的情况：“有些汉人在自己的家乡几乎生活在挨饿的边缘，他们长期失业。因此，他们抱着‘只要填饱肚子就行’，‘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出路’的逻辑去东突厥斯坦。他们在我们那儿有免费的住房，能拿比当地人双倍的工资，当然觉得很幸福。一直都这样。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任何抱怨。2013年之前，每此发生一些事件时，他们纷纷逃跑，但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他们留下来。他们希望增加该地区的汉族人口来控制那里的人们。他们不仅在东突厥斯坦这样做，在印度边界也这样做。当时他们没有出路，但现在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毕竟，他们不像维吾尔人那样受到控制。对他们而言，东突厥斯坦比他们的家乡更好，因为内地他们没有工资，没钱，只有拥挤的人口²⁶。

²³ 2021年3月24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的采访

²⁴ 2021年4月20日对菊尔·伊力哈木（Cevher Ilham）的采访

²⁵ 2021年4月5日对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的采访

²⁶ 2021年3月25日对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的采访

至此，中国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加大了维吾尔人汉化的压力。现居在荷兰的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ahim Geni）举例说明了他在维吾尔自治区担任化学老师时目睹的汉化实践：“在东突厥斯坦通常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但中国政府根据西部大开发政策，仅仅在我工作的师范学院安置了20名汉人教师。最初的时候把理科改用汉语授课，不到一个月，所有的课程都改成汉语授课了。那些不会说汉语的维吾尔教师只能失业，不得不在学校做一些保安之类的工作。很多汉人直接取代了退休教师空出来的岗位。2000年之前，国家给那里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2000年之后，推出了教师资格考试和公务员考试。考试有年龄和民族的指标或限制。考试报名表中只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种类型，没有“维吾尔族”的选项。许多职位几乎不给维吾尔人开放，上面明确标注“只招汉人”。简直就像特意为他们准备而开设的岗位一样，只有10%的名额是留给少数民族²⁷。

在我们的采访中可以看到，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汉化，而且还达到了系统性的压迫和暴力，可以说是文化灭绝。博士生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讲述了她的经历：2017年是伊斯兰教色彩的名字开始被禁止的一年。我的姓是阿吉穆罕默德（Hacimuhammed）。根据新规定，人名不能使用伊斯兰名字，也禁止使用维吾尔突厥语名字。穆罕默德是被禁止的，他们说你不能叫穆罕默德，你可以叫买买提（Memet）。他们告诉我的妹妹，‘Rabigul 得改变她的姓’。我说，‘我所有的毕业证都写的是阿吉穆罕默德（Hacimuhammed），不改又怎样？学校会重新给我毕业证吗？’我妹妹说，“你不要多问”；当时我给警察发了一张我毕业证的图片。他们说，“上面的名字是禁名。”我问道，“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毕业证颁发之后不会重新给，这样我的文凭怎么办？”他们对我说，“你是什么东西给我们教法律？你以为你出国留学就不得了是吗？”²⁸

据推测数十万家人被政府关进集中营而无人照顾的维吾尔儿童也被关押在儿童集中营里。从泄露出来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通过封闭式教育和禁令剥夺这些儿童原有的文化特征，使他们彻底汉化。中国政府无论年龄大小，通过强硬的镇压和暴力的手段试图把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汉化，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被称为“规则”来使正常化。据旅居在德国的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称，文化灭绝达到了把中国内地的城市与维吾尔自治区的城市连接为姐妹城市项目之后把维吾尔地区的各种地名改成内地地名了，甚至砍掉数百年历史的街道上的百年古树，种植从中国内地带来的树苗²⁹。这种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很难理解强制改造项目，不仅针对维吾尔人，甚至针对到让人联想到维吾尔人或维吾尔文化的植物上面。来自喀什噶尔的教授阿布都热西提·喀尔卢克（Abdurreshit Karluk）表示，所有维吾尔历史古城都以“城市改造”的名义拆除了，其中包括各种古迹和维吾尔文化遗产为载体的建筑，这些都是上述强制改造的一部分³⁰。

中国政府利用911袭击事件后出现的恐慌、阿拉伯之春后的不稳定时期以及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加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行动起来，迅速实施集中营政策。它多年来所实施的维稳、汉化和文化灭绝政策，继续严格地以反恐为由执行了起来。在下一个章节中，我们将讨论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全方位监控，压迫和暴力等错综复杂的计划和这些计划背后的真正的目的。

²⁷ 2021年4月1日对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ahim Geni）的采访

²⁸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²⁹ 2021年4月5日对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的采访

³⁰ 2021年4月26日与阿布都热西提·喀尔卢克（Abdurreshit Karluk）教授进行的采访

3. 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些？

我们在上一章节中提到，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针对维吾尔人的持续的压迫和暴力，到2014年的时候已经打下了全面建造集中营的基础的地步。在本章中，我们将寻找与“中国正在做什么？同样重要的“中国为什么这样做？”的答案。

尽管习近平和他政府的幕僚们一时间否认集中营的存在，但媒体泄露的官方文件和集中营受害者的在媒体采访中的证词给全世界解开了真相。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政府决定接受集中营的存在并使之合法化。中国政府声称“职业教育”或“再教育中心”的集中营里有很多著名的维吾尔学者，商人，运动员和艺人在接受再教育，这样他们能够从事更好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从集中营幸存者和亲属在集中营里的受访者证词中，获得了关于集中营中所谓教育内容的重要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在集中营和维吾尔人聚居地区实施的汉化政策和广泛侵犯人权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针对这些，中国政府以两种说法回应了建设集中营的目的。其一是，我们上一个章节中提到的一样，在全球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日益严重的威胁下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另外一个，是通过提高维吾尔人的中国公民意识来打击民族分裂主义。

这两种说法中有三点揭示中国政府说辞的不合理，使得我们需要仔细审查所发生的一切。首先，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没有反映现实中所实施的政策；其次，与他们的说法中所提到的危险做斗争而采取的政策是由压迫和暴力组成的；最后，这种压迫和暴力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相反的效果，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产生更大的僵局。

3.1 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多年来，犯罪学家和研究人员进行基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已经形成了关于宗教极端主义、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的研究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反恐斗争中针对某些种族和宗教群体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及侵犯人权行为流行，因此这种研究模式被基于人和社会关系的研究模式取而代之。我们应该了解如何通过优先考虑人权的前提下开展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化的斗争，同时，在这场斗争中研究哪些策略会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从而增加恐怖主义和极端化的风险。当我们以打击恐怖主义或激进化为目的或借口，针对特定种族或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习惯的生活方式，宗教习俗，反映自身身份的文化符号和实践视为安全问题时只能远离解决问题的初衷。目标群体成员面临系统性的压迫、排斥、非法政策和暴力时只能加深政权与政权保护下的群体成员之间的隔阂和对立。目标群体的成员看到当局将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定义为“其他”、潜在的“罪犯”或“恐怖分子”的时候，可能会失去能够以合法的方式处理不公平待遇的信念。这种绝望状态增加了加入极端主义组织或采取暴力行为的危险。

基于以上的分析，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采取的战略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面对全球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不断上升的威胁下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第一个说法。中国政府不仅对被强行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进行强烈的虐待和酷刑（我们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详细描述），而且尚未被关进集中营或设法逃脱进集中营命运的维吾尔人制定非常系统化的监视机制并监视每一个细节。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建造了世界上最系统化的，针对某个民族或宗教团体的物理和技术控制策略。虽然打着“反恐”的旗号，但实际上对某个民族进行安全化和刑事化的监控。

汉族人口占70%的乌鲁木齐市，仅2018年至2019年，警方以电子文档的方式记录的有关维吾尔人的报告就约 2.5 亿行。这些报告并不是维吾尔人的犯罪行为，而是包含大量维吾尔人的个人信息，例如，从车牌到位置信息等。这一事实揭示了所采用的“反恐”策略只能导致相反的结果³¹。维吾尔自治区数量迅速增加的公安检查站，“一村一派出所，一户一警”和类似的措施³²，加上跟踪，搜查，查房等多种监控手段时不时的提醒维吾尔人是“可疑的”，“危险的”和“罪犯”群体。

在我们对研究维吾尔自治区大数据监控系统而著称的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的采访中，获得了有关中国政府和科技公司联合实施的技术控制机制的惊人信息：“中国政府在全国通过‘城市安全系统’的机制，用监控摄像头和检查站结合监视人们的活动并准备潜在罪犯名单。而在维吾尔自治区，我们看到的情况更加极端，不仅是那些从集中营中释放出来的人或者他们的亲属在这些名单里，而是非常多的人都被列入后续名单中。我称它为“灵活的逮捕系统”。科技公司将维吾尔自治区视为一个实验场，在那里他们可以‘把穆斯林完全监控起来’来测试他们开发的新技术。这样，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将这些越来越危险的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公司的目标是成为生产此类监视和控制技术的领导者。”³³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丹麦的高管之一汤米·兹威基（Tommy Zwicky）声称该公司因开发用于侵犯人权的技术而辞职。兹威基（Zwicky）在我们的访谈中分享了他前公司开发的技术的一些信息：“我们在丹麦进行的测试必须用三文鱼完成。我们将10000多条鱼放入一个人工池塘的系统里。如果其中有生病的鱼可能会导致其他的鱼也会生病。摄像头可以检测到脸上有病的三文鱼并将其取出。这样能保证其他鱼的健康。基本运行规律与此相同。这就是我当时对它的全部了解。因此，在功能上使用该系统取决于我们。是否合乎道德地使用它取决于人们。华为表示：“我们始终合法地销售硬件，但如果其他人违背道德地使用它，我们不能干涉”。这就像博科圣地对丰田的使用。我们不能为此责怪丰田。同样，我们不能责怪华为监视维吾尔人。这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也是我所相信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媒体上公布的华为文件证明，我们不仅在销售硬件，还为监控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提供服务。我对维吾尔人了解不多，现在也一样，知道很少。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必须尊重人权。这个群体可以是另一个被其他公司加害的少数民族群体。这是我辞职的主要动机。因为我对公司失去了信任。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在那里工作。”³⁴

³¹ 达伦·拜勒（Darren Byler）. (2021). 新丝绸之路的中国人口管理设施：论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 2021年3月/2021年5月24日访问

³²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2015). 监狱里的领袖伊力哈木·土赫提—我的道路和我的目标：维吾尔突厥人和中国问题，希拉（Sira）出版社. 2015年9月. 哈密提·格克图尔克（Hamit Göktürk）编译，第231页

³³ 2021年4月9日对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的采访

³⁴ 2021年5月26日对汤米·兹威基（Tommy Zwicky）的采访

习近平对被强行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思想被病毒侵害，必须隔离治疗，毫不留情的人”的定义，概括了数百万人维吾尔人被归类为危险分子和思想患者的情况³⁵。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所实行的基本伊斯兰习俗（选择清真肉、戴头巾、家中持有古兰经等）被视为犯罪并被禁止。在我们对音乐老师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的采访中，我们获得了关于结对认亲项目的重要信息。尽管政府声称该项目是为了加强维汉两个民族的关系，但实际上起到了监视维吾尔家庭的生活和加速汉化进程的作用。希达耶特（Hidayet）称，每个人必须有一个异性亲戚的该项目中，维汉两个结对家庭互相拜访彼此家期间，有时候汉人家庭向维吾尔家庭带猪肉进来，有时候维吾尔家庭的女孩儿受到结对认亲的，比他们年长的汉人男性的性骚扰³⁶。

由于类似上述的强制性做法和宗教禁令，圣战激进组织呼吁武装斗争的思想正在蔓延。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不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他们试图把维吾尔人推向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而做准备，从而使他们对维吾尔人的宗教和文化压迫合法化。尽管生活在维吾尔自治区的每个维吾尔人都受到了物理和技术上的严密监控和控制，但通往叙利亚圣战组织的道路仍然出奇地畅通无阻，在叙利亚战斗的维吾尔人的数量也支持我们的论点³⁷。

2015年之前，维吾尔人不管是合法或者非法的出国是非常的困难。我们采访的所有维吾尔人无一例外都谈到了他们办理护照和签证的难度，尤其是在 2009 年至 2015 年之间。2015年办理护照和出国突然变得非常容易，甚至得到了政府的鼓励。而这一切的真正原因随着2016年开始的大抓捕水落石出。那些出过国的、海外有亲属的或者与国外亲戚有联系的人成为第一批被关进集中营的人。维吾尔人在2015年之前难以离开中国的一个例外是在激进的萨拉菲派宣传人员的鼓励下前往叙利亚的维吾尔人，与传统的维吾尔神职人员不同，他们被赋予了行动自由。尽管中国政府有所有高端技术控制系统和物理限制，但被激进的萨拉菲主义宣传引导到战区的维吾尔人可以轻松跨越边界前往叙利亚。

在喀什噶尔许多亲戚被关进集中营的维吾尔教授阿布都热西提·喀尔卢克（Abdurreshit Karluk）指出，维吾尔人对宗教有着宽容的理解，而中国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越来越多的镇压政策针对的是温和的维吾尔学派，而不是激进的萨拉菲主义运动。喀尔卢克（Karluk）教授用自己的观察描述了这一过程：“实际上，我们作为维吾尔人两次经历过这种情况，现在还在经历着。第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内地传播越来越广的“好维吾尔人”形象让中共感觉到了危险，因此90年代开始在政府有形或无形的推动下维吾尔人开始被罪犯化，边缘化。这期间，维吾尔地区的儿童系统地被绑架并提供给中国内地的犯罪组织，而这些组织利用这些儿童进行犯罪活动。一段时间后，维吾尔人的形象在中国公众眼里就成为“令人反感”的群体。第二次开始于 2010 年前后。随着阿拉伯之春，中东的激进组织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巧妙利用西方世界对此话题的敏感性，在普通穆斯林连最基本的祈祷都难以进行、甚至维吾尔人的呼吸都

³⁵ 奥斯汀·拉姆齐（Austin Ramzy）和克里斯·巴克雷（Chris Buckley）. (2019). 新疆文件—“绝无怜悯”：泄露文件揭露中国如何组织大规模拘留穆斯林. 纽约时报, 2019年11月16日. 2021年5月27日访问

³⁶ 2021年3月25日对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的采访

³⁷ 阿卜杜拉·阿尔·加哈维（Abdullah Al-Ghadhawi）. (2020). 叙利亚的维吾尔圣战分子, 新线战略与政治研究所. 2020年3月18日

受到控制的地区竟然纵容极少数激进宣传者的活动。由于政府故意的纵容，他们增加了自己的影响力和人数，并把数千名被欺骗的人从该地区轻松地带到了中东。而他们轻轻松松越过中国边境的时候，其他维吾尔人而言越过边境几乎难以想象的。随着维吾尔人在冲突地区的视频传来，中国对西方国家讲：“看，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然后逐渐加大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力度。中国共产党政府允许外来激进的宗教思想流入该地区并进行宣传，为数千名维吾尔人前往战乱地区铺平了道路。然后，他们以数千名维吾尔人为理由，将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人囚禁在集中营。那些敏锐的观察者虽然为时已晚，但也发现了中国的这项阴谋。但当他们意识到时中国已经达到了目的。³⁸”

3.2 打击“民族分裂主义”

中国政府关于集中营目的的另一种说法，通过反对民族分裂来培养公民意识的主张也同样不合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为集中营做辩护并表示，由于集中营里所谓的培训，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的收入、幸福感和安全感都有增加。他在同一次讲话中还表示，集中营应该作为中国的长期政策，这一政策对于教育新疆人民了解中华民族，让各族人民正确看待自己的国家、历史和民族至关重要³⁹。然而，从我们的采访和目前为止媒体上泄露出来的官方文件来看，我们发现集中营里伴随着侵犯人权的酷刑一起进行的强制教育并不是为了教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是以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代替维吾尔人的母语，阻止他们的宗教信仰，确保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和以民族团结为由摧毁维吾尔人的身份。因此，这类政策能带来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收货，即幸福和信心并不令人信服。

了解中国政府以打击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分裂为由实施的政策，以及为什么这些政策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应该从特德·格尔（Ted Gurr）在“人们为何造反”一书有关种族政治和冲突里频繁提到的相对剥削方法入手研究⁴⁰。根据这种方法，由于当局实施的歧视性政策，同一个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觉得自己落后于另一个或者另外多个群体，或者相对被剥夺了其他群体能获得的机会，那么这种被剥削的失望感就会演变成对其他群体的愤怒和敌意，甚至会导致对政权的攻击和暴力。同样，这种明显感受到的失望持续长久的话，就会为种族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和演变为冲突铺平道路。

根据相对剥削法和我们的采访，发现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推行的民族政策，特别是自200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旨在通过鼓励汉人在维吾尔人密集居住的地区定居来增加该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同质性的做法加剧了该地区民族间的紧张局势。在这一政策的实施下，维吾尔人看到政府说要建新建筑为名从他们手中买下的土地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分配给汉人移民。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财力实施的维吾尔自治区汉人安置政策，对移居到该地区的汉人提供了住房，高工资，

³⁸ 2021年4月26日与阿布都热西提·喀尔卢克（Abdurreshit Karluk）教授进行的采访

³⁹ 美国广播公司. (202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新疆的拘留网络辩护，称“幸福”正在上升. 2021年5月24日访问

⁴⁰ 特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 (1970). 人们为何造反，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

额外的年收入和短时间内可以入职的就业机会。随着这些汉人在这地区获得他们在中国内地不可能获得的物资帮助和优惠条件，维吾尔人原有的各种机会迅速被剥夺。那些维吾尔大学毕业生与所有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只能申请单独给他们支配的，占总工作岗位不到10%的岗位。该地区工作的大部分维吾尔教师和研究人員纷纷被解雇，他们的岗位分配给新搬来的汉人移民。跟这些移民伴随而来的是针对维吾尔语言，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更加严酷的禁令。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塔依尔·哈姆提（Tahir Hamut）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在这时期，维吾尔语教师和维吾尔知识分子出版的书籍和电影等作品被追溯审查，作者被指控分裂祖国和包庇民族分裂主义等罪名受到惩罚。尤其是2016年以来趋于强硬的民族政策下，连土耳其的广告都禁止播放，产品都禁止销售⁴¹。

根据这些，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人把自己处处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遭遇与在维吾尔自治区不断增多的汉人在政府的优惠政策下获得的特权相互比较，极有可能感到相对剥削感。这种感觉不仅加剧了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种族紧张关系，而且让那些强烈感到被剥削的人相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所以中国打击的并不是民族分裂主义，就像它并没有打击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一样。恰恰相反：他们为维吾尔人陷入分裂主义和暴力铺平道路，从而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把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给合法化。

3.3 全球霸权

中国作为快速崛起并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和科技巨头，越来越严厉地镇压维吾尔人背后其实有中国政府避免提及的原因：“一带一路”倡议，即“一带一路”项目或新丝绸之路项目。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宣布的“一带一路”倡议⁴²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是一项旨在物理、经济和技术上连接项目范围内所有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项目。该项目的陆地部分，也被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部分有6条主要经济走廊：（1）新亚欧大陆走廊，（2）中国-中亚-西亚走廊，（3）中巴走廊，（4）孟中缅走廊，（5）中蒙俄走廊，以及（6）中国-中南半岛走廊。该项目海上部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部分，包括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旨在通过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印度、阿拉伯半岛、索马里、埃及和地中海把中国和欧洲连接起来⁴³。位于这些走廊区域的公路、桥梁、港口、铁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等设施，以各种物理和数字方式连接这些地区，旨在帮助改善它们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国政府计划在2050年之前完成该项目，预计耗资4-8万亿美元⁴⁴。

⁴¹ 2021年4月24日对塔依尔·哈姆提（Tahir Hamut）的采访

⁴² 安德鲁·查茨基（Andrew Chatzky）和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2020）。“中国的大规模道路倡议”，对外关系委员会，2020年1月28日，2021年5月24日访问

⁴³ “一带一路”（BRI）倡议，2021年5月24日访问

⁴⁴ “一带一路”（BRI）倡议，2021年5月24日访问

“一带一路”项目海陆航线图



根据我们上面提供的有关该项目的信息，不难预测该项目将在全球范围内将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有多大。可以预见，尽管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但由于该项目将围绕世界大部分地区，它能使中国更接近其全球霸权的目标。该项目虽然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影响，但中国与其接触的国家增加军事存在和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推测也是不容忽视。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在奥巴马时代频频提及的“重返亚洲”政策还不够成熟之前就能摆脱束缚。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中国以全球霸权为目标而开始发展的一项新倡议，但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不同的国家小规模的测试该项目。例如，中国政府今年3月与伊朗会面，签署了25年的合作协议。这项被他们称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将来的25年里两国在从电信到能源交换、从卫生到国防合作的许多问题上相互合作和对话。计划在协议范围内实现的另一项发展是，伊朗政府同意中国将在协议生效期间在伊朗领土上保留5000名士兵⁴⁵。综上所述，中国以“经济合作”的名义签署的25年协议里，将军事存在和影响力扩展到中东战略要地。通过维吾尔自治区与阿富汗建立关系的中国，不仅训练阿富汗士兵，同时承诺承担该国与维吾尔自治区接壤的巴达赫尚省建设军事基地的所有费用⁴⁶。同样，凭借在伊朗驻军权利，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⁴⁵ 伊朗国际. (2021). 伊朗人厌倦了与中国达成保密协议—官员们保持沉默. 2021年5月24日访问

⁴⁶ 凯瑟琳·普茨 (Catherine Putz). (2018). 为什么中国会帮助阿富汗在巴达赫尚建立军事基地?. 外交官杂志. 2018年1月5日. 2021年5月24日访问

“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位于维吾尔自治区，这一事实是中国在该地区坚持汉化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中国政府计划用历史上最大投资之一的“一带一路”倡议影响许多国家，从而实现其全球霸权的目标，但它把该项目向世界开放的门户地区描述为充满“病态”、“危险”和“潜在恐怖分子”的地区。他们从维吾尔人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差异中感到不安，并把维吾尔人归为不合格公民之列。自“一带一路”倡议宣布以来，该地区针对维吾尔人的犯罪指控、任意拘留和强制关押到集中营等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看法。综上所述，中国希望中国霸权的起点是培养理想的“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们将继续严格执行对维吾尔人的安全化和汉化政策。

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大量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想实现和维持经济发展或与其他国家建立和平持久的关系，那么在落实人权和法律方面尽最大努力是很重要的。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广大的地区推进全方位接触为目标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为了让维吾尔自治区汉化向维吾尔人增加镇压的力度并试图把这种镇压合法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揭示了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步骤是多么的不理性。正如我们观察的一样，中国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政策最终效果会适得其反。中国根据其全球霸权目标奉行的镇压政策，实际上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4. 维吾尔自治区的基本自由

4.1 维吾尔突厥语教育问题

作为维吾尔自治区的原住民的维吾尔人使用的是整个突厥语里面最成熟的维吾尔突厥语，11世纪马赫默德·喀什噶尔利编写的词典是已知最古老的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语就是他的母语。与周边地区的其他突厥民族相比，由于他们更早开始了定居生活，因此，积累的历史文献和文学成就远高于其他兄弟民族。在广大的突厥斯坦地区里面是培养学者和艺术家最多的地区。

可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维吾尔人的施压是连续性的，尽管其暴力行为有周期性变化。维吾尔语面临最严重、最持久的压力期是从9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

住在英国的阿则孜·伊萨·埃尔昆（Aziz İsa Elkun）是我们就这些系统性镇压采访过的众多维吾尔知识分子之一，他说：“原来新疆大学工程专业学生可以用维吾尔语授课的。预科阶段只是学习一些基础汉语。1990年底，维吾尔语被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2000年代小学也取消了维吾尔语教学。自2010年开始，维吾尔语彻底被教育系统排除在外。其主要目的是在双语教育的保护伞下从教育中去除维吾尔语⁴⁷。著名的维吾尔文学家，诗人塔依尔·哈姆提（Tahir Hamut）总结维吾尔语的处境说：“1976-1990年，教育领域基本上使用维吾尔语，甚至大学的理科课程也都用维吾尔语授课。九十年代以后，出台了双语教育政策。双语教育政策出台后，尤其是在大学，理科课程开始用汉语进行教学。此后，中小学的教学语言逐渐开始转向中文。双语教育也是伊力哈木·土赫提的重要研究课题。伊力哈木提倡双语教育，但他提倡的既有汉语也有维吾尔语的双语，但国

⁴⁷ 2021年3月31日对阿则孜·伊萨·埃尔昆（Aziz İsa Elkun）的采访

家在实行的层面通过摧毁维吾尔语来转向汉语和英语。这种双语教育是一个计划了很长时间的政
策，而不是一两年。维吾尔语最终被完全排除在教育之外。⁴⁸”

其实，根据中国的宪法，维吾尔自治区根据其自治结构在很多领域可以自由实施自己的官方政
策。母语教育是其中之一。然而，用维吾尔学者和社会上备受尊敬的活动家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话
说，应该被视为国家和民族之荣誉的宪法，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一直被无视。甚
至，中国知识分子时不时通过学术论文揭露这种情况。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在题为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中，提出要废除中国的苏式自治
制度……在一个主流文化里面重新塑造各民族的主张⁴⁹。

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族化学家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ahim Geni）讲述了他之前工作的机构
的情况：“随着中国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很多汉人来到了我们的地区。仅仅我
工作的教育学院安置了20名教师。当时我想，就这么一个学院安置了20名汉族教师，那其他地方
安置了多少呢？最初的时候把理科改用汉语授课，不到一个月，所有的课程都改成汉语授课了。
那些不会说汉语的维吾尔教师纷纷失业。那些维吾尔教师们被学校指派当安保人员。当时，从学
校的清洁到学生宿舍都有那些教师。那些年龄偏高的教师被迫退休，把汉人被安置到他们的位
置上。⁵⁰”另一位受访者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这样阐述了自己的所见
所闻：“当教学语言突然改为中文时，我在学校的老师们纷纷被停职离开教学岗位，他们被分配
到其他的岗位上，一些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甚至一夜间变成了门口的保安。⁵¹”在维吾尔自治区
剥夺知识分子的职业和诋毁他们看起来实施了很长时间的一项有计划的国家政策。

4.2 信仰自由

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维吾尔社会在宗教自由领域也不断承受着压力。就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
和社会指标而言，维吾尔人可能是与中国主流社会差异最大的结构体。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是他们的穆斯林身份。这种影响主要从该地区人民的语言和文字文化到他们的建筑风格中体现出
来。未经维吾尔人同意而进行的各种强制变革和改造活动，在很多方面都是对他们宗教价值观的
攻击。之前生活在喀什噶尔的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提到的建筑改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住在市中心。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政府说要修复旧房子而开始改变那里
的旧房子。后来这种改造蔓延到清真寺了。我们那儿有一个老清真寺，是11世纪马赫默德·喀什噶
尔讲座过的一个高级学府。他们也改变了它，磨灭了它的痕迹。循序渐进的这种改变越来越深入
了。2018年后，我开始在新闻中看到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对墓地和清真寺也做了改变，清真寺竟
然变成了娱乐场所”⁵²。集中营受害者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和田市

⁴⁸ 2021年4月24日对塔依尔·哈姆提（Tahir Hamut）的采访

⁴⁹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2015). 监狱里的领袖伊力哈木·土赫提—我的道路和我的目标：维吾尔突厥人和中
国问题，希拉（Sira）出版社，2015年9月。哈密提·格克图尔克（Hamit Gokturk）编译，第85页

⁵⁰ 2021年4月1日对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ahim Geni）的采访

⁵¹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⁵² 2021年3月29日对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的采访

中心有20座大型清真寺。2017年，我们听说只剩下两座清真寺了，其他所有清真寺都被摧毁了。里面还有300-400年历史的清真寺。其中历史悠久的克孜克巴扎（Kizikbazar）清真寺，他们拆除了它。⁵³”阿则孜·伊萨·埃尔昆（Aziz Isa Elkun）表示，除了文化遗产和礼拜场所外，在维吾尔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墓地也发生了变化，他这样讲述了他的经历：“我在谷歌地图上看到我父亲的坟墓被毁了。他的坟墓在我们的伊宁县境内。2017年回老家的时候，去墓地上过坟，当时墓地还在。法国的路透社报道了这件事并去了我的出生地。他们看到的景象是：中国政府用混凝土建造了一个新墓地，旧墓地已灰飞烟灭。⁵⁴”



⁵³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的采访

⁵⁴ 2021年3月31日对阿则孜·伊萨·埃尔昆（Aziz Isa Elkun）的采访

穆斯林的圣书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忠告外，该地区的宗教积淀中还有许多触动人们日常生活的事物。人们的饮食习惯、特殊日子的仪式、行善的方式、衣着喜好等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了永久的文化资产，而它呈现出的包容性，往往也包括非信徒。然而，这种自然状态的几乎所有反映，都被中共政府扣上激进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帽子进行评价。那些被群体接受的价值观偏好和最普通的行为都被成了给维吾尔人定罪的“证据”。阿尔菲拉·努尔穆罕默德（Alfira Nurmuhammed）：“因为我在外面戴头巾，就经常引起警察的注意，所以我很少出门。当时我开始接受传统的基础宗教教育。我们过去常常把宗教书籍藏在上衣里面，去神学老师家时隐藏我们的足迹。⁵⁵”因戴头巾而面临压力的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有一次我在学校外面，我们学校的一位汉族老师看到我戴着头巾，就通知了学校管理部门。然后学校的管理部门让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上面写着：“我不会再相信宗教，不会戴头巾。⁵⁶”

集中营受害者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也目睹了宗教行为和仪式被定性为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情况：“有一个包含70条项目的清单。清单上的大多数项目都涉及宗教仪式。实行这些仪式被政府视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罪行。禁止戴头巾，区分清真和非清真，留胡须，穿漏出脚部胫骨的短裤，右臂戴手表等行为的同时，这些行为被认为是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证据。如果有人的手表在他们的右臂上并且他们是维吾尔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被关进集中营。⁵⁷”

来自库尔勒市的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有没有封斋。之前我们说‘没有’就过去了。后来，逐渐出现分糖分水分的动作。为了让我们证明没有封斋就让我们吃糖，当我们不吃糖的时候，他们就认定我们封斋了。斋月期间禁止中午回家。为了不让封斋，学生们被迫把饭菜带到学校吃。⁵⁸”有类似经历的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说：“学校一般从来不提供伙食，但斋月期间他们把食物摆在桌子上面并强迫我们吃。⁵⁹”

摩尔则阿赫玛德·伊利亚斯奥卢（Mirzahmet Ilyasoglu）：“他们在清真寺安装摄像头的目的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监视我们。盗窃在我们地区非常罕见。主要目标是监视哪些人进清真寺。之后，去清真寺的人数开始减少了。据说通过这些记录公务员，教师和学生的做礼拜情况。随着这种令人不安的流言传语，很多人开始犹豫。之后这种情况逐渐成为官方的态度。⁶⁰”集中营幸存者者奥马尔白克·阿利（Omerbek Ali）指出，“这些记录是为集中营而准备的证据。进入清真寺，人们必须在他们的设备上刷他们的身份证，而这些信息记录在他们的系统中。现在他们把它作为犯罪的证据拿出来了。在东突厥斯坦乌鲁木齐大屠杀（2009年）之后，他们开始在几乎每个清真寺都安装了设备。⁶¹”

为终止信仰自由而实施的，更有组织性和系统性的压力仍然相当强烈。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有很多关于宗教的通知，如，公务员不能去清真寺，在企事业单位的员工不能去清真寺，学生、教师、妇女、儿童以及任何未满 18 岁的人都不能去清真寺或祈祷等⁶²。

⁵⁵ 2021年4月7日对阿尔菲拉·努尔穆罕默德（Alfira Nurmuhammed）的采访

⁵⁶ 2021年3月29日对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的采访

⁵⁷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的采访

⁵⁸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的采访

⁵⁹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⁶⁰ 2021年4月8日对摩尔则阿赫玛德·伊利亚斯奥卢（Mirzahmet Ilyasoglu）的采访

⁶¹ 2021年3月24日对奥马尔白克·阿利（Omerbek Ali）的采访

⁶²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2015). 监狱里的领袖伊力哈木·土赫提—我的道路和我的目标：维吾尔

中国政府将维吾尔人转变为汉人计划的基础似乎是强行去除任何使人成为维吾尔人的东西，并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因此，信仰（伊斯兰教）、母语（维吾尔突厥语）和家庭结构都将从维吾尔人的生活中移除。许多证词证实，家里有古兰经的人被关进集中营，没收的圣书被烧毁。出于这个原因，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不得不把这些圣书埋在地下来隐藏和保护，因为他们认为把它们留在家里是很危险的。迫不得已的人们也选择了其他保护圣书的途径：人们用塑料袋子或瓶子装起来的圣书扔在从维吾尔地区（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流向哈萨克斯坦的伊犁河中，而河水流出中国边境之后，哈萨克斯坦人力所能及的拯救了这些古兰经等圣书。



从中国的维吾尔自治区被维吾尔人扔进伊犁河之后哈萨克斯坦的潘菲洛夫(Panfilof)地区艾达尔里(Aidarly)村民捞出来的古兰经 -实际图片数字化存档-

4.3 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

除了宗教限制，维吾尔人在语言和文化权利方面还面临歧视和不平等。2017年，在该地区禁止使用伊斯兰名字是侵犯维吾尔人最基本文化权利的行为之一。出生在库尔勒市并在北京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的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讲述了她的情况：“起名不能用带有维吾尔或伊斯兰教色彩的名字，穆罕默德（Muhammet）是被禁止的，也不能起名叫玛赫穆德（Mehmet）。警察要我的毕业证照片，我发给了他们。他们说上面的名字是禁止的，你应该改姓。”⁶³”



喀什噶尔附近一个村庄里身着汉族传统服饰的维吾尔儿童
-实际图片数字化存档-

维吾尔人受到的区别对待、排斥和控制不仅限于该地区，在中国内地也同样都受到这类不公平待遇。热比古丽（Rabigul）给我们分享了她在中国内地频繁受到身份检查的情况：“当我们去某个地方时，经常会遇到繁琐的身份检查。我们必须经历与其他人不同的检查程序。整个大学期间，警察的跟踪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有时候我们不被允许进入观光点。我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想进一个博物馆，但他们看到我们维吾尔身份证后就不让我们进入了。”⁶⁴热比古丽（Rabigul）举例说明了维吾尔人通常被剥夺权利的经历：“我们住酒店的时候，警察来收集面部记录，但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系统。这一切只针对维吾尔人。从2009年之后开始实施。从那时期，我们外地的朋友来了，甚至找不到酒店安置他们。我们去酒店问是否有房间时，他们说有，当我们把身份证递给他们时，他们看到以65⁶⁵开头之后立刻说没有房间。”⁶⁶”

⁶³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⁶⁴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Hacimuhammed）的采访

⁶⁵ 维吾尔自治区的身份证号是65开头的

⁶⁶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维吾尔人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人身权利正面临公开而激烈的攻击。我们采访对象之一的维吾尔人阿卜杜拉·拉苏尔（Abdullah Rasul）举例说明个人权利是如何被侵犯的：“自2014年底以来，维吾尔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安装摄像头。这些摄像头被放置在每栋建筑的入口处，包括房屋入口和建筑物入口。那些摄像头是好像是Vesion-Tech的一种华为摄像头。当时安装这些摄像头之后，

有一个部件和一些摄像头的纸片掉在地上了。我妻子把他们捡了起来。我的妻子读了纸片上的内容，它有点像用户手册。里面写，如果摄像头检测异常五秒钟，就会自动报警。是一个带有面部识别功能的摄像头。我们家摄像头所在的走廊对面有一个窗户，里面可以看到厕所。斋月期间我们过得非常艰难。当我们为洗大小净或者起来吃封斋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小心，担心他们发现灯光。⁶⁷” 由于这些侵犯人权的政策，维吾尔人进入购物中心、图书馆、医院和许多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区域受到限制。

财产权是个人权利里面重要的一部分，它赋予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使用、受益和处置他们拥有的财产的权力。由于维吾尔身份而被没收财产的维吾尔商人奥马尔·法鲁克（Omer Faruk）接受我们的采访讲述了他与他家人的遭遇：“我的几个兄长都是受人尊敬的商人。他们是做房地产的，经济状况很好。有一个与我兄长合作的一个汉人联系了我，告诉我所有的兄长都被逮捕了。他说‘像你兄长这样有钱的维吾尔人全被抓了，财产都被没收了’。我们家有三四家餐厅，价值大约1亿美元的资产，是在库尔勒市家喻户晓的一个家庭。⁶⁸” 来自和田的苏迪妮萨·阿布帝林（Sudinisa Abdulim）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家的财务状况非常好。我丈夫是做国际贸易的。2014年，他们在东突厥斯坦逮捕商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而且没收了财产。⁶⁹” 库扎提·阿勒泰（Kuzzat Altay）说：“我们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方拥有楼盘，他们没收了我们所有的大楼。当时我们家是亿万富豪，父亲给我钱，现在轮到我给他钱了。⁷⁰”

言论自由被定义为不受限制地从口头、书面和印刷品中获取、接收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然而，维吾尔人和维吾尔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批评和表达思想的自由。维吾尔知识分子阿布都维力·阿尤普（Abdulveli Ayup）这样表述现实情况：“1992年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并在那里呆了五年。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那里有更多的自由。我在那里读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在东突厥斯坦甚至很难提那本书的名字，但在北京却轻松能读。我们交流时比较北京和我们那儿的情况。一般我们不说东突厥斯坦，而是说‘我们那儿’来代替。在内地，连出租车司机都可以骂共产党，真的是自由很多。中国内地，或多或少允许和保护言论自由，而我们作为中国公民也应该享受同样的自由。我喜欢这种自由。我认为我们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这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受到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我18岁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思想自由，人们自由思考的含义是什么。⁷¹”

⁶⁷ 2021年4月6日对阿卜杜拉·拉苏尔（Abdullah Rasul）的采访

⁶⁸ 2021年4月7日对奥马尔·法鲁克（Omer Faruk）的采访

⁶⁹ 2021年4月7日对苏迪妮萨·阿布帝林（Sudinisa Abdulim）的采访

⁷⁰ 2021年4月7日对库扎提·阿勒泰（Kuzzat Altay）的采访

⁷¹ 2021年3月26日对阿布都维力·阿尤普（Abdulveli Ayup）的采访

中国的人权记录从未有过好的表现。即使在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等对中国敏感的地区，大量群众过得“相对”和部分自由的时期，政治、文化和信仰领域的杰出人物的生活也过的非常艰难。1996年，维吾尔诗人塔依尔·哈穆提（Tahir Hamut）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被拘留，在审讯期间被打的肋骨骨折。这位在乌鲁木齐监狱度过了一年半的诗人说，在监狱里没有食物和水是很常见的事情。塔依尔·哈穆提（Tahir Hamut）解释说，他在一年半后被送到喀什，在警察的监督下，每天24小时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半⁷²。强迫劳动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无法证明嫌疑人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常用惩罚方式。

语言学家、作家阿布都维力·阿尤普（Abdulveli Ayup）于2013年在喀什被捕并在狱中度过了15个月，他描述了他在6个月审讯期间遭受的酷刑：“在喀什，先是审讯，后是酷刑，接着又是审讯和酷刑，轮番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酷刑后，我被送往到了乌鲁木齐。在那儿也是一样，先是审讯，然后是酷刑，最后送往病房。他们正正两天半不让我睡觉。牢房里总是有审讯，第一轮审讯后他们会消失一两个小时，然后又回来，往你脸上泼水，然后再次审讯。你两边会有两个警察，你面前会有三个审讯的警察。你周围的警察威胁说，如果你不交代，会把你怎么样。因为睡眠不足，你连眼睛都睁不开，这时候他们给你一种白色微小的药。吃了那个药之后你就醒来，但过了一段时间药效过去了，你就开始睡觉。他们用电棍点击你的腋下。它会你颤抖起来，让你的心脏很痛。点一下你就会气喘吁吁，身体颤抖。他们把1000瓦的灯放的离您很近，即使闭上眼睛，这种强光也会干扰你的眼睛。电棍的电只能用20分钟。它的充电时间为1个小时，所以电棍在充电的时候，他们用其他方式折磨。当时我身体因折磨而肿了起来。身体肿了，就算疼，也得用凉水冲一冲，然后揉一揉，就可以减少一些疼痛了。⁷³”

5. 集中营

5.1 集中营的种类

中国给予“再教育、创造就业、转型”等名称的，被外界普遍称为集中营的地方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5个种类：i) 临时拘留中心，ii) 集中营，iii) 奴役劳动中心，iv) 儿童集中营，v) 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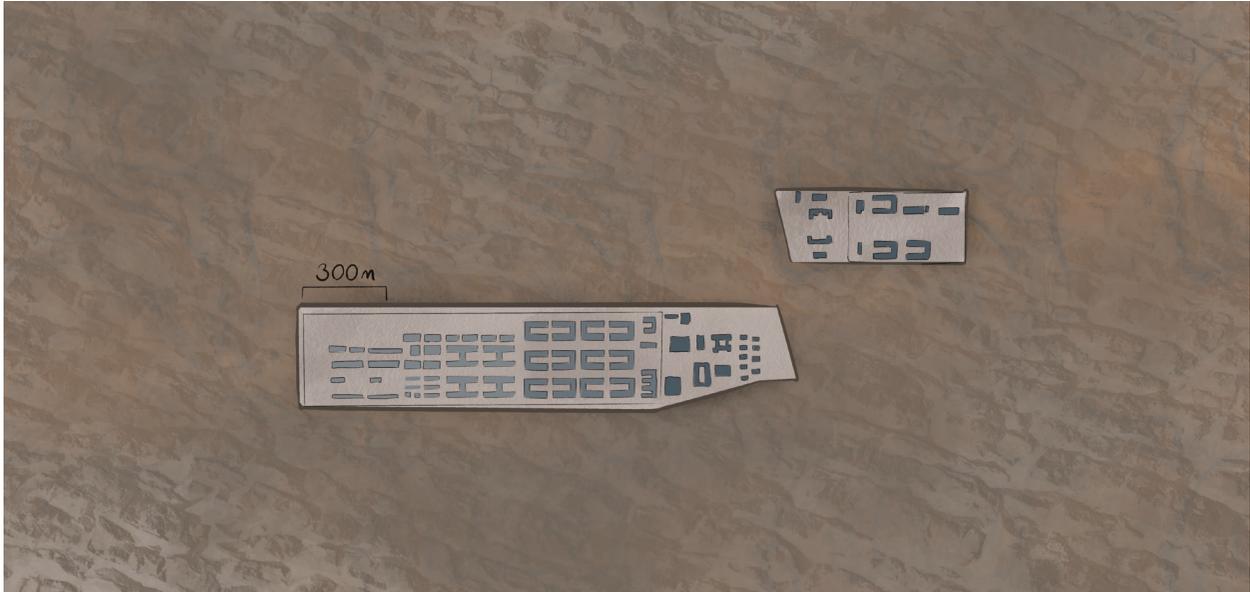
这五个种类的集中营，在内部根据不同的条件也有所差异。所有临时拘留中心或集中营的条件并不完全相同。

5.1.1 临时拘留中心

主要分布在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包括最小的城市的，由于大规模抓捕变得特别拥挤的拘留所。由于现有的拘留营无法容纳被拘留者以后，学校和工厂匆忙改建为临时拘留中心被广泛使用。这些中心是对被拘留者进行第一次审讯和决定他们将送往何处的地方。被拘留者在这些中心停留数周至数月。那些持续很长时间的中国共产党宣传从这些中心开始。在审讯期间不忍酷刑认罪者，在供词上签字之后被送往监狱或奴役劳动中心。拒绝认罪的人，大多被送往集中营。

⁷² 2021年4月24日对塔依尔·哈穆提（Tahir Hamut）的采访

⁷³ 2021年3月26日对阿布都维力·阿尤普（Abdulveli Ayup）的采访



乌鲁木齐附近的一个集中营
-实际图片数字化存档-

5.1.2 集中营

根据受害者证词中的共同点，集中营里：每天上14-15小时的宣传课（这包括用中文背诵共产党歌曲，-相当多的维吾尔人不懂或几乎不懂中文- 观看共产党视频、学习中文、反复抄写赞美党和国家主席的中文文本）、极度缺乏食物、缺乏医疗保健、强烈的酷刑和性暴力是集中营的共同特征。通过对受害者、受害者亲属和专家的详细采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集中营在维吾尔自治区的第一批例子是在2014年有限的几个地方试运作，2015至2016年间大规模集中营开始在这些地方建造。随着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于2016年底调任到维吾尔自治区，大规模的抓捕就开始了。



和田旁边的一个集中营
-实际图片数字化存档-

5.1.3. 奴役劳动中心

从临时拘留中心和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人被强迫劳动的，里面包含工厂的综合体。不同的中心条件有所不同，在同一个奴役劳动中心内，因个人的定性，其对应的条件也有差异。每天12至14小时的强迫劳动和阻止彼此之间的沟通是所有奴役劳动中心的共同特征。通常，年龄在14至40岁之间的人会被送到这些中心。那些周六回家与家人团聚，周日晚上必须返回中心的奴工可以算奴役劳动中心里面最“幸运”的人。虽然有些奴工可以一个月和家人团聚一天，但也有些人根本没有机会出去。

5.1.4 儿童集中营

因大规模抓捕失去一级亲属，年龄在14岁以下的儿童被集中关押的地方。这些一级亲属被逮捕，无人照顾的孩子们，当他们的亲属提出领养时，中国当局通常会拒绝他们的请求。0-14岁的孩子在这些集中营里接受密集的中文和汉文化教育。他们原来的维吾尔，哈萨克名字改为汉名。他们禁止说母语，完全剥夺了继承本民族文化的权利。中国境外的亲属或父母（如果有的话）也无法知道孩子们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5.1.5 监狱

已经存在，但自2016年开始大规模拘留以来，其使用量已远远超出其容量的地方。同样，2016年之后，强烈的宣传和系统性的酷刑在监狱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普遍。在临时拘留中心通过酷刑签署的供词的拘留者，或在集中营没有签署这些文本，但被当局认为应该转移的被关押者，将被送进监狱。进监狱的判决不是在有辩护条件的法庭上获悉，而是在集中营的警察当着被关押着的面念出来的通知中得知。对于45岁以下的人来说，15-20年的刑期是非常常见的。

5.2 后现代时代第一个集中营实验

2014年，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等维吾尔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城市开展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活动。2013年成立了委员会，以“再评价”的名义进行回顾性审查。这些委员会审查了过去15年出版的维吾尔语出版物并开始发布报告。享誉全国的著名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教授于2014年在北京被捕。土赫提（Tohti），是根据中国宪法，争取维吾尔人少数民族权利的一位学者。对各种背景的学生里面拥有很大影响的土赫提（Tohti），最终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2014年，第一批集中营开始运作，阿卜杜勒哈贝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在维吾尔自治区做商业活动时被捕。热杰普（Recep）讲述的内容与2014年之前进监狱的人的证词大不相同，而与2016年之后集中营受害者的证词几乎一样。那些在2014至2016年期间被拘留、大多贿赂官员而得救并能够出国的人的故事也支持阿卜杜勒哈贝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的说法。阿卜杜勒哈贝尔（Abdulhaber）说，他被警察叫到派出所，他去派出所之后惊讶地看到很多手脚被铁链锁着，面朝墙壁的男女站在里面。没过多久，阿卜杜勒哈贝尔（Abdulhaber）也成了他们之间的一员⁷⁴。

⁷⁴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的采访

阿卜杜勒哈贝尔（Abdulhaber）在第一次审讯后被带到另外一个县。途中他问为什么没有关押在和田时，警察表示，和田监狱已满⁷⁵。

阿卜杜勒哈贝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没想到自己将成为后现代第一批集中营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他被关押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按照新制度设计的临时拘留中心⁷⁶。

“我们25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试着并排躺下。有时五六个人因地板上没地方而睡不着。他们只能靠着墙站着。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坐了。给我们教汉语歌曲时，万一背错一个字他们立刻会打你。在派出所的时候我们的手脚是被铁链锁着的，但没有把两个人互相连起来上锁。当我们被带到集中营之后，他们把我们所有人的手脚用铁链交叉锁在一起了。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站直。起初，我们牢房里也有两个小偷，但他们从来没有被铁链上锁。像我们这样被叫到派出所或者被逮捕而来的人统统被锁住并连在一起。在集中营里，每天早上5-6名拿着电棍的警察进入牢房，一边问：“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进来的？”等问题，一边往死里打我们所有人。每次殴打大概持续15-20分钟左右。我们的手脚被铁链锁着，因此也无法防护自己。我们经常早上6点钟一起被叫醒。里面有摄像头。有警察一直从上面的玻璃窗注视着我们。我们之间的谈话是被禁止的。当警察去吃晚饭时，我们会试着躲避摄像头偷偷交流。有些人因手机里面有古兰经的视频，有人因留胡子而被抓进来的。大多数是因为手机里有他们家女性戴着传统维吾尔族头巾拍的照片。里面有教中文歌曲的老师。他们用维吾尔文写中文歌词教我们念。那些懂汉语的人读着中文能背诵下来，而大多数不懂汉语的人用维吾尔文字把汉语歌词写下来学。老师也会把歌词写下来发给我们。上课时，他们跟警察一起往下看我们，时不时地叫某人的名字说“用心读”之类的话。如果背不下来，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会来狠狠地打那些背不下来的人。我被关押的中心一共有24个牢房，每个牢房的门写着编号，我在3号牢房里。第一次进入牢房的时候从对面的牢房里传来了狗叫的声音，然后传来了男人痛叫声。我在那里看到了14-70岁各年龄段的人。老人受不了铁链不停地哭泣。厕所也在牢房里，周围没有任何遮挡物。有人上厕所时，所有人都能看到他，警察也在看着。那些明确了判决的人被送往监狱。我从未见过有人被带上法庭。判决被警察宣读之后把那个人带到集中营。中午只给一个馒头和一杯热水。

六个月之后，我被转移到和田。而和田的情况更糟糕，里面更拥挤。我们住的牢房比我在另外一个县住的牢房小得多，但里面还是住25个人。我们一半人靠着墙站着，一半人在地板上拥挤着睡觉。这里也有死记硬背的中文教育。还得背诵中文歌曲和诗。和田的集中营里，有一次警察问我：“阿卜杜勒哈贝尔（Abdulhaber）你犯什么进来的？”我回答说：“我什么都没做。”然后他们开始用警棍殴打我。没过多久我就昏过去了，什么都不记得。我醒来后，里面的狱友告诉我，我昏倒后，他们把我给拖了出去了。事后，一名警察说：“你为什么这样说话，你被带到这里是因为你有罪。”他说我不应该在别人面前说‘我是无辜的’，否则我会给别人树立坏榜样，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认罪。我之前路过那栋楼很多次，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建筑。警察经常带着狗在那栋大楼周围巡逻。

他们也经常殴打女性。经常听到女人的哭喊声音。传来用电线打人的声音。女人哭声，我们都能听到。每天听到打女人时候的警棍声音和女人的哭声交杂在一起的声音。

⁷⁵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的采访

⁷⁶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的采访

阿卜杜勒哈贝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继续回忆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有一个含七十条的极端主义表现文件。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宗教仪式的。里面有戴着头巾，留胡须，甚至右臂上戴手表。如果有人的手表在他们的右臂上并且他是维吾尔人的话，他很有可能被关进集中营。因为在伊斯兰教中，有从右边开始，用右手吃饭等习俗。我在2014年11月获释后，看到2015年有很多人被捕。我在里面一共呆了9个月。他们说，你得承认犯了这些列表中的罪行，然后签字离开。签字的时候他们以威胁的口吻说：“在你村里、你的邻居和任何地方都有我们的耳目。如果你不注意这些项目，我们会把你再抓进来。”⁷⁷

热杰普 (Recep) 通过朋友给当局的贿赂拿到了护照，并以类似的方法得以出国。自2016年以来，他一直联系不到妻子和7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有登记的户口，而其他五个孩子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向国家隐瞒。提到他们，他眼含泪水。他认为他的孩子在儿童集中营。他得到消息，他那家庭主妇的妻子已被判了9年徒刑⁷⁸。

⁷⁷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的采访

⁷⁸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的采访



5.3 大规模拘留的开始：2016–2017

本来在维吾尔自治区获得护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种状况在2015年发生了变化。过去即使是花大笔贿赂也很难获得的护照，那年突然变得容易了。不仅如此，地方当局还鼓励维吾尔人申请，称他们可以轻松获得护照。许多维吾尔人想抓住这个机会。而这种意外的原因2016年底开始的大规模拘留后水落石出了。

来自喀什噶尔的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的证词与其他证人的说法一致：“在2015年之前，护照是非常珍贵，很难获得的。虽然我父亲有很多关系，但给我办护照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15年后，我村里的叔叔，即便是那些没有钱的人，也很容易拿到护照、也很容易拿到他们想去国家的签证。这时候许多旅游公司开业。然后所有经过这些公司出国旅游的人，包括那些旅游公司的老板，统统被关进了集中营⁷⁹。”

被拘留者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在“敏感”国家名单上所列的国家有关系或有接触的人。美国、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德国、埃及、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的岳母在2017年11月因2016年随中国旅游团来土耳其而被判处19年有期徒刑。表妹热孜亚·迪力木拉提（Raziye Dilmurat）也因为联系德国的亲戚为由被判处11年徒刑。而她联系的亲戚就是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联系内容只是从德国寄一些药给她的表弟治病⁸⁰。

在2015年广泛发护照一年后，那些出国返回的人开始被带到集中营。在国外上学的维吾尔学生被当地警察打电话劝返回中国。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告诉我们，他的朋友亚森（Yasin）于2016年底在埃及接受教育期间被迫返回中国，之后他们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两个月后他的尸体被警察交给了他的家人⁸¹。出国留学的学生、做生意的商人、与国外亲属交流的人，以及所有这些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家人，都成了拘留大潮的受害者。2016年开始实施的《姓名禁令》几乎涵盖了所有带伊斯兰因素的姓名。定罪的原因五花八门，例如蓄胡须、戴维吾尔族传统头巾、被认为封了斋、去清真寺、家里有《古兰经》、礼拜毯，磁带等政府的许可下购买的宗教物品。

2018年，从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伊宁等城市中能够离开中国的当事者共同陈述，在街上的维吾尔人少了很多。这波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抓捕浪潮不仅限于对共产党反感的维吾尔人。那些一生做良民，长期工作生涯中成为杰出公务员的维吾尔族共产党员们也成了这次大规模抓捕的目标。

居住在芬兰的哈尔穆拉特·维吾尔（Halmurat Uygur）70多岁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父亲是从吐鲁番市政府退休的老干部，母亲从国家宣传机关的吐鲁番报退休。哈尔穆拉特（Halmurat）描述他的家庭时说到：“我们是一个深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家庭”⁸²。然而，2017年，他的父母都被送进了集中营。

⁷⁹ 2021年3月29日对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的采访

⁸⁰ 2021年4月5日对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的采访

⁸¹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的采访

⁸² 2021年3月31日对哈尔穆拉特·维吾尔（Halmurat Uygur）的采访

来自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的哈萨克人麦利克·马合默德 (Melike Mahmud) 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一波拘留的巨浪比之前的要广泛得多：“我舅舅迪力夏提·奥拉尔巴叶 (Dilsad Oralbay)、我姑姑巴合提古丽·奥拉尔巴叶 (Bahtigul Oralbay)、我的小姑姑巴依拉·奥拉尔巴叶 (Baila Oralbay) 都被关进了集中营。我们很惊讶，甚至不敢相信。在那之前，我们认为只有宗教人士才会被捕。但我们错了。他们是一生都没去过清真寺的人。我舅舅是一名在中国政府的官方报社工作了23年的老公务员。也是共产党员。他不是穆斯林，甚至没有任何虔诚的朋友。我的姑姑们也是。我们后来得知，我舅舅在集中营呆了一年后因重病而被释放了，出来的时候已经瘫痪了。⁸³”

我们采访了来自11个不同国家的集中营直接受害者和受害者亲属，他们讲述的被捕原因大体相同。最常见的有：出国留学（都是官方许可的），去过“敏感国家”名单上的国家（包括中国的许多邻国和西方国家）与这些国家做生意，手机或电脑里、家里保存有关于宗教（伊斯兰教）的书籍（尤其是古兰经）和录音录像带，在手机上安装西方的应用程序，例如 WhatsApp 和 Skype，戴头巾（对于女性，包括传统的维吾尔族妇女仅盖住一部分头发的头巾和面纱），有亲戚在国外，被举报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等。（上面的每一项也是影响中国官方给维吾尔人评分测量他们是否是合格公民的因素）。

中国政府采用了新的安全概念，非汉人被视为潜在威胁，虽然这种看法并没有合理性。中国共产党新疆宣传部副部长徐贵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谈到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通过教育这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使他们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⁸⁴” 中国政府更愿意向全世界宣布这种官方言论来承认，他们逮捕并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数百万从大学教授到农村妇女的维吾尔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是为了“防止他们犯罪”。

中国政府更愿意把集中营向国际社会展示成“教育中心、转化中心”。尽管许多著名的维吾尔学者、艺术家、运动员和处于职业顶端的商人也关押在这些集中营里，但中国依然坚持声称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接受了必要的培训之后得到了工作。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维吾尔自治区有1100多万维吾尔人。如果要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未登记人口，维吾尔人的实际人口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中国政府宣传机构新疆日报在2020年10月31日刊有消息称，2016年至2019年，全区471万9600人接受了职业培训。我们知道，2017、2018 和 2019 年间中国政府建设新集中营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有消息称，截至2020年，新建集中营总数为380个⁸⁵。尽管这规模仍在增加，2018年后，政府开始释放一部分人为新的拘留者腾出空间。由于缺乏详细的数据，我们忽略新增集中营的情况下，根据2016-2019年国家公布的“培训”人数推算，则可以估计在 2019年至2021年6月期间有235.9 万人继续被带到了集中营。这说明，从2016年到今天（2021年6月）为止，那些在集中营期满释放、转移到监狱和强迫劳动中心、仍在集中营被关押的人总共有707.8万。在这些人员经常流动的集中营里，我们估计同一时间在集中营里关押的人数超过了300万。

⁸³ 2021年4月6日对麦利克·马合默德 (Melike Mahmud) 的采访

⁸⁴ BBC新闻. 中国“思想转化”营内部. (2019). YouTube. 2021年5月21日访问

⁸⁵ 卫报. 研究发现中国在新疆建了380个集中营. (2020). 2021年5月29日访问

5.4 集中营的物质条件

我们从证人的证词中了解到，中国称之为“教育营”的临时看守所、集中营和监狱在物质条件上大体相似。被关押在这三种类型关押所的受害者和这些地方担任职务的员工证词中有一致和相似的叙述。据了解，那些为奴工而建立的强迫劳动中心，考虑到生产的需要，给关押者提供了最低水平的医疗卫生条件。我们对儿童集中营的了解非常有限。除了那些儿童集中营里的汉族职工在社交媒体私人账户上分享的简短视频外，我们还没有得到详细描述孩子们实际情况的文件。由于我们将在单独的章节中介绍强迫劳动中心和儿童集中营，因此在本章中，主要介绍临时拘留中心、集中营和监狱最常见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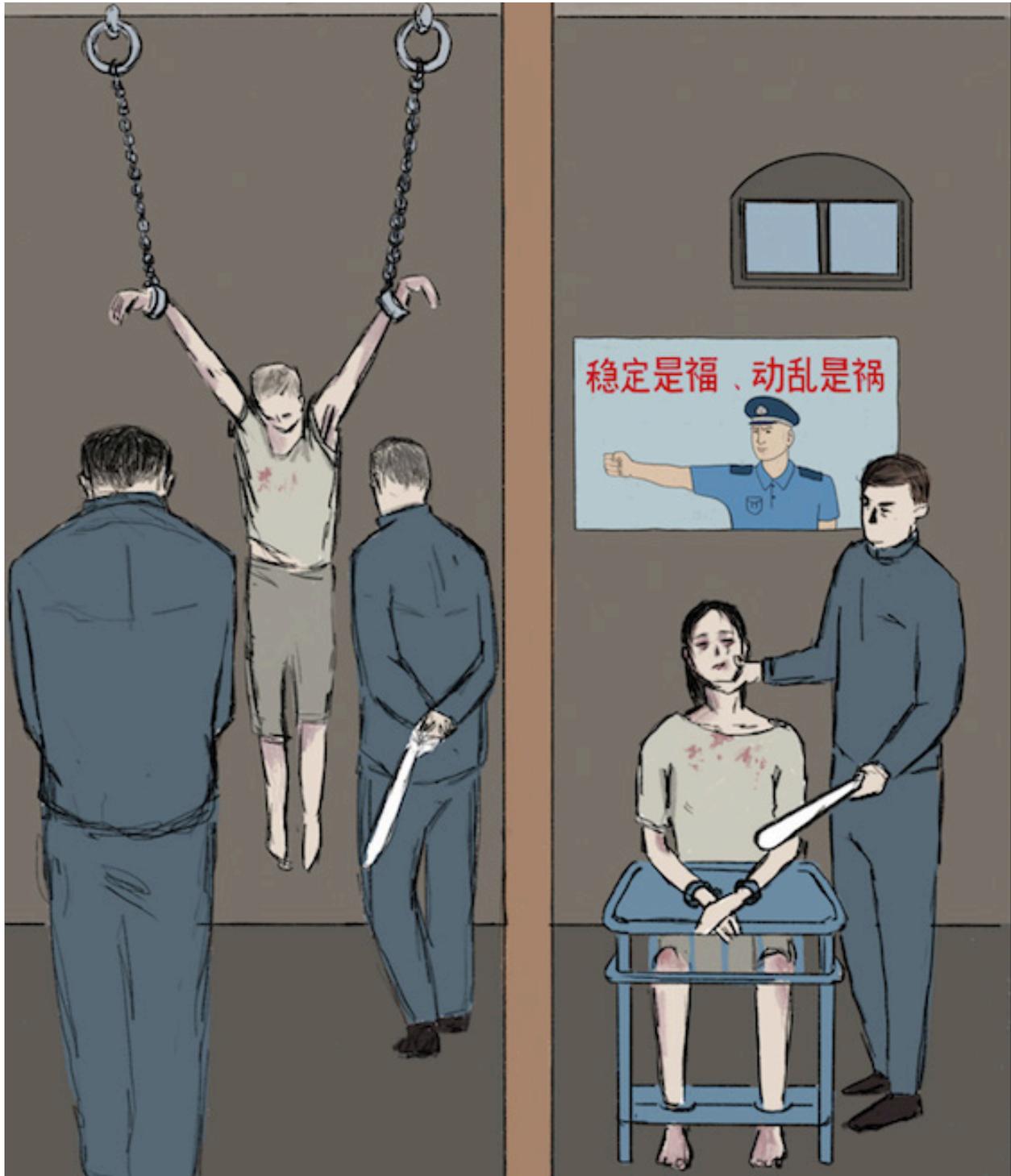
审讯室是每一个集中营受害者第一次面临坎坷的地方。在被带到审讯室之前，集中营的第一个入口处给他们的手和脚戴上镣铐。审讯室大多用摄像头进行监控，也有没有摄像头的，被害人称之为“黑屋”的审讯室，这些审讯室里面还有一张床，对女性的性侵犯往往在这里发生。我们的采访对象里面也有遭到性侵犯的男性受害者。在审讯室里，被讯问的人坐在一个叫做“老虎凳”的椅子上。老虎凳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刑具，坐者的手脚被固定起来，不能动。它的作用是在酷刑期间确保囚犯不能因为自卫做任何的动作。

审讯室里经常进行，粗暴殴打、强光照射、电棍触电、指甲下面扎针、拔指甲、生殖器里面插入钩装金属、铁链长吊、用链条和铁丝鞭打、强奸、饥饿、口渴、失眠等酷刑。拿外部家庭成员（如果有的话）威胁也很常见。

在集中营，受害者在第一次审讯期间被撕的破烂不堪的衣服，被蓝灰色囚服和中国式布鞋所替代。剃掉男女囚徒的头发是常见的做法。审讯囚徒的时间长度，取决于他能否满足他们的要求。如；囚犯承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为陷害其他人做“有罪”证明等。那些很快接受针对他们的指控的人通常会被送进监狱或集中营并受到重罚。因此，那些认识到认罪将带来严重后果的囚犯的审讯期会延续很长时间。有受害者称，在他们身上这些酷刑持续了6个月之久。

我们采访的集中营受害者之一奥马尔白克·阿利（Omerbek Ali）经历了与许多受害者相似的苦难：“第一个小时后，因为我不接受诽谤，他们的反应变得严厉了，然后开始使用电棍。我承受了他们的电棍，然后他们开始用橡胶棍了。我坐在老虎凳上，他们就是这样打我的。然后他们把我从椅子上抬起来，把我的手绑在天花板上，继续打。一段时间后，他们用工具折磨生殖器和敏感部位来施加我的疼痛感。然后他们在我的指甲下面插入细的金属针继续折磨我。他们没有问别的。只是一边向我实施酷刑一边说“你犯罪了，你必须得认罪。” 他们一边折磨，一边侮辱我。说：“你以为你有哈萨克斯坦护照就与别人不同了是吗？哪怕你有美国护照我们也是不屑一顾。” 他们实施酷刑的时候显得很享受。如果你看到他们，你会怀疑他们的人性。在这种审讯过程中，他们会折磨囚徒几个小时，然后休息一下，去吃饭或抽烟，然后再回来继续折磨。他们为了让我认罪实施了很多酷刑，但我说：“随便你打我还是杀我，我就是不会接受”。我是一名旅游从业人员，我被指控带人去西方国家。我带团去国外都是合法的。这怎么可能是犯罪呢？审讯就这样持续了四天。他们每天给我半升水和一小块面包。被打的很想喝水，但没有力气去喝。酷刑日夜持续了四天。

整整四天，我不是被铁链绑在墙上，就是被吊在空中或坐在老虎凳上。就在这时，我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女性用维吾尔语的尖叫声，“求你们杀了我吧！”，我听得撕心裂肺。（受访者回忆这些哭了起来）



我的身体就像腐烂的肉一样。我身上没有一处是不留下酷刑痕迹的。踩在地上的时候脚底疼得厉害。我脚上的那些锁链对我来简直是煎熬。我们在集中营里睡觉的地方边缘有铁栏杆，我们总是被绑在那里，他们像动物一样把我们拴起来。不被当人看，极度的虐待让我特别难受。⁸⁶

⁸⁶ 2021年3月24日对奥马尔白克·阿利（Omerbek Ali）的采访

我们采访的集中营受害者之一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这样讲述集中营内所看到的酷刑：“有一个名字叫阿布都萨拉木（Abdusselam）的维吾尔年轻人，他们把他带走了。当他从酷刑中回来时，他的双臂已经瘫痪了。他们指派我去帮那个孩子上厕所。当我问他的胳膊怎么回事时，他说：“他们把我的双臂吊在天花板上，脚不能接触过地面。四天后他们把我解下来时，我的双臂就这样了”。当我把他的裤子拉下来的时候，看到他的皮肤已经变得又黑又烂了。他那时候才30岁。⁸⁷”

集中营里的牢房一般屋顶都是高高的，里面3米乘6米，18平方米。里面被摄像头监视。还有一个扩音器供警察在需要时发出指令。厕所在房间里面，四周是开放的。牢房里没有水，包括厕所也是。由于开放式和无水厕所，囚犯无法洗澡，因此皮肤病非常普遍。在18平方米的牢房里，一般关闭18-25名囚犯。牢房越大，囚犯会越多。那些住过18、25、30、50 和 60 人牢房的受害者叙述的共同点是，囚犯都不能同时躺下。他们说，他们甚至尽可能地推迟上厕所，以免躺不下的人占位。这意味着人们轮流睡觉。受害者说一两个小时轮流躺下来休息。站着的人想办法靠墙休息一点。牢房的地板是混凝土的。没有任何铺在上面当床的材料。

受害者称，他们白天只能得到一杯水（有些陈述里是热水）、一个小馒头、白菜和茄子烫作为食物。这种极度不良的营养以及其他可怕的酷刑会导致大量受害者出现体重急剧下降和健康问题。在集中营呆了8个月的奥马尔白克·阿利（Omerbek Ali）说，他从被关进集中营时候的115公斤，出来时瘦到 60 公斤了。⁸⁸

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以及酷刑，这些集中营里的囚犯里面普遍产生了严重的健康问题，而集中营里不提供任何的医疗救治。在受害人的证词中，集中营里的一些人因为有痔疮而肠子凸出一英寸多；有些人肾脏在酷刑中受损，尿中有血；有些人昏倒在地上2-3个小时，但没能得到任何医疗干预；也有一些人的腿在酷刑中被打断，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失去了行走能力；有些人的臀部被打断，但没有给予医疗救助；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无数人严重受伤。

我们了解到，即使是在集中营里呆了很短时间（8-9个月）的受害者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健康问题。尤其对女性而言，由于系统性的性暴力，给生殖系统和直肠-大肠留下永久性损伤。也有男性受害者失去性健康的证词。那些集中营里幸存下来得以释放的受害者亲属看到他们的照片和视频的时候，所有受害者的亲属都说他们变得非常老，身体不健康，特别虚弱而且变瘦。许多在被带到集中营时身体健康且能够行走的受害者，获释后几乎都到了通过其他人的照顾才能生存的地步。离开集中营之后不得不使用轮椅或拐杖的现象很常见。

喀利尧拉·图尔逊（Kaliyolla Tursun）是一名 70 多岁的哈萨克族老人、也是中共党员和退休的公务员。他的遭遇，是证明集中营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的众多例子之一。他儿子阿克喀提（Akikat）说，据他父亲住在同一个集中营的受害者以及能够两次探视他父亲的一个教师和亲戚那里了解到，作为一个老实公民的喀利尧拉（Kaliyolla），因写给北京的两份请愿信而被带到

⁸⁷ 2021年3月24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的采访

⁸⁸ 2021年3月24日对奥马尔白克·阿利（Omerbek Ali）的采访

集中营。他无法拒绝珠玛·阿盖（Cuma Ağay）妻子的请求（身体健康的珠玛·阿盖（Cuma Ağay）被关进集中营之后过一段时间家人就收到他的遗体），加上他的遭遇和无法理解的大规模抓捕，用两封请愿信把情况反映到北京。寄出请愿信四天后，他被警方逮捕。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在他被审讯的牢房旁边的牢房里受到审问。他们能听到喀利尧拉（Kalyolla）在酷刑期间的尖叫声。他的家人在集中营里关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他们被释放后，利用一切的关系，千辛万苦得到了探视喀利尧拉（Kalyolla）的机会。第一次探视时，他的手脚都被铐上了镣铐，手脚的镣铐也被铁链连在一起。他看起来病得很重，筋疲力尽。他身边有两个警察，不许拥抱和哭泣。而第二次探视时，喀利尧拉（Kalyolla）的手脚上都没有了镣铐。换句话说，警察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了，因为喀利尧拉（Kalyolla）身体已经瘫痪，神志不清了。他的家人被当局强迫拍摄宣传视频，以便他在海外的儿子结束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由于他们不接受，重新被带回了集中营。喀利尧拉（Kalyolla）的儿子阿克喀提（Akikat）他父亲去世之后过很长时间才得知这一消息的。他不知道他父亲何时怎么死的，只得到了父亲的死讯和父亲的遗体没有交给他亲戚的消息⁸⁹。

所有男女受害者都谈到，他们在集中营关押期间每个月两次从门窗伸出手臂采集血液样本以及定期被迫吞咽药丸的事实。

中国政府把这些集中营描述为“教育中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在临时拘留中心，尤其是集中营，每天有14-15小时的“培训”。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

被迫在集中营教中文的乌兹别克裔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在采访中给我们讲述了所谓的教育和教学条件：“那是一个四层高的一栋楼，入口处有电子扫描设备，墙上有铁丝网和电线。穿过很多指纹识别的双层铁门才能进入里面。培训是在一个大礼堂里进行。

大堂里没有桌子或椅子。只有小孩子能坐大小的金属凳子。当我在黑板上写中文时，听到后面传来哭声。当我回头看时，那些老人们的泪水顺着胡须流了下来。大部分在60-70岁之间。里面有7个老太太，其中3个年龄70岁以上，剩下的60岁以上。2017年3月之后，带到集中营里的人数突然开始增加了。集中营里有了7-8千人。他们的身上都有编号。我从早教到晚。上完课后我被警察送回家里。我白天不被允许使用手机。

⁸⁹ 2021年4月25日对阿克喀提·喀利尧拉（Akikat Kaliyolla）的采访



他们被迫背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我教的第一批囚徒大部分是老年神职人员，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说中文。后来密集关进来的大部分是出国留学的学生。所以他们知道中文。例如，在土耳其留学回来的很多学生都在我所在的集中营里，也有不少从美国和埃及回来的留学生。那些出国旅行去过被认为敏感国家的人也被关在集中营里。因为在手机里有去海外的时候拍的照片而被抓的人也很多。我在与警察的聊天中了解了这一点。

除了上课之外，我一直无法跟集中营里的受害者沟通。因为我们严禁用维吾尔语与他们交流。其中我认出了我在乌鲁木齐家附近清真寺里做阿訇的一位老人。有一次他说：“我有五个孩子，告诉我的孩子们我在这里，我还活着。”他希望我把他的消息传达给他的孩子，但我一直无法回答那个人。几天后，他消失了。阿訇之后，又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实在忍不了，一天中午我在午休的时候他跟我讲：“我在你乌鲁木齐的房子周围有一家蔬菜水果店，我妻子在经营。她快要生了。请帮我告诉她，让她知道我还活着。”然后那个小伙子也消失了。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这些人在集中营里。父亲不知道儿子的下落，孩子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家人被带到了什么地方。如果有人的丈夫被带走，妻子去派出所问“我的丈夫在哪里？”，警察会威胁说“如果你再敢问，我们把你也会带走”。我在那儿根本说不了话。我在集中营做老师之前，他们让我我签字的保密协议中有我们不能向任何人透露集中营有关的任何信息的条款。他们同时威胁我，如果你要是透露任何信息将把你一家人都关进集中营。这就是我不能为任何人传达消息的原因。但我看到了其他人谈论集中营。在我上下班时，有时警察会把我送到公交车站。有时我能赶上公交车。赶不上时，我就搭路过的维吾尔人的车。其中一个人讲：“我给儿子开了一家卖机票的办公室。”他儿子给一个人卖了两张去往土耳其的机票。就因为这个被关进了集中营。就因为卖两张票，他儿子被指控为“帮助和教唆恐怖分子”被逮捕。那个人边哭边问儿子的下落去了很多派出所。

我在集中营里教学的6个月里，里面的人没有洗过一次澡。他们甚至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去上厕所。男女囚徒的头发都被剃光。

我们一直给他们教中国共产党歌曲。当囚犯们不上课时，他们只能在牢房里盯着墙壁静坐。我们上课的时候，警察会过来，说出5-6个人的名字，然后把他们带走。教室下方是审讯室。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一直在尖叫。那些被酷刑的人一个月都不能上课。他们遭受的酷刑难以用语言形容。我问一个警察，“你是怎么折磨人的？”让囚犯坐在电椅上：老虎凳。他谈到了一种戴在囚徒头上并通电的装置。又描述了一种外表像手套一样，会让人的手灼伤的酷刑。有一位开工厂的企业家。他可能认为，如果他很快学会中文和共产主义歌曲就可以自由了。因此他学的也非常刻苦。有一天他们把那个人带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期间我打探警察，问那个人的下落，他们说：“他有心脏病，审讯期间死了。”我每次问一些他们带过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的下落时，他们给我同样的答案。而这种去了就没有回来的人也很多。我亲眼看到了他们之间两个人的尸体。集中营里的每个人每天只能上3次厕所，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不出来的，警察会把他们拉出来酷刑折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患有前列腺疾病。

我是在集中营刚建立的时候来的。我也知道其中一些人刚来时的状态，我能看到他们的变化。他们在水泥地上睡觉。没有可以坐的东西。他们必须坐在水泥地上，静静地看墙壁。牢房是黑暗的，从来看不到一丝阳光。刚来的时候，大部分老人看上去还很健康的，但到了后期，连坐都坐不下来了。他们的脸色都是重病患者一样。他们的状态的确非常糟糕。他们变得越来越无意识。

他们只是在麻木地看周围。只是为了上课而上课。我根本无法与他们沟通。最初，有几个让我告诉他们家人他们还活着的人被带到审讯室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所以没有人敢说话。当我看不到那些熟悉的面孔时，问他们的下落。警察说：“我们派他们去上班了”或者说“他生病死了”。我听说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其中一些成了清真器官的供体，而另外一些则被送到工厂进行强迫劳动。⁹⁰

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里面有大量的老人是增加集中营受害者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些被传来死亡消息的人，遗体不会交给亲属（如果外面有亲属的话）。亲历者认为，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家属记录受害者遗体身上被酷刑折磨的痕迹和证据。著名宗教学者、新疆伊斯兰学院的退休教授，维吾尔人里面很有名望的90岁老人阿比丁·阿尤普（Abidin Ayup）是目前已知被关押在集中营中最年长的人。我们采访的受害者亲属鲜姆斯亚·阿里（Semsiye Ali）的姑姑（阿比丁·阿尤普（Abidin Ayup）的儿媳妇阿斯亚·买买提）在内阿尤普（Ayup）家许多家庭成员也在集中营中。她得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⁹¹。

据外界猜测，阿比丁·阿尤普（Abidin Ayup）教授与许多受人尊敬的维吾尔宗教学者一起被关押在图木舒克监狱。

在集中营做汉语老师的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对宗教长老们在集中营内状况的观察：“在我进入上课大厅的时候，看到我在集中营入口处遇到的神职人员，我很惊讶他们在那里，他们的手脚被拷着镣铐，同时镣铐还拴在一起。我在黑板上写中文的时候后面传来哭泣声。回头一看，那些年老的宗教学者在哭。我看他们的状态心里非常难受。他们都是老人。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戴着手铐和锁链哭泣的情景。⁹²”（边说边哭）

在集中营呆了大约一年的出租车司机巴克提阿里（Baktiali）采访中给我们讲述了那里的所谓培训和集中营的条件：“当我发烧时，他们带我去看了那里的汉族医生。我发烧的很明显，但医生说，“他在撒谎，打他，让他说实话。”然后警察就开始使劲打我。用警棍打。他们打完之后，就把我带回了那个培训中心。我即使是生病，即使他们把我打的遍体鳞伤，仍然把我带到那里，他们让我坐在两个人之间。我在医生那里被殴打时，我的手腕骨折了。从集中营释放后，我做体检查出了9种疾病：我的肾脏、肺、心脏、胃等……

另外一次被打了之后手脚都肿了。当时我就感觉马上要晕倒一样。即便是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我每天都被带去并坐着上课。我试图学着唱歌，但我没有力气唱或记住任何东西。坐在我前面的年轻人倒地昏了过去。他一动不动。他们叫了那里的汉族医生。那个汉族医生说：“他也在装病。”那个年轻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躺了几个小时，没人进行干预。之后从外面来了一个医生，他们看了看，说：“他可能是脑溢血了”。然后那个年轻人就被拉走了。我们没有再见到他。那年他36岁。他的名字是阿布拉米提（Ablimit）。察布查尔县人。

⁹⁰ 2021年3月24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的采访

⁹¹ 2021年4月7日对鲜姆斯亚·阿里（Semsiye Ali）的采访

⁹² 2021年3月24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的采访

我看到了另一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是维吾尔人。那个年轻人从集中营被送往医院。当他回来时，我们注意到他的胸口已经被切开并重新缝合了。第二天那个年轻人死了。他也是察布查尔人，是马扎尔乡的⁹³。

我们从阿尔泰地区吉米乃县的集中营受害者塔碧瑟汗·玛鲁布刊（Tabishan Marubkan）那里听到的消息与其他受害者所说的一致：“里面精神崩溃的人很多，他们有些人根本无法说话，有些人头疼得厉害。因为头疼受不了，他们用头撞墙。我们抱着他们，以防他们受伤。地下有一个房间，叫做思考室。酷刑也在那里实施。牢房的墙壁上没有防护海绵。如果有人用头撞墙，我们必须立即制止。每个人都被安排负责另外一个人，必须得时时刻刻观察负责对象，保证不能让他自杀。如果一个牢房有六个人，那么其中四个在睡觉时另外两个人必须不睡觉看守。这是那里防止囚犯自杀的规定。因为在每个人的心目中，自杀像是一种解脱。⁹⁴”

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也讲述了类似的事情：“我每天都在心理和身体上受到折磨。即使在没有酷刑的日子里，我坐在金属板凳上学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汉语15-16个小时左右。我坐的全身都肿胀和疼痛。我们总是又饿又渴。我们只能睡四个小时。在我的脑海中和默默祈祷中，总是想着快点死亡。我认为死就是解脱。在里面我最渴望的就是死亡。⁹⁵”

⁹³ 2021年4月10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的采访

⁹⁴ 2021年5月14日对塔碧瑟汗·玛鲁布刊（Tabishan Marubkan）的采访

⁹⁵ 2021年4月10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的采访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著名维吾尔学者、经济学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土赫提是维吾尔人里面最受尊敬的意见领袖之一。土赫提 (Tohti) 既是自己所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又是精通汉语，英语，日语，乌尔都语，韩语，俄语及维吾尔语在内的其他突厥语言的世界知名的知识分子。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土赫提 (Tohti) 教授加强研究怎么解决他所属的维吾尔人面临的问题。

他与汉族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友谊，并与中国官员建立了联系，他经常与他们分享解决方案。土赫提 (Tohti) 主张的“对话解决问题”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始终保持“确保维吾尔人和汉人在维吾尔地区携手前进是我的历史责任…… 维吾尔问题将在维吾尔人和汉人对话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⁹⁶”立场的土赫提 (Tohti)，经常被一些海外的维吾尔精英批评为“把中国的领土完整放在首位”的人。然而，伊力哈木 (Ilham) 教授不管在他的支持者，批评者以及中西方知识分子中间一直都是受人尊敬的一个名字。

土赫提 (Tohti) 认为，他所属的维吾尔民族长期以来经济上被落后，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和定期遭受屠杀的命运通过国家宪法赋予少数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的时候才能得到解决。他相信通过劝说北京当局解决问题是可能的。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教授说：“与其惩罚那些说国王不穿衣服的数百万人，给国王穿上衣服的成本岂不是可以为我们的国家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和矛盾呢？⁹⁷”

⁹⁶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2015). 监狱里的领袖伊力哈木·土赫提—我的道路和我的目标：维吾尔突厥人和中国问题，希拉 (Sira) 出版社. 2015年9月. 哈密提·格克图尔克 (Hamit Gokturk) 编译

⁹⁷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2009). 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座. 2009年10月29日

土赫提（Tohti）的风格和言辞是开创性的。他说过：“这个国家有两个中国：一个属于人民，一个属于当权者。我喜欢属于人民的中国。我把希望寄托于属于人民的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努力巩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友谊。⁹⁸”。以这种言辞和风格，他是一个不太可能被中国政府打压的名字。

就在被拘留前不久，土赫提（Tohti）描述了他的努力和对他施加的巨大压力：“维吾尔人的自由取决于中国人民的理解。用其他方式很难实现自由。这就是我为什么试图向中国社会和政府解释维吾尔人的问题……我呼吁中国人的良心。我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并真诚地采取行动。但官方的意图是不好的。我觉得他们已经有了要迫害我的想法。⁹⁹”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教授在2013年与女儿一起准备出国的时候在首都机场受到阻拦。当局允许了他女儿菊儿·伊力哈木（Cevher Ilham）离开中国，但没有允许土赫提（Tohti）。他于2014年1月在家中被拘留。2014年9月，他以分裂国家和煽动民族仇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他被捕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向他的同胞传达了一个中国当局可能对他进行迫害的消息：“如果他们说我在里面自杀了，请我的同胞不要相信。我不可能自杀。¹⁰⁰”

2014年是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首次实施集中营试点的一年。2013年土赫提（Tohti）被限制出国，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不让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至少从2013年开始筹划非理性的维稳政策和在集中营里实行激进的汉化计划。这起事件是表露中国政府意图的众多事件之一。

⁹⁸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2013). 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记者董方的采访. 2013年11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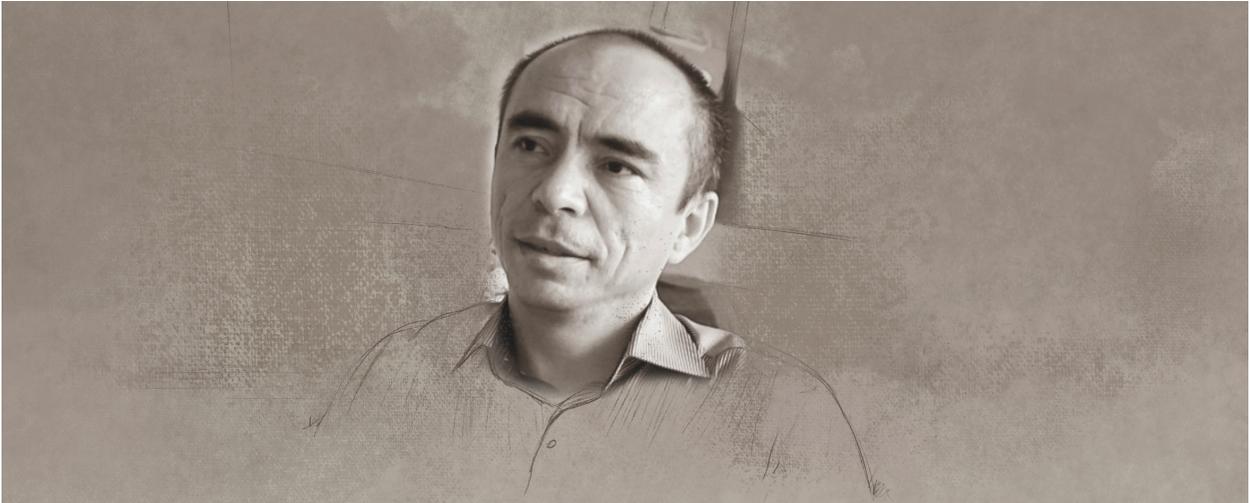
⁹⁹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2014).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的讲话. （RFA维吾尔频道）. 2014年1月31日。

¹⁰⁰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2014).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的讲话. （RFA维吾尔频道）. 2014年1月31日。



亚力坤·肉孜 (Yalkun Rozi)

亚力坤·肉孜 (Yalkun Rozi) 是著名的维吾尔文学评论家、出版商、编辑和作家。同时在新疆教育出版社任职的肉孜 (Rozi)，被外界称为维吾尔文学的权威。他于2016年10月被捕。2018年，中国政府宣布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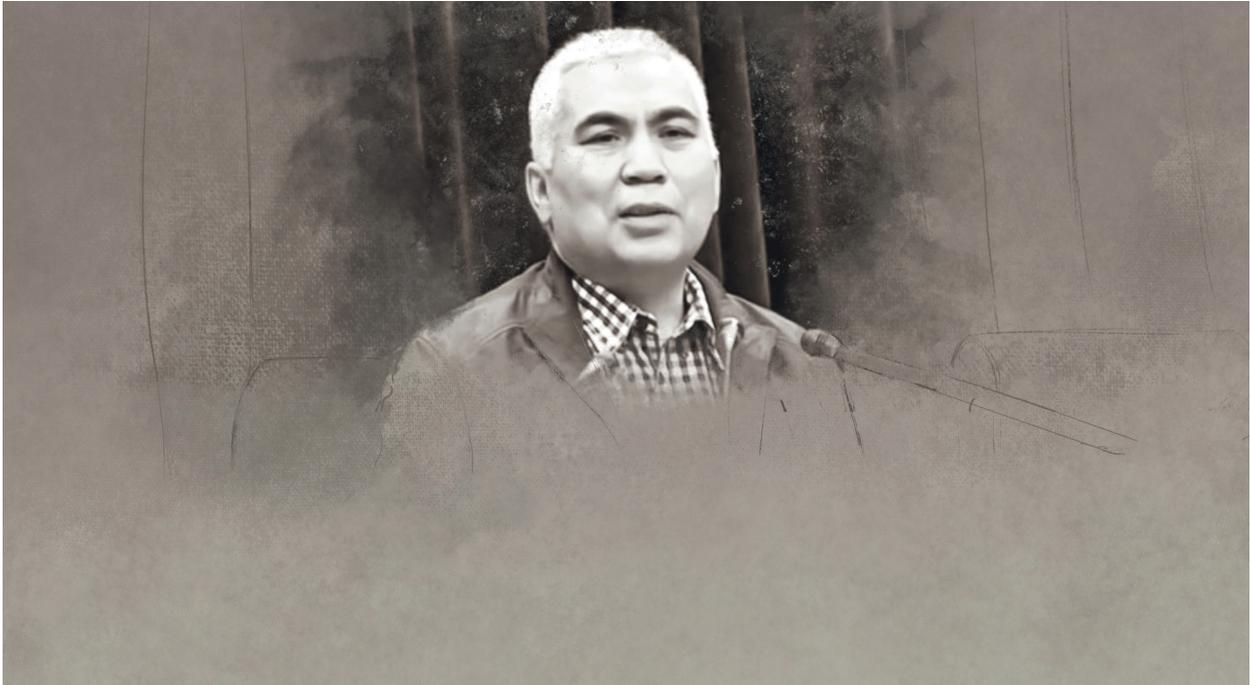
法尔哈德·图尔荪 (Ferhat Tursun)

诗人和长篇小说作家。1999年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而引起文坛的关注。他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弗洛伊德、叔本华风格和哲学分析对维吾尔文坛增加了新鲜风采。就像每一个新人一样，他的风格很奇怪，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甚至一度成为维吾尔传统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亚力坤·肉孜 (Yalkun Rozi) 的严厉批评对象。图尔荪 (Tursun) 崇尚高度自由的写作风格冒犯过不少人。有人称他为中国的萨尔曼·鲁西迪 (Selman Rushdie)。两人的文学论战开始后持续升温，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法尔哈德·图尔荪 (Ferhat Tursun) 在2015年10月接受《外交政策》杂志的采访时说过：“宗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像文学一样，就像诗歌一样，它是美丽的。但有些人把宗教变得很可怕。”

他于2018年1月被拘留。2019年外界得到了他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的消息，但一直无法证实。

他和他最大的“反对者” 亚力坤·肉孜 (Yalkun Rozi) 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文学家和维吾尔人。他们被判处类似刑罚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维吾尔人。



阿布都卡德尔·加拉力丁 (Abdulkadir Celaledin)

著名的维吾尔诗人，学者。阿布都卡德尔·加拉力丁 (Abdulkadir Celaledin) 曾经是新疆大学维吾尔文学系的教授。像许多维吾尔学者一样，他也是中共党员。2018年1月29日，他被头上套上黑色袋子逮捕。当局称他被带到了“再教育”集中营。自从他被带走之日起，外界得不到他的消息。¹⁰¹ 被认为加拉力丁 (Celaledin) 在集中营里写/说的，随着在集中营里与他关在一起的一些受害者被释放而流传出来的一首诗，作为集中营的第一个已知文学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¹⁰¹ 2021年4月7日对巴布尔·加拉力丁 (Babur Celaledin) 的采访

无回头

身置黑暗角，无相亲，

唯噩梦相伴，无护符。

除此吾余生，无别欲，

思乱未心静，无奈故。

俺是谁何故，无从知，

向谁诉我苦，无可悉。

老天爷之意，无心知，

欲相聚情人，无决意。

春夏秋冬易，望洞晓，

盛开的花朵，无问候。

情思已入骨，从何时，

我辈等只来，无回头。

（福尔凯特·马赫穆德·噶孜—Furkat Mahmut Ghazi—译）

5.5 集中营里的女人们

在集中营呆了一年多的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和在集中营当了6个月中文教师的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故事，就像恐怖电影中的场景¹⁰²⁻¹⁰³。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城市的集中营里呆过的古丽巴哈尔 (Gulbahar) 和喀丽比努尔 (Kalbinur) 那里我们得到了集中营中妇女们状况的非常详细的信息，他们的证词与男性集中营受害者关于那里面妇女状况的有限证词不谋而合。

我们知道集中营中有14-80岁的女性。在初次拘留和审讯后转移到集中营的妇女不同于男性的第一个程序：在血液和尿液检查中检查她们是否怀孕。那些怀孕的妇女无论处于何种妊娠阶段，均终止妊娠。24岁的再乃普·阿布都热西提 (Zeynep Abdurresit) 因在埃及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而被带到集中营，那时候她已经怀孕两个月，并且出现了所有常见的怀孕症状。在她被带到集中营很久之后，当局通知她的家人“她没有怀孕”（当局在他丈夫所在国家的大力外交努力下才向家人通知她的情况）¹⁰⁴。维吾尔自治区的堕胎不是仅限于集中营的侵犯人权行为。在该地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执行堕胎政策。据了解，在维吾尔自治区，超出生育指标怀孕的妇女，为了逃避政府的强制堕胎，在怀孕期间经常隐藏起来。她们不得不每天呆在家里不能出门。然而，有许多当事者陈述，当局通过突然的家访和阶段性检验来试图发现此类怀孕者。当发现这类怀孕时，在警方的监督下进行强制堕胎，并在同一手术中进行永久性绝育。据受害者称，对女性身体的强制干预不仅限于此。另一个造成集中营中的妇女普遍没有月经的原因是定期让她们吃的颗粒药。

受害者称，被带到集中营的妇女之间处在哺乳期女性被注射了特殊的针剂，之后她们的乳汁就断了。开放式的厕所（牢房一角的洞），给这些女性造成额外的心里负担。因为不仅给住在同一个牢房的人，还有从摄像头和隔着玻璃监视他们的警察都能看到他们。所有女子集中营的警察都是男性（有的集中营配两名汉族女警）。在男子集中营虽然数量很少，但也有维吾尔警察与汉族警察一起执勤的情况。而女子集中营中没有维吾尔警察。

临时拘留中心和监狱中有一些女警官。男性看守人员的这种异常集中是有特殊原因的。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曾在一个8千至1万人的女子集中营当过老师，她说：“第一天我去妇女们所在的集中营，我看到一个18-20岁的年轻女孩被抬着担架拉出去。当时，我看到了一个我认识的警察，于是我们低声说：“我们下午见吧”。下午，警察说，那里的妇女经常被注射一种液体和强制服药，这是一种导致绝育和各种疾病的项目（实验研究）。这些药对担架上的女孩产生了副作用。她的月经一个半月来一直没有停过。女孩是流血致死的。所有的警察都是汉族人。他们非常渴望在那里工作。因为他们在那儿可以随时随地强奸妇女。我经常听到他们用电棍折磨她们的肛门、生殖器、嘴巴和耳朵。不时有维吾尔族警察从集中营外赶来。他们隔着开饭时拿食物的玻璃窗户问那些妇女：“他们强奸了你吗？”妇女们无法回答，她们开始哭泣。

¹⁰² 2021年4月26日对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的采访

¹⁰³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¹⁰⁴ 2021年3月26日对阿勒玛斯·尼扎麦丁 (Almas Nizameddin) 的采访

汉族警察过去常常在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互相谈论这些事情。这些事儿随着他们之间的传播最终传到他们上级的耳朵里。上级认为这样的事情传出去听起来不好，所以他们派维吾尔族警察去询问和查实¹⁰⁵。

阿卜杜拉·拉苏尔 (Abdullah Rasul) 说，他72岁的阿姨热沙来提 (Risalet) 的遗体在她被带到集中营后不久，在警察的陪同下交给了她的家人。他的堂兄看到她阿姨的遗体上有许多酷刑痕迹，并离开中国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¹⁰⁶。

古丽巴哈尔 (Gulbahar) 描述了她在女子集中营里第一次看到的情况：“他们让我从704号门进来。在狭小的房间里，许多女人挤在一起。年轻的女孩子们在一个狭小的走廊里并排站着，由于拥挤没办法每个人都睡觉。一进门，看到里面的女人头发凌乱，连发夹和橡皮筋都没有。他们看起来很可怜。我开始哭，边说“我怎么会关在这个地方，我有什么罪”。一个女人靠近我说：“不要哭，我们都没有罪，你哭了，他们会惩罚你的。”

我们的牢房里有40个人。都是14到80岁的妇女。每个人的手脚上都戴着铁质的镣铐，手脚之间的镣铐也是用铁链连在一起的。两只脚和一只手被锁着。牢房长5米，宽3米，高度在5-6米左右。中间把大概一米宽的地方得空出来供上厕所的人使用。厕所在房间里面，没有门。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不得不暴露隐私部位，尤其是小女孩，上厕所时感到非常害羞。他们每个月一次允许我们在冷水中沐浴一分钟。（沐浴许可和时间因不同的集中营而有不同的规定）没有肥皂。即使上完厕所，我们也不能洗手。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然后我们身上出现了伤口，我们长了虱子。当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上有虱子时，他们就会剃光我们的头发。

早上吃一个小馒头和用面粉和水混合而成的冷汤。中午他们只给特别硬的面包，我们掰它的时候经常看到面包发霉了。有时他们给白菜汤，能吃到白菜汤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很幸运。

头三个月他们每周给我们换一次牢房，这样我们就不会知道彼此的情况。总是有人从牢房里被叫出去，但他们不会跟我们讲把这些人带到那里。但我看到有人因酷刑而死，叫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也有被扎针扎死的。有些人从审讯回来时指甲已经被拔掉了。也有指甲下面扎针的。我见过这期间精神崩溃失去知觉的。

当老年妇女晕倒时，我们把她躺在上厕所用的牢房中间狭小的走廊式空地上，这时候医生会过来给她们的脸擦点东西。如果过了两三个小时还没醒来，就会把她们拖走。这时候我们想那个人估计已经死了。有一个27岁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月热耶提 (Hurriyet)。他们把月热耶提 (Hurriyet) 带到了审讯处，可怜的女孩遭受了严刑拷打，当他们把她带回来时，她已经失去了理智。她不停地喊叫。当她不停地喊叫时，他们在午夜把一个黑色的袋子套在她的头上，然后

¹⁰⁵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¹⁰⁶ 2021年4月6日对阿卜杜拉·拉苏尔 (Abdullah Rasul) 的采访

把她带到黑屋里（有床但没有摄像头的房间）。一周后，我的心脏病发作，他们带我去看医生时¹⁰⁷，我看到月热耶提（Hurriyet）的遗体被担架抬着出去。我跟月热耶提（Hurriyet）只做了一个星期的狱友。她是因为带着七岁的女儿去过土耳其而被关进集中营的。

他们每个月给我们吃两次药。每十天用针管从门上的小窗口里抽血。服用了药物之后女性的月经都停止了。我们感觉自己在那个集中营出生和长大一样。我们甚至无法想念我们的家人，无法想我们自己。我们只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给我们馒头。

我第一次从一个25岁的女孩那里了解到黑屋和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在她被关押的集中营审讯室里，警察把她的双手用铁链吊在天花板上，泼冷水，用铁链殴打。我问她是否遭到性侵时，她没有说是或否，只是伤心地哭了。她名叫阿尔祖罕（Arzuhan）。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强奸和性侵。然后我问的每个女人都哭了。当我被问到这件事时，我也开始哭了。因为他们开始拉我去黑屋了。

我在被关的集中营里看到了两个审讯室。一个是在地下，有摄像头。审讯的时候哪怕我们大喊大叫，也没有人听到。当我们去另一个审讯室的时候，他们会把黑色的袋子套在我们头上。那里没有摄像头，只有床。我在那里也被性侵了很多次，想到此我无法回神，每次提到这个经历只想哭。每次三个人施暴。他们在24小时内不间断地审问了我。不给我水，也不让我上厕所。我不知道他们总共多少次带我去没有摄像头的黑屋，但我不断地遭到骚扰、强奸。两个警察拉着我的手，另一个警察在施暴。经常这样。我被关押之后，头三个月没有审问我。三个月之后开始审问我了。我不知道他们审讯我多少次。他们经常过来把我带走，一边审讯一边酷刑，完了把我放回牢房，过几天又会把我带走审讯，就这样循环。

有一个名叫古丽扎拉（Gulzara）的36岁妇女。在乌鲁木齐开裁缝店的。古丽扎拉（Gulzara）每次带去审讯回来，她的脸上都是血，身上都是被殴打的痕迹。那里没有合法的审讯。随时拿着指控书过来，然后以审讯的名义把人带走进行强暴。

在那儿根本不管年龄。当我被带到集中营时52岁。那里实施酷刑和强奸妇女的大多都是年龄20多岁的汉族警察。他们施暴时，我喊着说“你们就没有母亲和姐妹吗？”，他们说，“你是畜生，你是人渣，你根本不配做母亲或姐姐”。（边说边哭）那个牢房里的每个人都受到了性侵犯。我知道每个人，无论年龄大小，都会受到了。¹⁰⁸”

¹⁰⁷ 我们猜测，由于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Gulbahar Celilova）是外国公民，加上她的家人对国际组织和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了强烈的申请，因此，她比作为中国公民的其他受害者得到了更多的基本医疗条件。

¹⁰⁸ 2021年4月26日对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Gulbahar Celilova）的采访



图罕·阿吉 (Tuhan Hacı)

53岁，四个孩子的母亲。她与丈夫在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的一个小镇从事农牧业。她是把自己奉献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她非常希望她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她的女儿们。她经常跟孩子们讲“教育会改变你们的命运，你们的将来会更加美好”。她的大女儿开始实现她的梦想。当她的女儿考入了中国很好的大学时，感到很欣慰。图罕 (Tuhan) 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她女儿是他们镇里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她的女儿没有辜负母亲的期待。大女儿又被海外的大学录取读博士。图罕 (Tuhan) 既高兴又担心。她焦虑的根源，是她很久以前做的一个梦。他们家飞走了四只鸟，其中三只回来了，另外一只没有回来。她在梦中等了那只鸟归来，等了多久……图罕 (Tuhan) 与她的女儿分享了她的梦，因为女儿上大学、读研究生，最终在海外读博士。“我怕”她说，“那只一去不复返的鸟就可能是你。”

图罕 (Tuhan) 是一位谦虚的母亲，她对孩子抱有希望。2017 年春天，当大规模抓捕开始时，她被带到了集中营。就像大多数家人和邻居一样。她被带走的时候，带走他的人说，一个月后转化教育就结束了，那时候就可以回家了。正如其他被带走的维吾尔人告诉其余的人一样。15天后，她那读博士的女儿得到了母亲被关集中营的消息。一年零三个月后，她从一名警察口中得知外婆已经去世。那些被带走的人所说的“一个月”的承诺一直没有实现。当地警察总是对图汗 (Tuhan) 的女儿说，“你妈妈很快就会被释放，如果你配合我们，一切都会加快”。他们说“你去参加大使馆安排的酒会”，她去了。他们说“跟当地的汉族学生一起拍照片分享”，她分享了。每当汉族警察不分昼夜，不分时差，打电话联系她时，她及时接了他们的电话。但她的母亲没有回来。他父亲被带走时身体健康，但从集中营回来时患有严重的视力丧失和行走困难等多种疾病了。当这份报告正在撰写时，离图罕·阿吉 (Tuhan Hacı) 带去集中营已经四年零三个月了。可是她还是没有回来。¹⁰⁹

¹⁰⁹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 (Rabigul Hacimammed) 的采访



米热阿依·艾尔肯 (Mihray Erkin)

她出生在维吾尔地区历史名城之一的喀什噶尔市，并以非常优异的成绩在上海完成了高等教育。从东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她开始在日本奈良科学技术研究所担任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员。跟海外的所有维吾尔人一样，米热阿依 (Mihray) 和她的家人均受到了中国警察的威胁。联系到她的警察，要求她跟海外的叔叔，维吾尔作家阿布都维力·阿尤普 (Abdulveli Ayup) 联系，让他不要在社交媒体和国际媒体上发表关于集中营的言论。米热阿依 (Mihray) 避免在她喀什噶尔的家人受到迫害，试图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

她的家人为了结束警察对他们家的压力，坚持让他们的女儿回国。他叔叔阿布都维力·阿尤普 (Abdulveli Ayup) 极力反对她这么做。他担心侄女回去后遭遇不测。2019年8月，Mihriay 在前往机场返回中国的途中最后一次与她的叔叔通了电话。她的叔叔没能阻止米热阿依 (Mihray) 回中国。就像米热阿依 (Mihray) 没能阻止他叔叔发表有关维吾尔人悲惨命运的文章一样。

2020年12月，米热阿依 (Mihray) 的家人收到了女儿在集中营死亡的消息。把她的遗体交给她家人时，政府要求家人宣布女儿在家里去世的，并为此时特别准备了一份正式声明。

直到2021年5月，阿布都维力·阿尤普 (Abdulveli Ayup) 才得知他侄女去世的消息，他懊悔没能阻止她返回中国。¹¹⁰

¹¹⁰ 2021年5月23日对阿布都维力·阿尤普 (Abdulveli Ayup) 的采访



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vut)

新疆大学教授。由于她在维吾尔文化方面的卓越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被称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她在所工作的大学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编制了维吾尔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综合目录。来自世界许多地方从事维吾尔研究的学者经常把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vut) 教授列为他们申请研究项目的首批专家之列。在维吾尔族女生眼里成为他们榜样的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vut) 教授被捕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和国际媒体上占越来越多的位置。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站出来讲述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vut) 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性格和帮助他们学习和研究的事迹。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vut) 于2017年12月被抓捕并关进集中营。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消息。

5.6 奴役劳动中心

尽管中国政府多年来在某些领域违背维吾尔人的意愿并以极低的工资强制他们劳动，但对维吾尔人的奴役政策直到最近几年随着集中营的讨论才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奴隶劳动，在习近平执政时期“脱贫攻坚”政策的名义下开始普遍起来。随着集中营的建立被纳入到集中营里，并以“职业教育”的名义下继续严格执行。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9年，相关研究成果和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自2018年以来，在集中营附近建造了数百家工厂，表明应该认真讨论奴隶劳动问题。

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是最早开展维吾尔人奴工政策研究的人之一，他表示，在中国政府的脱贫政策之下，2016年至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261万人（根据中国官方数据，该地区维吾尔人口的20%）改善所谓的经济状况而推出的六点计划如下：i）派遣工人到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工作，ii）派遣工人到中国内地工作，iii）派遣工人到中国政府控制的经济和准军事组织的新疆建设兵团，iv）v）派工人到卫星工厂工作和（vi）支持小规模自营职业计划¹¹¹。根据该计划，中国政府要求每户至少出一人在上述地区之一工作，声称这将提高维吾尔人的专业技能，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同一时期，政府大肆宣传工厂工作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解放，尤其是鼓励维吾尔妇女在这个计划内就业。

随着集中营的内幕和细节不断被曝光，奴隶劳动问题也相继浮出了水面。首先是集中营旁边建立起来的工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很快外界了解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据透露，中国强迫集中营外的维吾尔人从事奴工，无论他们去哪里工作，都在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2017年至2019年期间离开维吾尔自治区被迫奴役的维吾尔人超过8万人¹¹²。报告中的另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是，维吾尔人在技术，服装和汽车领域在内的82家全球知名品牌的供应链工厂中被迫劳动。随着舆论压力的增加，有些公司否认了这一信息¹¹³，一些公司开始对供应的工厂进行详细调查¹¹⁴，一些公司宣布中国政府应对这种情况负责¹¹⁵。报告发表后，2020年下半年很多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多项制裁措施。随着一些雇用奴役劳工的中国公司被列入黑名单。由于维吾尔人密集且被迫劳作棉花行业，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和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人权组织呼吁抵制中国的棉花产品。

¹¹¹ 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 (2019). 集中营之外：北京在新疆的强制劳动、扶贫和社会控制的长期计划. 政治风险杂志 7, No. 12. 2019. 2021年5月24日访问

¹¹²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2020). 维吾尔人在被出售：新疆以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视.

¹¹³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2020). 耐克的回应. 2021年5月24日访问

¹¹⁴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2020). 阿迪达斯的回应. 2021年5月24日访问

¹¹⁵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2020). 宝马的回应. 2021年5月24日访问

尽管事态发展与此，中国政府继续在集中营附近建造的工厂强迫维吾尔族工人劳动。此外，在集中营里完成所谓教育的维吾尔人在不通知家人的情况下，作为奴工被转移到全国各地的工厂。BBC详细的调查表明，数十万维吾尔人在棉花行业被迫做季节性工人¹¹⁶。对此调查感到不安的外交部传真给BBC，否认了维吾尔人被奴工的情况。外交部声称在维吾尔自治区工作的所有不同民族的工人都是自愿选择工作并在法律框架内签订劳动合同，同时补充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笑脸是对美国谎言和谣言的最好回应。¹¹⁷”

¹¹⁶ 约翰·萨德沃思 (John Sudworth). (2020). 中国的“污染”棉花. BBC. 202012月. 2021年5月4日访问

¹¹⁷ 约翰·萨德沃思 (John Sudworth). (2020). 中国的“污染”棉花. BBC. 202012月. 2021年5月4日访问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与外交部声称的“笑脸”相去甚远；我们在采访中获得了关于被迫为奴工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的重要信息。在我们对玛蒂娜·纳泽米（Medina Nazimi）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奴役劳动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期。在2000年代初期，居住在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的，其中一些未满18岁的维吾尔青年被政府承诺“赚大钱”并带到中国内地的工厂劳动。纳泽米（Nazimi）表示这是一个陷阱，当时一些年轻人离开农村从事这些工作，他们讲述的情况并不像承诺的那样。被带去工作的年轻人以极低的工资和不人道的环境下强迫工作。¹¹⁸ 例如，4-5人在饭店吃饭都轻松花500元，而那些被带去做奴工的维吾尔人的月工资才500-600元。因此，在这问题上我们可以说，维吾尔人面临的是奴役劳动和童工的两种侵犯人权行为。

¹¹⁸ 2021年4月8日对玛蒂娜·纳泽米（Medina Nazimi）的采访

我们采访的科学家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ahim Geni）从他自己的经历中证实，用儿童作为奴工并不是一种新的做法。艾尼（Geni）说：“在我当老师的那些年里，我目睹了强制性的棉花采摘。学校收到上级命令之后组织学生去摘棉花。我是亲自带学生去摘棉花的一名老师。” 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详细说明了集中营之前奴役劳动是如何实施的：“这种强迫劳动，尤其是摘棉花，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集中营之后出现的，但是在我当老师的2002-2004年已经存在了。在夏天，学生们被带去摘棉花，一天工作12小时。我侄女在二年级的时候也被带去摘棉花一个月。20年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孩子们被带到棉田之后在那边寄宿一个月。他们去那边住在谷仓里的稻草上。老师们可以在房子里睡觉。学生在此期间都不能洗澡。根据年龄有相应的配额。那些年龄小的每天得收集35公斤棉花，年龄比较大的40公斤，更大一些的45公斤棉花，他们必须完成这个配额。我们学校是维汉混合的学校，汉族学生也去，但他们摘棉花的时间比我们的短。他们只是呆两个星期，而且没有配额要求。对他们不要求必须完成多少公斤，只是说尽其所能吧。¹¹⁹”

通过对纳泽米（Nazimi）和艾尼（Geni）的采访，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在儿童身上实行的奴役劳动至少有20年之久。而在这一做法中与维吾尔人上同一个学校的汉族学生虽然也是强迫劳动，但与维吾尔学生相比条件更好，时间更短。

我们从人类学家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的采访中了解到，不仅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还有那些亲属在集中营里的人也都被当做奴工强制劳动。拜勒（Byler）描述了这两种被迫从事奴隶劳动的群体及其经历：“大多数从集中营中释放出来的人都被送到工厂进行强迫劳动。事实上，有时工厂的经理会来集中营挑选工人。我采访的人说，他们在里面要么没有工资，要么拿到最低工资的六分之一。而这点钱只够他们从工厂里的商店中购买基本需求的物品。晚上，他们不能回家，而是在厂房或者是工厂宿舍里睡觉。在这里，他们继续接受有关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教育。宿舍和工厂之间来回的路上，他们经常被搜身和检查手机。另一方面，集中营囚犯的亲属经常被送到工厂劳动。尽管他们的工作条件比从集中营送到工厂的人要好，但政府以旅行、住房和类似费用为借口削减他们的工资。虽然目前很难确定，但我们认为有数十万维吾尔人被迫从事奴隶劳动。¹²⁰”

我们对努尔斯曼·阿布都热西提（Nursiman Abdurresit）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不人道的条件下作为奴隶劳动的维吾尔儿童和青年负债累累，这与中国政府的“经济解放”主张背道而驰。阿布都热西提（Abdurresit）这样描述了她在一家纱线厂目睹的情况：“这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就这样做了。从2006年开始，他们通过与工厂签订协议，挑选那些没有上学或者是义务教育之后没有继续上高中的孩子，以“那个村200个女孩和200个男孩”等指标带过去强迫他们做一年的劳动。我当时在中国内地的一座城市上学。与我母亲同村的一些女孩被带到我所在的城市。我母亲的朋友请求说，‘我的女儿在你女儿上学的城市打工。我女儿在那儿吗？她好吗？你女儿能去看看她吗？’ 于是我去那个工厂。那是一个纺纱厂。厂长是我朋友的父亲，所以他们允许我进来了。我进去之后看到工厂很大，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在运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废弃的工厂，他们让一些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因为他们找到了廉价工人。

¹¹⁹ 2021年4月1日对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ahim Geni）的采访

¹²⁰ 2021年4月9日对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的采访

汉人上白班，维吾尔人上夜班。我进了一个房间。我在里面看到了一张纸，上看写道，‘这个人工作量这些，他的工资这些。那个人工作量这些，所以不能给他食物或床位。’。甚至有些人欠工厂800-1000元。换句话说，尽管他们工作了，但还是负债累累。¹²¹”

根据阿布都热西提（Abdurresit）在雇佣奴工的工厂中亲眼看到的情况，我们得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首先，其中有一些未成年的奴工们在被隔离，无法与家人联系的情况下强迫劳动。其次，中国政府实施“脱贫”和集中营项目之前，奴工的做法早已存在。第三，以“脱贫”或“经济发展”为名受雇的奴工，实际上是通过强制借贷的方式负债累累并受到处罚，同时被关押在工厂直到还清债务。因此我们需要从劳动剥削、虐待、强迫拘留等方面对强迫劳动进行调查。

来自乌鲁木齐的商人库扎提·阿勒泰（Kuzzat Altay）解释了虐待的程度及其对维吾尔人的影响：“我的两个叔叔阿布都维力（Abdulveli）和阿赫玛德（Ahmet）被强迫劳动。我叔叔阿赫玛德（Ahmet）的情况很不好。从星期一开始，在奴隶工厂工作到星期六晚上。他在乌鲁木齐附近的一个生产基地每天工作将近 16 个小时。他周一到周六晚上都呆在那里。星期六晚上回家，看望他的孩子，帮我父亲买些东西，然后在星期天晚上返回工作。在大的集中营里，维吾尔人要么被杀害，要么几乎快死的时候才被放出来。有些人死在里面，因此有些人愿意接受在工厂工作。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人，只要有劳动能力就派到工厂工作。象征性地给500元工资。就像东突厥斯坦的一些著名清真寺被开放，人们舒舒服服地祈祷一样，工厂里给工人的工资也是象征性的。由于恶劣的工作条件，经常会发生自杀事件。当有人自杀时，那里的工人会受到集体惩罚；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或周日也要工作。人们在想，‘如果我自杀了，工友们会因为我受到惩罚’。尽管如此，仍有2-3人自杀。我的堂弟阿布都卡哈尔（Abdulkahhar）有一个女儿，名叫迪丽达尔（Dildar）。据说迪丽达尔（Dildar）在一家手机加工厂工作。由于我只能每1-2个月才能与我父亲通一次电话，因此对那个工厂的了解并不多。¹²²”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违反了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劳工标准和工人权利，特别是1930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强迫劳动公约。¹²³ 此外，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被迫做奴工的维吾尔人的自杀，或以我们尚不知道的原因（工伤、谋杀等）导致死亡的现象，需要采取紧急的干预行动。

在我们对麦丽克·马赫穆德（Melike Mahmud）的采访中，得到了有关在上述情况对女工进行性骚扰和虐待的重要信息。马赫穆德（Mahmud）解释相关情况时说到：“和田地区的维吾尔家庭把16岁左右的女孩子送到我们的地区来躲避中国政府的招工。中国政府强行把高中毕业的年轻女孩送到工厂当工人。去那些工厂的女孩在中国内地甚至被迫卖淫。回来的姑娘们心理已经不正常了，与原来的样子判若俩人。我们听说女孩在那里被强奸。那些女孩的生活被毁了。因此，不少人也把他们的女儿带到我们的地区来隐藏和保护她们。¹²⁴”

¹²¹ 2021年4月7日对努尔斯曼·阿布都热西提（Nursiman Abdurresit）的采访

¹²² 2021年4月7日对库扎提·阿勒泰（Kuzzat Altay）的采访

¹²³ 国际劳工组织（ILO）. C029 —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 2021年5月24日访问

¹²⁴ 2021年4月6日对麦丽克·马赫穆德（Melike Mahmud）的采访

家人遭遇被中国政府强迫劳动的博士生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接受我们采访时给我们讲述了女性奴工的待遇与政府的宣传。阿吉穆罕默德（Hacimuhammed）说道：“我父亲和我弟弟都遭受了被强制劳动。他们在集中营内的工厂生产纺织品。所有的集中营都在新疆。我没能得到他们在里面生活有关的信息。带有工厂的集中营建立起来了。有各种类型的集中营。我猜我妈妈在工厂所在的集中营里。我的弟弟和父亲也在那些集中营里。还有强迫女生劳动的问题。2006年我上大学时，听从喀什噶尔来的朋友们，她的们亲戚（有男有女）来到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工作。我朋友告诉过我。据说他们那里的条件很不好。饭菜也很糟糕。当地政府说，“我们要从喀什噶尔派多少多少人来当工人”，他们甚至招募学生当奴工来充计划的数字。已婚者可以不去。家长们仅仅为躲避女儿做奴工，把15-16岁的女孩嫁出去。据说那里的女孩经常被汉族男人虐待，工厂管理者带着恶意接近她们。¹²⁵”

中国政府在2016年8月份发表的一则有关维吾尔摘棉工人的声明中，强调加强在棉田劳作的维吾尔人的思想教育和民族团结意识。¹²⁶ 这一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一些发展，在2020年发布的另一份文件中，中国政府表示，负责棉花工人的人应该与维吾尔人一起吃饭、生活、学习、工作，并积极对采棉维吾尔人进行思想教育。¹²⁷ 根据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说，中国政府的目标不仅是奴役劳动，而是通过奴役劳动期间的意识形态宣传来改造维吾尔人的思想。事实上，我们在其他采访中也听到过针对奴工的宣传和洗脑。

与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的采访中，我们了解了以下有关奴役劳动和宣传的信息：“这件事我在那里（喀什噶尔）的时候发生的。我了解这件事是因为那个村有我们亲戚。经常听说‘那个村必须出多少人派往那个工厂支援。’人们心中的恐慌和不安随着宣传力度的增加而加重着。我见过有的女青年被强行带到那里。在我的亲戚，我丈夫的亲戚和远房亲戚中都有派往不同地方的人，几年后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回来了。这些都是强行的，人们不能发出声音。他们在工作的工厂里得参加思想教育课。我们也参加过。高中也上这样的课，每周五放学后中学也上。在大学里这也是必修课。在公立学校举行会议时必须得上这类课程。作为学生，我们每天早上都唱共产党的红歌。上这种课的时候宣讲人讲，‘我们国家正在做什么什么，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什么，新疆最重要的是安全，我们要反对恐怖主义，宗教是怎么怎么样，如果你信仰宗教，你的结局会很糟糕’。¹²⁸”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得到了其他信息，由于这项中国政府声称“职业教育”的政策，许多已经有职业和工作的人被迫成为奴隶工人。麦丽凯·哈比布（Melike Habibul）丈夫的三个兄弟姐妹在2017年被关进集中营，三年后他们被释放时，他们的农场已经被没收了，他们作为奴隶工人被强行带到另一个城市的工厂。她说：“我丈夫的兄弟姐妹2016年在东突厥斯坦关进集中营。直到2020年被释放为止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的信息。他们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在社交媒体上发

¹²⁵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¹²⁶ 约翰·陈（John Chan）. (2020). 报告显示新疆棉业强迫劳动的规模. 中国数字时代. 2020年12月15日. 2021年5月24日访问

¹²⁷ 约翰·萨德沃思（John Sudworth）. (2020). 中国的“污染”棉花. BBC. 2020年12月. 2021年5月4日访问

¹²⁸ 2021年3月29日对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的采访

布了他们的消息后才被释放了。谈到强迫工作的地方，说：‘我们每周接受五天培训，我们学习法律’。此前，工厂给这些奴工每个月500元。而现在奴工需要给工厂支付伙食费。其中一个亲戚传话给家人‘我们没钱了，能不能给我寄一些伙食费。’于是我们给他家人汇了些钱。那些作为奴工强迫劳动的人的家人由于害怕他们重新从工厂带回集中营，因此不愿在社交媒体上谈论奴隶劳动问题。我在这里有三个好朋友，他们从不分享他们家人的遭遇，主要是因为担心他们的配偶和亲戚被从工厂带走并送回集中营。我哥哥的女儿鲜斯努尔（Semsinur）现在25岁。当她20岁时，他们家把她的户籍转移到另一座城市。正当她准备去那里申请护照时，被警察抓住，理由是：“出国是犯法的”。2015年5月她被判处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们把她带到集中营又关了一年。有一个汉族朋友告诉我们，她在2019至2020年在一家工厂强制劳动了。得知此事后，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个女孩为什么在工厂劳动的帖子，之后他们把她给释放了。¹²⁹” 哈比布（Habibul）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担心社交媒体上开展的关于奴隶工人状况的活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向。这一和类似的信息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外界对维吾尔人的处境做出充分的回应时，这种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5.7 儿童集中营

随着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的镇压政策变得更加明显，2016年开始集中营的数量猛增。这些集中营伴随着同化、酷刑和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被定为高度安全的基地。2016年8月，西藏任职的陈全国被任命为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此次任命之后，我们看到该地区集中营的数量和警察部队的数量开始猛增，维稳政策的暴力程度也加剧。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的政策不仅限于成年人口。把孩子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让他们远离家庭，维吾尔文化和维吾尔身份，忘记母语，只会说中文，根据国家的意志把他们培养成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是汉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一方面，试图以维稳的名义把维吾尔人的文化符号和行为定为犯罪，另一方面，把儿童作为最容易实施“汉化”政策的目标群体。

在我们的采访中获得的证词表明，父母被带到集中营的孩子被关押在国家控制的儿童集中营或寄宿学校里。接受我们采访的一位维吾尔人，37岁的喀丽比努尔·图尔荪（Kalbinur Tursun）说，她的七个孩子中有两个和她一起在土耳其，但她剩下的五个孩子和她的丈夫都被关进了中国设立的集中营里，她不能以任何方式与她的家人联系。另外，喀丽比努尔·图尔荪（Kalbinur Tursun）2018年12月在一个汉族老师抖音上上传的宣传视频中看到了她3岁半的女儿阿依夏·阿布都热依木（Ayse Abdurrehim），她说：“我们家住在喀什噶尔，但那些传出来视频是在和田拍摄的。这意味着他们把我的孩子安置在不同的集中营里。两年了，我一直在等待孩子们的消息，但仍然得不到任何消息。看了女儿的视频后，我向中国政府询问了她的情况。但至今没有人回应我”。她表示，她与被强制与家人分开的孩子们建立沟通渠道的努力一直被中国当局忽视，同时，中国政府对海外公民的业务也不予办理。¹³⁰

¹²⁹ 2021年4月7日对麦丽凯·哈比布（Melike Habibul）的采访

¹³⁰ 2021年4月7日对喀丽比努尔·图尔荪（Kalbinur Tursun）的采访

谈到父母被关进集中营的儿童被转移到洗脑营的情况，努尔斯曼·阿布都热西提（Nursiman Abdurresit）说：“我们认为，大规模拘留开始时，孩子们也被带到了集中营。我哥哥与第一任妻子生的女儿户口是登记在我们家的。（一种规避官方计划生育限制的办法）我知道我那侄女也被关进了集中营。我哥哥与第二任妻子生的两个孩子（5岁和7岁）和他们的妈妈住在一起，据说我嫂子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他们的母亲在工厂做强迫劳动。也许他们的姥姥正在照顾那些孩子，也许他们在儿童集中营里。我们不知道我弟弟的孩子在哪里，他们的情况还不确定。我们得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¹³¹”

那些得不到没人照顾的孩子之信息的母亲们表示，尽管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得到他们的消息，但大使馆始终没有回复他们的请求。来自和田市的阿米娜·穆罕默德艾敏（Amine Muhammedemin）表示，她带着五个孩子中的两个来到土耳其，但现在得不到丈夫和其它三个孩子的消息。她说：“丈夫就因为把我们带到土耳其并给我们汇钱而被判了15年徒刑。我的丈夫在集中营里待了15-20天。然后，在2017年1月，被转移到监狱了。他在土耳其只呆了15天。我丈夫入狱后，我也得不到孩子们的消息了。2016年底，我还能偶尔与我的丈夫和孩子通话。那时候我父母在内，所有人都害怕跟我联系。因此我只能与丈夫联系。他被逮捕之后，我与家人的联系完全断绝了。现在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们是否还活着。我的孩子当时只有3岁，现在已经8岁了。当时我丈夫的妹妹在照顾着。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们的姨妈是否也被带走。我联系不上孩子姨妈。丈夫，家人，兄弟姐妹的遭遇我都忍了，但孩子之痛我实在忍受不了。一个母亲有可能希望她的女儿死吗？我希望。当我听到集中营里的酷刑和强奸时，我默默祈祷“让我的女儿死去吧，这样她就不会受苦了”。我自己也想自杀。我无法向你表达这种痛苦。（哭）当年我8岁的孩子现在13岁了。想到这些我就担心。集中营里面充满着强奸，酷刑。¹³²”

很多违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家庭，2015年在办理护照和签证方面受到了过度的鼓励政策，从而不少家庭努力把孩子送出国（也有担心国家把孩子带走），而这一切的真正目的2016年之后才水落石出。这些出国的努力，由于其中一些孩子没有户籍的原因不能一次性实现，从而导致家庭一分为二的情况在所难免。父母把一部分孩子带出国之后让母亲照顾这几个孩子，然后父亲回国准备把其他孩子带出来时，中国政府没收他们的护照，导致他们只能停留在维吾尔自治区。先是扣押那些为了孩子回国的父母亲的护照，然后把他们关进集中营，最后把他们的孩子带到儿童集中营是中国政府很常见的做法。

我们采访的另一名受害者苏迪尼萨·阿卜杜勒姆（Sudinisa Abdulim），与她在维吾尔自治区的家人5年来联系不上。她和他的丈夫为了副朝去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丈夫被沙特阿拉伯警方逮捕，并引渡到中国。她这样阐述当时的情况：“我的丈夫于2018年在沙特阿拉伯被捕并送往了中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切都是合法的，我们有合法的居留证，护照。我们合法的逗留，当时我们在麦加。他们无缘无故地把我丈夫从我们在麦加的家里带走了。2016年，我的两个孩子来土耳其接受教育，我是在丈夫被带走后才来到土耳其的。我有一个儿子，他是在我丈夫被捕后出生的，他现在已经5岁了，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我有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和我在一起，其他三个在东突厥斯坦。5年来我没有睡过一次好觉。得不到孩子的消息确实很让人心痛的一件事。我只是为了副朝离开家乡1个月，之后再也没能回去了。¹³³”

¹³¹ 2021年4月7日对努尔斯曼·阿布都热西提（Nursiman Abdurresit）的采访

¹³² 2021年4月7日对阿米娜·穆罕默德艾敏（Amine Muhammedemin）的采访

¹³³ 2021年4月7日对苏迪尼萨·阿卜杜勒姆（Sudinisa Abdulim）的采访

尝试从乌鲁木齐来的朋友那儿得到家人消息的苏迪尼萨·阿卜杜勒姆 (Sudinisa Abdulim) 说：“2016年10月，我们一个朋友从乌鲁木齐来到了麦加，他告诉我们‘国家已经没收了你们家一切，千万不要回去’。还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的孩子都被抓了，你们的孩子也危险’。的确，2016年的时候已经无法跟家人联系了，2017年1月份与我24岁的女儿最后一次通话之后再听不到她声音了。她甚至没跟我讲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那边什么个情况。他们把我24岁的女儿和她的丈夫都关进了集中营。我女儿的三个孩子和我的两个孩子都无人照顾了。她的孩子们（我的外孙）和我的孩子们现在都成了流浪儿童。” 她表示，她与四分五裂的家人和孙子失去了联系，非常担心孩子们的生活。¹³⁴

来自吐鲁番的玛利亚姆·阿卜杜勒哈密特 (Meryem Abdulhamit) 与我们分享了她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强制绝育方面的经历，她说：“市政府的人听说我怀孕了，于是强迫我去医院进行人工流产。由于之前被迫做过7-8次堕胎，当我去医院时医生跟我讲‘这次真不能堕胎，你已经患病了，这样会有生命危险的。’ 听到医生的话，我害怕了。2015年，申请护照变得异常的容易了。我和我的丈夫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我丈夫说：“你先去土耳其，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女儿来。” 我必须尽快离开，我拿到护照后立刻出发了。我带着肚子里的宝宝和两个孩子来到了土耳其。我把丈夫和女儿留在了家乡来。我们不得不离开，因为我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我12岁的女儿的护照也出来了，但他们把它收回了。我当时怀的女儿现在已经5岁了。我的丈夫被带到集中营之后，我的女儿失去了父母，成了无人照顾的留守儿童。之前偶尔能跟她通话。我们在2017年4月的一次通话中她说‘他们因为你而把我的父亲带走了’。我试图联系我的亲戚，但他们突然拉黑了我的微信。我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我的女儿，但一直到现在我没能得到任何消息。那时她12岁，现在已经17岁。我猜我女儿应该是被带到了寄宿学校。我们试图向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和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请愿的方式见我们的女儿，但他们没有接受，也根本没有回应我们的诉求。¹³⁵”

5.8 海外的维吾尔人

2017年春天是大规模监禁浪潮达到顶峰的时期，巨大的新集中营建设开始结束。这也是维吾尔人第一次遇到这种规模的运动。根据集中营受害者及其亲属的叙述、专家分析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目的公布的受“教育”人员统计数据，我们估计2018年约300万（截止2021年6月，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700万，其中包括被释放和被送往奴役工厂的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送往集中营。这个数字不包括被关押在儿童集中营里的孩子。

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短时间内被拘留，他们的家人无法得到他们的消息，而且缺乏公开公平的法律程序，这让居住在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和在这个地区有亲属的海外维吾尔人感到了恐惧。即便受害者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但他们的经历非常相似。他们最初是通过微信等常见的中文通讯应用或者是用手机，座机等通讯方式跟家人交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家人的日常对话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大规模拘留的开始，对方就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不安。他们中的大多数跟他们的亲戚讲：“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清楚会发生什么。在情况好转之前不要回来”。这个时

¹³⁴ 2021年4月7日对苏迪尼萨·阿卜杜勒姆 (Sudinisa Abdulim) 的采访

¹³⁵ 2021年4月7日对玛利亚姆·阿卜杜勒哈密特 (Meryem Abdulhamit) 的采访

期并没有持续太久。受害者的亲属发现，他们在中国的所有家人和熟人都在短时间内开始从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中删除自己。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接了电话，就说最好暂时不要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就挂断。这是由于有些被拘留的人也是因为与外国的人接触而遭到逮捕。2017年至2018年期间，海外的数十万维吾尔人无法得到亲属的消息。同样是这一时期，当地警方再次接触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并建议他们返回中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建议变得更加严格。警察开始威胁说：“你再不回来，我们就把你的家人带走。” 允许家属在警察的监督下与国外的亲属通话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在警察的监督下，父母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孩子“国家对他们照顾得有多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有多成功”。然后他们补充说：“如果你也回来，这里一切都会变的很好”。这些会面后，很多家长冒着很大的风险，有时通过汉族邻居，有时通过汉族朋友联系孩子，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回来”。

被拘留者的资产被没收，如果还有需要照顾的孩子，孩子们往往不允许被亲属收养，而是被当局带走。这些孩子们也像他们被关进集中营的父母一样，没有任何消息。如果有人坚持要了解这些孩子的下落，那么这人也被带到集中营。整个维吾尔地区弥漫着恐惧和沉默。当地人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只希望这一切是暂时的。但事与愿违。海外的维吾尔人往好了想，上次与亲属通话时的不安只是暂时的情况来安慰自己。他们听到当地警察说“你们保持沉默，现在只是与往不同的一个过渡时期。” 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慢慢都知道了大规模的拘留这一事实。与亲戚的联系完全中断。2017年之后，他们无法联系很多他们认识的人。在中国内地学习或工作过的维吾尔人向他们的汉族朋友寻求帮助。许多人提供了帮助。很多海外的受害者亲属的汉族朋友说：“别担心，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去看看你们的家人”，然而他们去那儿之后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城市和朋友家人失踪的现实。他们把所见所闻告诉了他们的维吾尔族朋友。2018年，一些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认为这种情况不是暂时的，保持沉默无助于他们的亲属，于是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谈论他们的经历。国外读博士的热比古丽（Rabigul）说：“我以前害怕在社交媒体上作证，现在我认为我是家人和母亲唯一的声音和希望。如果我的沉默能带来结果，我在这沉默的三年里已经得到了。明天（2021年3月23日）将是我最后一次与母亲通话的第四年。¹³⁶”

来自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的阿卜杜拉·拉苏尔（Abdullah Rasul）说：我叔叔于2017年4月来土耳其看望我，之后回到了维吾尔自治区。那时，集中营的消息开始出现。他用微信和女儿交流。他们把他的妻子带到了集中营。他女儿跟他说：“爸爸，你必须得回来，他们说如果你不回来，他们就不会释放我妈。如果你不回来，他们也会带走我”。我叔叔受不了了。我告诉他要等一等，因为传来的消息令人不安。我叔叔在老家务农的农民。我们无法阻止我的叔叔。他回去了。一回去，他就在机场就被捕了。我至今没能得到关于他现状的任何消息。那时候，他的女儿联系了我。我问她：“我叔叔下飞机了吗？你看到他了吗？”她说：“他下来了，我看到他了，但只能看到3-4秒的人影，然后他们就把他带走了”。然后她删了我微信。我再也收不到她的消息。

2018年6月，我从消息人士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为了消息人士的安全在此不具体介绍）我父亲四个月前去世了。我的母亲、姐姐、哥哥和许多亲戚被带到集中营。“我只能说这么多”，给我传递消息的人说道。他也害怕了。他说“街道和市场空无一人。他们要带走所有人。”

¹³⁶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我和那个人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但我们只能每2-3个月进行一次非常简短的交谈。然后我列了一个清单。我认为被关进集中营的人：我的家人、亲戚、邻居和朋友：一共120人。在集中营里关一段时间然后被释放的表弟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通过确认了我列的清单里那些人在外面，那些人在里面。但他没有说任何关于集中营的事情。由于我的前合伙人（外国人）有 Whatsapp，我通过这种方式与我的表弟联系的。我一个一个地叫亲戚的名字，问他“这个亲戚还在吗？”他回答“有”或“没有”。尽管我一直坚持问他，但他没有说任何关于集中营的事情。”¹³⁷

这些故事非常令人瞩目，但也令人难以置信。直到一些集中营亲历者和受害者（拥有外国国籍并通过其所属国的外交努力下被释放的人）设法离开中国并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后，国际社会开始明白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受害者、受害者亲属、新闻研究、卫星图像、泄露出来的文件，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选择的宣传方式（中国以外的人难以理解）都表明在那里发生的悲剧不容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首次建立了集中营。世界与该地区之间的民间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自2017年以来，海外的数十万维吾尔人无法与亲人联系。

自2018年以来，海外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开始在社交媒体和国际媒体上谈论他们无法联系的亲属后，中国官员广泛采取威胁手段试图压制不断上升的声音。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年来无法与父母和兄弟姐妹联系并且担心他们现状的人，中国警方通过微信联系他们，要求受害者海外的亲属停止分享他们家人的情况，否则对他们的家人不利。当中国当局的这些威胁无法让维吾尔人沉默时，就使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在集中营里或从集中营释放的家人开始在警察的监督下与他们在国外的亲人联系。我们采访的许多受害者亲属的故事几乎相同。多年来一直听不到孩子和亲戚的声音的集中营受害者家属，听到的都是家人以不安的语气说同样的话：“我们很好，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对党的政策非常满意。我们在接受教育，我们学习我们国家的语言。我们摆脱了之前的极端思想。你这样做是错的。不要诋毁我们的国家。不要再网上分享东西。”

海外的维吾尔人尽管想详细了解亲属的情况，尤其想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但对方讲话的内容仅限于对“党和国家”的赞美。长期与父母失去联系，最后在警察的监督下得以与父母通话的哈尔穆拉特·维吾尔（Halmurat Uygur）医生的阐述是证实这种情况的众多例子之一：“我父母获释后的前6个月，他们被禁止跟外界联系，包括使用微信也不允许。那段时间他们要跟我联系就必须得去政府的一个办公室提前申请和预约，前6个月他们只是在那间办公室里才能跟我联系。我们的第一次通话发生在我们失去联系19个月之后，非常不正常。我的父母跟我说话的语气非常奇怪。是一次非常正式、平淡无奇的通话。他们只说，“我们很好，一切都很好”，他们没有在这个框架之外说任何话。当我们第一次通话时，我问他们“你瘦了多少公斤”，他们甚至不敢回答。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希望与我父母在咱们自己的家里，没有警察监督的情况下来一个正常的通话。有时他们打电话时（警察为了叫停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帖子让我父母打电话给我）我没有接他们的电话。我告诉他们不能这样。6个月后，我们可以在微信上正常（没有警察）交谈。他们太想念我了，一直在哭。我们谈得很热情，通话间虽然我很坚持，但他们始终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¹³⁸

¹³⁷ 2021年4月6日对阿卜杜拉·拉苏尔（Abdullah Rasul）的采访

¹³⁸ 2021年3月31日对哈尔穆拉特·维吾尔（Halmurat Uygur）的采访

来自库尔勒市的奥马尔·法鲁克（Omer Faruk）不能获得他的两个小女儿和家庭成员的消息，他解释了警方与他的联系以及他们向他提出的建议：“我的兄长们被捕后，我的孩子们去我婆婆家了。2017年11月，我的岳父和岳母也被捕了。在那之前，我还能偶尔视频通话中看到我女儿。之后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孩子们的消息。大抓捕刚开始的时候，我所有的亲戚，包括我的兄长，都把我从微信中删除了。他们担心与外界联系而被关进集中营。在我哥哥也被捕后，我开始分享作证视频。然后我哥哥认识的一位在安全局上班警察写道，‘你哥哥不会有事的，他会在集中营里完成学业就可以出来。我们知道他是无辜的，但你也不要分享这些。’我问警察关于我孩子的事情，他说“很好”，当我说“她们在哪里”时，他回答说“在你的另一个亲戚家里”。我说“我想看她们”，警察说“现在不可能。”同时，他们跟我提议说“你可以为我们做一些事情。这样你可以见到你的女儿和兄长”；他们继续说道“在你所在的国家有一些维吾尔协会和组织，你跟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给我们传递他们的情况。尽可能地融入他们里面。”我不能对自己的民族做对不起的事情，我也不可能会做。¹³⁹”另外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受害者亲属加吾兰·希尔买买提（Jevlan Sirmehmet）也告诉我们，中国警方非常坚持不懈地向他做工作，让他跟随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并收集有关他们的信息¹⁴⁰。

来自伊宁市的阿尔菲拉·努尔穆罕默德（Alfira Nurmuhammed）讲述的内容与所有海外维吾尔人的经历相似：“我丈夫的远方亲戚那儿得知了我父母被带走的消息，原因是父母给我和妹妹汇过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被带去的是集中营还是监狱。当时，他们还把我的婆婆也一起带走了。我等他们出来，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两个月过去了，也没动静。就这么等着过了一年。在这期间，我认识的人都把我从微信中删除了。虽然妹妹把我从微信里删了，但我能看到她的状态和朋友圈。之后，妹妹突然10天都没有更新微信状态了。我很担心。后来我得知我妹妹和我叔叔也被带走了。

那些被判了刑的人，即使非常有限，还可以通过探监能见里面的人。但被带到集中营里的人几乎得不到任何信息。我问我的亲戚，“他们什么时候被带走的，什么时候回来”，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已经四年零两个月了（采访是2021年4月份进行的），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我父母的消息。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我姐夫也被捕了。（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勒海提/Abdurrehim Abdulaid，伊宁人）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在集中营呆了两年半后，出来时只能坐在轮椅了。他才26岁，身体健全的一个人变成了没有轮椅走不到路的地步。¹⁴¹

住在挪威的赛麦提·阿布拉（Semet Abila）：“我最后一次和我妈通话是在2017年9月。在那之后，我们所有的电话联系都像其他维吾尔人一样被切断了。我多次尝试与他们联系，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但都没有成功。2020年新年过后，我有了一些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一样。我尝试着给每个人打电话。联系不上任何人。我请求这边的维吾尔人，说‘如果你们能得到消息，请告诉我’。我们的一个朋友在2020年2月下旬终于得到了消息。我母亲去世了。距离上次与母亲通话已经过了两年半了。我有姐姐，也有弟弟，但我无法联系到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是怎么死的？在医院？在集中营？还是在家里？我很努力地四处打听，但始终得不到消息。

¹³⁹ 2021年4月7日对奥马尔·法鲁克（Omer Faruk）的采访

¹⁴⁰ 2021年4月7日对加吾兰·希尔买买提（Jevlan Sirmehmet）的采访

¹⁴¹ 2021年4月7日对阿尔菲拉·努尔穆罕默德（Alfira Nurmuhammed）的采访

2017年，他们开始大规模逮捕。那时，从我妈妈那里听说一切都变得很糟糕了。在我们2017年的谈话中，我妈妈显得非常担心和害怕。我妈在通话间一直说“现在情况很敏感，我们不要说太多”。我感觉到一种反常，但没有人告诉我细节。在我们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我母亲显得比我们之前的谈话更加沮丧。她说我弟弟和那里的警察之间有了些麻烦。她说“想想你的弟弟。”然后她让我和那里的情报警察谈谈，说：“他们想和你说话，你跟他们谈谈吧。”同时，她以强调的语气说道：“一定按照他们说的去做”。然后那些警察开始找我。他们开始在Whatsapp上给我发送消息。Whatsapp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那里的警察可以用它来联系国外的人。我认识一位给我发短信的警察。他的兄弟是我的朋友。他们的短信很友好：先是问候。问我父母的情况。他告诉我，我应该考虑我的母亲，她已经很老了，如果我愿意，他们可以让我随时随地见到我的母亲。他们让我与他们合作。（给他们传递其他维吾尔人的信息）他告诉我，如果我要是跟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随地很容易地和妈妈通话。我拒绝了。就在我们联系的那段时间，坏消息开始接二连三地传来。我问那个警察“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关进监狱，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说：“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所以我们带走他们接受教育。”他们所谓的恐怖分子，其实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人。都是我们的亲戚、邻居、朋友。上次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时，那个警察和我妈妈一起在家。是九月份的一天。母亲接到电话就哭起来了。之前她都是一接电话就问候的，但这次她一接到电话就哭了。她边哭边说“当你打电话给我时，我必须得汇报给警察。”听到母亲的哭声，我非常伤心。她说：“过个日子都难了”。她告诉我，弟弟在3-4天前被警察抓走了，他们没有告诉我母亲把我的弟弟带到那里。我母亲哭着跟我说了这些。而这成了我与母亲最后一次通话¹⁴²。

乌兹别克裔中文教师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通过一名非关押犯（教师）的目光讲述了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事情，并提供了宝贵的证词。同时，她给我们讲述了她是如何离开中国的经历：“我想退休后去荷兰与女儿团聚。但在2016年，中国政府没收了我和我丈夫的护照。那时他们开始没收每个人的护照。公务员也不例外。为了拿回护照，我四处奔波，非常辛苦。前后去了20多个部门，但还是无法拿回我的护照。负责人说‘如果你出去了，你会把里面看到的情况讲出去的。’即使我女儿的婚礼，也没能前去参加。我女儿多次发了邀请函。我去了很多地方，终于有人怜悯我了。他说‘我认为你可以去，你不是维吾尔人，你是乌兹别克人’。但因为我是维吾尔人，他对我丈夫说‘护照你别想了’。经过9个月的努力，我终于拿回了护照。但我的丈夫不能出去。他还在东突厥斯坦。我终于来到了荷兰。我最后一次与他微信联系是2020年2月23日。他们说‘你妻子不是在那儿呆一个月就回来的嘛？’，然后对他进行了酷刑。（哭）从那时候开始我再也得不到关于他的消息。我被迫与所有的亲戚也切断了联系。来到这里后，我的哥哥和弟弟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他们听说警察把我的丈夫带到了派出所。警察让我的亲戚跟我通话。我的一些亲戚电话里说‘就因为你走了，我们才落得现在这处境，你想让我们死吗？’，然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是从通讯应用程序中删除了我。我现在跟那边的人没有任何的联系。也许他们把我的那些亲戚都关进了集中营。¹⁴³

¹⁴² 2021年4月1日对赛麦提·阿布拉（Semet Abila）的采访

¹⁴³ 2021年3月24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的采访

6. 对家庭结构的干预

创建一个监控性社会来实现其汉化和安全化的政策的中国政府，在维吾尔自治区已经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控制机制。其中之一项是名为“结对认亲”的项目。在国外学习法律专业的加吾兰·希尔买买提（Jevlan Sirmehmet）在他对母亲的证词中这样描述了结对认亲项目：“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是公务员。从2016年开始，国家开始将他们送到农村。我的父母不是警察或军人。但国家派遣公务员前往那里进行维稳。我母亲是工商局的会计，她工作的部门里每个人都下了乡，并强制地让他们结对认亲。我也和我妈妈一起去了几次。起初，有像我们这样的维吾尔公务员与村里的农民家庭结对认亲。然后慢慢开始换成汉人了。其实，这是为了看似让让公务员和村民相互融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¹⁴⁴”

当派出的公务员只有汉人时，维吾尔人开始表现出各种不满。这种在维吾尔人中非常不受欢迎和引起反感的做法，是国家监视维吾尔家庭的方法之一。当男性家庭成员被带到集中营之后，那些“强制结亲”的公务员继续被派往家庭，并监视留在家中的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为母亲作证的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说：“2018年的冬天，我一个熟人说，：“我们家要来客人”。我问他：“什么客人”，他回答说：“我们的新亲戚”。我又问：“他们是谁，什么人？”。他说：“你不要问谁，是我们的新亲戚”。之后他们一个亲戚也过来帮忙了。三名30多岁的汉人公务员来到他们家过夜。当时家里只有我那熟人、他哥哥和来帮忙的亲戚。¹⁴⁵”

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表示，这种做法既被用于干预对方家庭成员的私生活，又被用作宣传工具，她说：“我们一个邻居被关进集中营，他的女儿分享过一张照片。一对汉人夫妻也来到他们家。我们的邻居在集中营期间与他们“结对认亲”的汉人家庭与我邻居家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拍照并且分享了照片。他们为了宣传，必须得分享这些照片。那些所谓的“新亲戚”到维吾尔家庭，吃吃喝喝，看汉语电视频道。他们试图给外界现在的政治形势很好，国家做得很好的印象。¹⁴⁶”

来自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的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这样阐述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们家亲戚与汉人的照片：“我在微信上在一个政府开的一个群组中看到了舅舅和表弟的照片。照片里面他们和汉族公务员一起。除了我嫂子的家人，其他亲戚家都有汉人公务员前来合影的照片。¹⁴⁷”

来自阿克苏市的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ahim Geni）与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第一次听说强制性的“结对认亲”项目的：“我的大学同学有一个微信群。他们发照片说，这些是我们的结亲家庭，我们的新亲戚之类的。我说，你们在哪里找的这些亲戚，他们说政府给每个家庭分配一个汉人亲戚，我们就是这样结亲的。那是我在2015年第一次了解“结对认亲”项目。¹⁴⁸”

¹⁴⁴ 2021年4月7日对加吾兰·希尔买买提（Jevlan Sirmehmet）的采访

¹⁴⁵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¹⁴⁶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¹⁴⁷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的采访

¹⁴⁸ 2021年4月1日对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ahim Geni）的采访

注意到派往维吾尔族家庭的观察员和“结对认亲”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有所区别的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表示：“所谓的结对认亲项目主要是在城市里实施，在节日还是特殊的日子，两个家庭必须聚在一起。然而在农村，人们不太敢发声的地方，他们安置士兵来观察维吾尔家庭。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和比较偏远的地区，那些没有男主人的家庭通常安排男性观察员。¹⁴⁹”传统的维吾尔族身份在农村的聚居区更为突出，这些措施似乎强化了这些地区的许多安全措施和汉化做法以及一对一的控制机制。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著名的维吾尔族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女儿菊儿·伊力哈木（Cevher Ilham）也提到了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强度实施该项目，她说：“通常会指派男性公务员监视家庭。我们听说来家里监视的政府人员为了与女主人在一起而前来这些家庭。事实上，我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安排男性公务员去这些家庭。¹⁵⁰”

我们来自阿克苏的阿布都艾尼·萨比特（Abdulgeni Sabit）那里也听到了与许多目击者的证词相似的内容。旨在控制维吾尔家庭的所谓的“结对认亲”项目的不同版本在更早的时期已经尝试过了。“当我在东突厥斯坦的时候，结亲项目就开始了。我哥哥是参与这个项目的人之一。在我出生和长大的阿克苏，有叫克孜尔和艾伊湖的两个城镇。在那里维吾尔人口非常密集。知识分子、比较领先的农民和那里的商人都知道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和背后的目的。政府为了监视和控制他们，把公务员分别安排到那里人们的家里。项目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2000年代的情况。当时只是实验性实施了这个项目，但在集中营开始建立后，国家把这种做法作为正式和广泛的项目来实施了。¹⁵¹”

著名维吾尔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Adil Mijit）的女婿，音乐教师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也表示，大约有110万名汉族公务员被指派为观察人员，跟踪那些被带到集中营的人的家人。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继续表示，这些公务员来到维吾尔人的家庭监控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是否说维吾尔语、是否信仰宗教、家里是否有礼拜毯等情况。他说：“我们也听说过很多在这些公务员去的维吾尔人家发生了多起强奸事件。甚至有13-15岁的少女怀孕的情况，也有自杀的。”他说，这些在维吾尔人家里安置观察员的做法为许多刑事案件铺平了道路。¹⁵²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与我们分享了他朋友祖木热提·达吾提（Zumret Davut）一家“结对认亲”的经历：“在“结对认亲”项目中两个家庭不得步经常见面。在这个项目中，每个人都得有异性的亲戚。祖木热提（Zumret）女士有一个12岁的女儿。政府给她女儿配了一个21岁的汉人“亲戚”。那个汉人一直在想方设法地跟祖木热提（Zumret）女士的女儿多接触。他每天都跟着祖木热提（Zumret）女士的女儿，看她是否去上学，或者什么时候放学，去接她放学等等。”他表示，即使是没有关进集中营的未成年人也会在外面受到严密的监视。¹⁵³“在这项目中你必须得吃汉人亲戚吃的食物。此外，见面的时候你必须得拍照向国家证明你们有来往。比如，他们把猪肉放在中间，当你不想吃的时候汉人亲戚就会知道你心里的抵触。也有一些汉人家庭也

¹⁴⁹ 2021年3月27日对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的采访

¹⁵⁰ 2021年4月20日对菊儿·伊力哈木（Cevher Ilham）的采访

¹⁵¹ 2021年4月1日对阿布都艾尼·萨比特（Abdulgeni Sabit）的采访

¹⁵² 2021年3月25日对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的采访

¹⁵³ 2021年3月25日对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的采访

是被强行纳入该项目的，他们有时也会展示对维吾尔人的理解。当祖木热提（Zumret）女士在她“亲戚”家，说：“我不能吃猪肉”时，汉人“亲戚”说：“你不用吃。但你假装把它送到嘴边，我来拍张照片”。没让她强迫吃猪肉已经等于为她做了一件好事。¹⁵⁴ 然而，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补充表示，虽然那些理解维吾尔人处境的汉人家庭也抵触这项不人道的项目，但他们也是无法发声反对。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公务员和党员网络严格控制少数民族社会，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方面”净化“他们来实现改造少数民族社会，最终让他们成为中国文化圈一部分的目的。为此，在公共生活之外，为了控制和管理私人领域中的家庭生活，通过”强制结亲“这样的大型项目，向数百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家里指派观察人员，在这些焦虑不安的维吾尔人家庭中也保持一种控制和监视。

来自乌鲁木齐的，为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en Abbas）医生作证的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女士跟我们阐述了她在微信上面看到的一个视频内容：“很多人都看到这样一个视频，里面三个汉族男性在炕上摆姿势，一个维吾尔族妇女抱着孩子坐在旁边。这让维吾尔人非常难过。因为我们之前得到的陈述中听说，这些公务员也强奸妇女。¹⁵⁵” 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表示，很多从维吾尔自治区传来的消息也证实这些强奸案的存在，并说：“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中国政府指派的汉人公务员住在那些男性家庭成员被关在集中营的家庭时，以“向政府提交对你们家不利的报告”为威胁手段，逼女性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她特别谈到了单身女性面临的威胁和强奸：“如果当那个公务员向政府写报告说你有“激进思想”或“在家祈祷”时，就会导致你被关进集中营，你的孩子将被国家“扣押”。¹⁵⁶”

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表示，很多遭遇性侵的年轻女孩宁愿自杀，也不愿忍受被强奸。她谈到那里的人们处于何等悲惨的状态：“很多人在问同样的问题，我知道自杀在我们的宗教里是严禁的行为，但实在接受不了这般凌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自杀吗？¹⁵⁷”

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继续说道：“尽管这些女孩儿很清楚政府在监控她们的微信内容，讨论这些将会给她们带来更多的打压和遭到性侵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选择了写下自己的经历。这表明那些遭遇性侵的妇女多么的无助。¹⁵⁸”

另一位来自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的证人，艾尔肯·斯迪克（Erkin Sidik）教授表示，“结对认亲”项目对女性的压迫和凌辱已被世人广知，并说：“我们知道汉族公务员晚上和维吾尔族妇女睡同一屋，并发生性侵。我们还听说一些被强奸的女孩强迫与汉族公务员结婚。此外，在最近的一个视频中，我们看到一名汉族公务员强迫一名维吾尔族妇女饮酒。不幸的是，维吾尔人不能对此说不。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反对，就会被关进集中营。¹⁵⁹”

¹⁵⁴ 2021年3月25日对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的采访

¹⁵⁵ 2021年4月21日对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的采访

¹⁵⁶ 2021年4月21日对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的采访

¹⁵⁷ 2021年4月21日对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的采访

¹⁵⁸ 2021年4月21日对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的采访

¹⁵⁹ 2021年4月1日对艾尔肯·斯迪克（Erkin Sidik）的采访

7. 针对女性的强制绝育政策

强制绝育、强制节育和堕胎是一些国家多年来实施的，尤其是针对“不受欢迎”人群的一系列生理政策。这些做法确保国家主导年轻而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身体，阻止特定人群（种族、文化、宗教等）的人口增长，从而将目标群体人口减少到易于同化的水平。

直到最近，在许多国家广泛实行的强制绝育由于既违反了人体不可侵犯的原则，又旨在同化和消灭少数群体，因此被许多国际组织定义为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例如，1951年生效的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将旨在消灭部分或全部特定民族、族裔或宗教团体或种族的节育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¹⁶⁰。同样，有123个国家签署的，在2002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ICC)，把强制绝育定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¹⁶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自199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对该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并将强制绝育和堕胎定性为对难民和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¹⁶²⁻¹⁶³

尽管国际社会反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声音越发高涨，但中国政府坚持继续对维吾尔族妇女进行强制和系统的绝育。强制绝育政策作为侵犯人权的行为，直到2017年中国集中营浮出水面后才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在我们的采访中，阿布都艾尼·萨比特 (Abdulgeni Sabit) 表示，1984年在东突厥斯坦开始了压迫性的节育措施，他目睹了有两个以上孩子的维吾尔人被监禁，他们的房屋被警察摧毁。据萨比特介绍，尽管2016年至2017年中国其他各地的生育限制政策有所放松，但针对维吾尔人的生育禁令仍在继续¹⁶⁴。与萨比特的声明一样，文学家，诗人塔依尔·哈姆提 (Tahir Hamut) 指出，市政当局专门任命官员对生了两个孩子的妇女进行绝育，他的妻子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进行了绝育手术¹⁶⁵。另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努尔斯曼·阿布都热西提 (Nursiman Abdurresit) 讲述了他母亲和他哥哥的妻子的经历，举例说明了绝育和强制节育是怎样同时系统地实施的：“妇女们每个月被叫到村中心一次，检查她们是否怀孕。我妈妈也不得不使用他们给她的避孕药。每次到体检的时候，爸爸都会带妈妈去外地出差来躲避检查。但其他女性不得不去做检查。我哥哥的第一次婚姻有一个孩子，第二次婚姻有两个孩子。当我嫂子怀上双胞胎之后，因我哥哥将有生五个孩子时，他们在他妻子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对嫂子进行了强制堕胎*。汉人也有限制孩子数量的政策，但他们实际上也不想要多个孩子，他们接受这种情况。¹⁶⁶”

¹⁶⁰ 娜塔莉亚·麦克帕特兰 (Natalya McPartland). (2021). 美国的强制绝育违反国际法. 人权脉搏.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¹⁶¹ 国际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¹⁶²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05). 联合国难民署关于基于强制性计划生育法律或政策的难民申请的说明.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¹⁶³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1999).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2(a)

¹⁶⁴ 2021年4月1日对阿布都艾尼·萨比特 (Abdulgeni Sabit) 的采访

¹⁶⁵ 2021年4月24日对塔依尔·哈姆提 (Tahir Hamut) 的采访

¹⁶⁶ 2021年4月7日对努尔斯曼·阿布都热西提 (Nursiman Abdurresit) 的采访

* 在维吾尔人中，为了规避官方规定的生育数量，在其家庭成员人口中招收（收养）儿童来上户口是很常见的。

据阿尔菲拉·努尔穆罕默德 (Alfira Nurmuhammed) 讲述了1995 年发生在伊犁的一起事件, 该事件与妇女们长期遭受的强制性和非人道医疗干预有关: “我母亲的表弟妹有三个儿子。然后她第四次怀孕, 直到第九个月都一直隐瞒孕情。有一天, 有人到她家里来的时候忘记隐藏自己的肚子。之后那人通知了警察, 在她做饅的时候来了一辆黑色的汽车, 有人冲进屋里, 把我妈妈的表妹带走了。他们在医院打了针就分娩了。她生了一个女婴。婴儿哭了, 还活着。她恳求他们把孩子还给她, 但是医院里的人向刚出生的女婴头部注射液体而杀死了婴儿。她因悲伤三四个月不能起床。精神出了问题。然后他们对她进行了节育手术。从我记事起, 她就一直生病。¹⁶⁷” 这个例子说明在调查针对妇女的医学干预的同时, 还有必要调查对婴儿犯下的罪行。

近期能够从集中营出来并有幸出国的维吾尔妇女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尤其在集中营里未经她们的同意对妇女进行医疗干预的细节。通过她们的证词, 外界获得了关于强制绝育和堕胎政策结果的重要信息。2017年被送往集中营的女商人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告诉我们, 每个进入拘留营的人都会进行尿检, 孕妇会立即被强制堕胎。杰利洛瓦 (Celilova) 说, 营地中的妇女被迫每月使用两次给予她们的药丸, 每10天进行一次注射。经历这些过程之后, 她们不再来月经了¹⁶⁸。另一方面, 据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说, 她目睹了一名因药物副作用而持续流血一个半月的妇女死亡¹⁶⁹。我们在采访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阿勒玛斯·尼扎麦丁 (Almas Nizameddin) 的时候, 他给我们讲述了被关在集中营的妻子再乃普·阿布都热西提 (Zeynep Abdurresit) 的遭遇, 从他的证词中我们发现了重要的细节。他的妻子怀第一个孩子两个月时被送到集中营, 他被中国当局通知他的妻子不能再怀孕了。因此, 阿布都热西提 (Abdurresit) 要么被迫流产, 要么由于在集中营的酷刑过程中失去了孩子¹⁷⁰。

受雇于拘留营担任中文教师的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讲述了她被强迫绝育的亲身经历以及她的观察说道: “集中营内外的所有18至59岁妇女都必须接受绝育手术。这个手术在2019年5月时也对我进行了。没有进行绝育的妇女被迫与中国汉人结婚。即使是有孩子但不打算再次怀孕的, 甚至没有孩子的人, 也必须进行此手术。我在我50岁生日那天也强迫做了这个手术。我们作为等待做手术的妇女, 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排成一排。18岁及以上的年轻女孩也在排队。排队的人是如此的多以至于我等了四个小时才轮到我做手术。每个社区都有卫生所, 我在我所在的社区卫生所进行了手术。一位年长的医生和一位护士一起进行了手术。他们打了一针, 我昏过去了。不知道用了多久, 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有几种类型的手术。其中一个现在是进行手术但是之后通过治疗之后还能生孩子, 但我的不是这种类型的手术。醒来后我感到非常痛苦。手术进行得并不顺利, 我出了非常多的血。由于我起不来, 打电话给我的丈夫来接我。我有2-3天不能起床。我无法想象集中营里, 分成50-100人的小组的妇女被带去绝育的过程中是如何进行的。¹⁷¹”

¹⁶⁷ 2021年4月7日对阿尔菲拉·努尔穆罕默德 (Alfira Nurmuhammed) 的采访

¹⁶⁸ 2021年4月26日对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的采访

¹⁶⁹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¹⁷⁰ 2021年3月26日对阿勒玛斯·尼扎麦丁 (Almas Nizameddin) 的采访

¹⁷¹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在我们进行的采访中，达伦·拜勒（Darren Byler）表示，作为中国政府“零非法生育”运动的一部分，对维吾尔族妇女的体检有所增加，并决定对向正式机关举报他们怀孕的邻居的人给予900美元的奖励。拜勒（Byler）指出，在许多官方文件中指出，男性先是在集中营关押，然后在远离家乡的工厂强制劳动是一种控制人口的一种方法。国家还为汉族男性和维吾尔族妇女结婚提供经济奖励，而这激励往往成为压迫的一个因素。一个拒绝嫁给汉族男人的维吾尔族妇女被迫给出一个“正当理由”，然而宗教信仰的差异不被接受为正当理由。¹⁷²

对中国通过强制绝育的同化政策进行了最详细的研究之一的人类学家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在202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与公众分享了他对人口方面的种族灭绝带来的后果¹⁷³。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8年间，维吾尔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84%。2020年及以后的目标则是“人口增长接近于零”。实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两种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强制拘留和强制绝育。自从中国建立集中营以来，18-49岁女性的守寡和绝经率翻了一番。因此，中国政府通过将男性关在集中营和通过强制医疗干预方法对女进行强制绝育/绝经，已实现控制维吾尔族人口的目的。另一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集中居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是维吾尔族居住地区的8倍，这也与中国政府的说法相反，表明强制计划生育是一种仅针对维吾尔族人口的种族灭绝。

8. 维吾尔自治区的器官贩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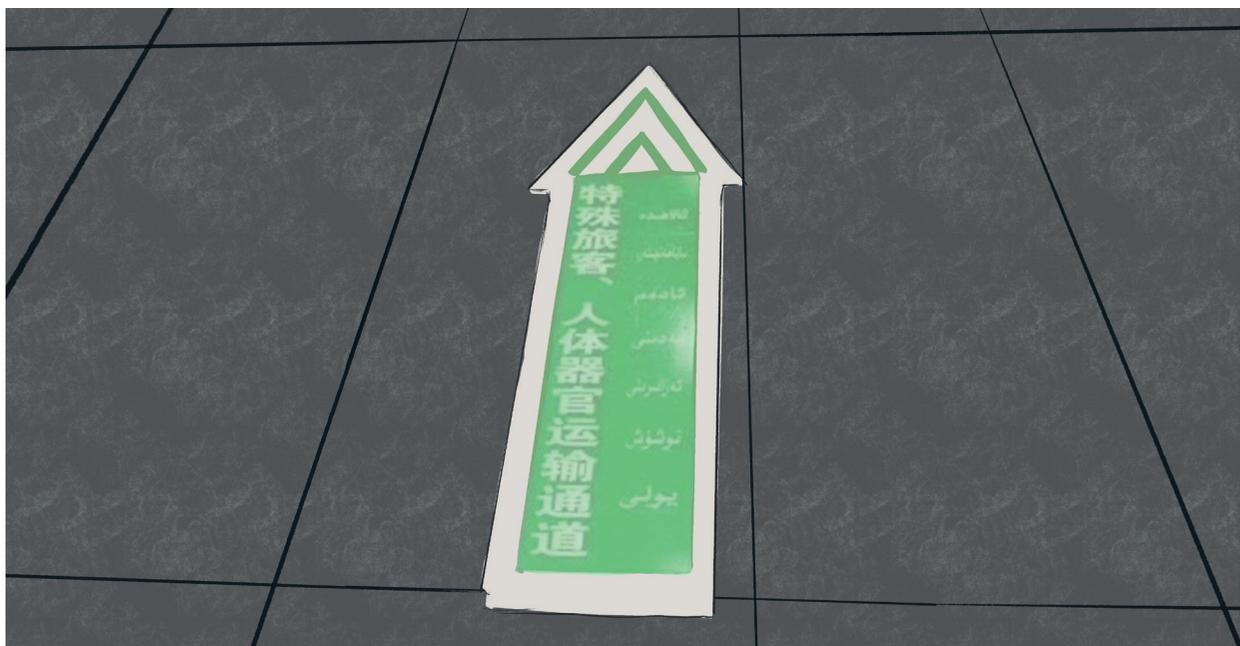
有消息证实，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器官移植项目，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患者的等待期为三至四年，而在中国这个周期为一至两周¹⁷⁴。上世纪90年代在维吾尔自治区当外科医生的安华·土赫提（Enver Tohti），与公众分享了他当医生时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器官移植手术。在他分享的内容中，他提到了一名受害者在被执行枪决时以免他立即死亡而故意击中胸下，以便在所需的条件下摘除他的器官。尽管抵抗力很弱，但受害者的器官在他活着的时候被取出的。¹⁷⁵

¹⁷² 2021年4月9日对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的采访

¹⁷³ 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 (2020). 绝育、子宫里的节育器和强制生育控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生育的运动. 詹姆斯敦基金会（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0年5月21日访问

¹⁷⁴ 维吾尔国际支持（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Uyghurs）. 维吾尔活摘器官

¹⁷⁵ BBC之声. 中国被指控对数百万维吾尔人进行残酷镇压. 2021年5月21日访问



喀什噶尔机场—人体器官运输通道
—实际图片数字化存档—

直到2015年，中国才承认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¹⁷⁶。中国于2015年向公众公布的这一做法是否真正结束，结果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在非法“世界器官市场”的份额自2016年以来增加了很多。许多已经发表的新闻，让我们认为中国在世界非法器官市场上的份额迅速增加与2016年后开始的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并把他们关到集中营有关¹⁷⁷⁻¹⁷⁸。在准备这份报告时，我们也进行了多次采访，使我们认为所讨论的该话题是真实存在的。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塔依尔·哈姆提（Tahir Hamut）解释，中国需要的器官在每个时期都可以很快获得：“器官贩卖由来已久。当中国内地有钱的政府官员需要器官时，他们可以很快找到。窃取被逮捕的维吾尔人和政治犯的器官是众所周知且广为人知的事情。我们还听说了很多关于维吾尔人的器官在大规模拘留后被盗的消息。”¹⁷⁹

来自托克逊市的阿卜杜拉·拉苏尔（Abdullah Rasul）：“2010年，他们（指当局）在我们邻村拘留了我们的一个熟人。后来警察把他带回来时人已经死了，没有器官。”¹⁸⁰ 另一方面，沙伊达·阿里（Sahide Ali）指出，即使在清真器官事件发生之前，器官盗窃也很普遍：“在清真器官事件发生之前，我们经常听到家乡村庄里有儿童失踪。2012-2013年，在我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听说很多小孩被拐走、失踪或被发现死亡。后来才知道是器官被偷了。”¹⁸¹

¹⁷⁶ BBC新闻. (2014). 中国停止摘取死刑犯的器官.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¹⁷⁷ 华尔街日报. (2016). 中国人体器官摘取的噩梦.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¹⁷⁸ 健康欧洲 (Health Europa). (2020). 强制摘取器官：“我要去中国，他们正在枪毙我的捐赠者”.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¹⁷⁹ 2021年4月24日对塔依尔·哈姆提 (Tahir Hamut) 的采访

¹⁸⁰ 2021年4月6日对阿卜杜拉·拉苏尔 (Abdullah Rasul) 的采访

¹⁸¹ 2021年3月27日对沙伊达·阿里 (Sahide Ali) 的采访

我们采访的集中营受害者都说，他们隔着较短的时间间隔定期抽血，还定期被迫服药。我们知道那里的所有条件都非常糟糕，而且医疗援助极其匮乏，但是所有受害者都定期抽血和服药，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同样，作为一种常见的受害者叙述，在审讯和惩罚期间以不损害内脏的方式进行酷刑也支持这些指控。

集中营受害者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在受访期间与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目睹的可疑事件：“我们牢房里的一名维吾尔青年被送往医院。当他回来时，我们注意到他的胸膛已经打开，然后被缝了起来。第二天，那个年轻人就死了。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术疤痕。缝好了，肋骨完全被打开，然后再次被缝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他的器官是否被盗或者发生了什么，但他第二天就死了。他来自察布查尔县马扎尔乡。¹⁸²”

在集中营担任教师的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是我们采访的人之一，她说：“当我看不到熟悉的面孔时，我问警察，警察说‘我们让他们去上班’或‘他们生病死了。’据说有一些被用于清真器官贩卖。¹⁸³”

这些证词加强了人们怀疑集中营被中国共产党用作大型器官库的嫌疑。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维吾尔人器官库的最大买家是中东的富豪，尤其是在海湾国家，对源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的需求非常高。这里有许多基于宗教的原因：据推测，维吾尔人不食用猪肉和酒精饮料，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穆斯林。由于这种饮食偏好以及从穆斯林身上移植的器官被视为“清真”的信念——根据许多宗教学者的说法，这种观点没有伊斯兰教的正确性——与寻找器官的病人与维吾尔人的器官在集中营定期收集血液样本中进行匹配，最后被强行取出，大多数受害者后来丧生。许多中国医院正试图通过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广告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引导到中国，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客户”。北京同山堂医院在多个网站上展示了肾脏移植手术，在其YouTube频道上显示，他们有一个穆斯林礼拜场所以及一个为患者提供清真食品的食堂¹⁸⁴。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说：“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分享它。他们通过广告向中东出售器官。在东突厥斯坦，禁止去清真寺、祈祷、说不吃猪肉；中国人却打广告说我们医院有清真寺，有清真餐厅。这些医院都在中国内地。其目的是为提高器官交易的盈利能力而做广告。那里受过专门训练的中国护士会说阿拉伯语！系统就是这样运行的。”他表示这就是有计划进行的非法器官移植旅游。¹⁸⁵”

¹⁸² 2021年4月10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Baktiali Nur）的采访

¹⁸³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的采访

¹⁸⁴ 达拉格（Daraj）。2020年6月25日，中国如何出售从维吾尔族穆斯林囚犯身上提取的“清真器官”？

¹⁸⁵ 2021年3月25日对阿尔斯兰·希达耶特（Arslan Hidayet）的采访

9. 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基本上，可以针对三个不同的汉人群体可以给出三种不同的主流答案。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与主流观点持不同态度的小群体。

可以说，由于中共严厉的审查机制、缺乏互联网的自由和强烈的虚假信息政策，中国内地的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在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们的许多采访中了解的情况也支持上述观点，在中国内地受过教育或从事商贸的受害者的亲属谈到，他们的家人失踪后，他们有向内地的汉族朋友寻求帮助。当受害者亲属联系不上家人，并担心他们是否被关进集中营而向他们的汉人朋友提出忧虑时，几乎所有的汉人都表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必要时他们会去该地区帮他们联系家人”。而那些好心的汉人为朋友去该地区之后所看到的景象是荒芜的城市和他们朋友空无一人的房子。他们与受害者亲属分享了面对这种情况时的焦虑和困惑。2020年去维吾尔自治区的德国之声记者马蒂亚斯·伯林格（Mathias Bolinger），也遇到了维吾尔人的内地朋友同样的场景。伯林格（Bolinger）说，村庄是空的，房子的门上都写着房子已经空了多久的信息。¹⁸⁶

我们采访的维吾尔人避免透露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汉族朋友。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担心失去了仅有的联系方式，第二个是他们的朋友可能会遭到麻烦。这两种可能性密切相关，使得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对他们的内地汉人朋友非常保密。

受害者的亲属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表示，维吾尔地区以外的中国人是虚假洗脑信息的受害者。阿巴斯（Abbas）表示，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中国无法使用，加上国家对媒体保持绝对的控制，于是内地的中国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¹⁸⁷。在美国宇航局从事光学工作的受人尊敬的维吾尔科学家艾尔肯·斯迪克（Erkin Sidik）教授也证实了阿巴斯的叙述是正确的。根据斯迪克（Erkin Sidik）教授的说法，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经济剥削，污名化，包括现在的直接威胁生存权的攻击行为，中国内地的汉人基本上不知道的。¹⁸⁸

在北京上大学的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表示，当她向汉族同学讲述维吾尔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时，她的朋友们没有相信他的话。热比古丽（Rabigul）解释说，2018年在她所在的国家给中国游客当导游时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游客有时会问，“你为什么不回中国？”我告诉他们在维吾尔地区发生的事情。我跟他们讲关于集中营，还有我失踪的家人时，他们往往不相信。他们会问“那怎么可能？”，有一天我跟其中的一个游客说“不信你自己去看看！”之后，他还真的去了新疆。他告诉我：“我感觉呼吸都困难。我很兴奋地来到这里，我认为你是出国后在贬低中国，但我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我很抱歉。他时不时地给我发信息说“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¹⁸⁹”

¹⁸⁶ 2021年3月23日对马蒂亚斯·伯林格（Mathias Bolinger）的采访

¹⁸⁷ 2021年4月21日对茹仙·阿巴斯（Rusen Abbas）的采访

¹⁸⁸ 2021年4月1日对艾尔肯·斯迪克（Erkin Sidik）的采访

¹⁸⁹ 2021年3月23日对热比古丽·阿吉穆罕默德（Rabigul Hacimuhammed）的采访

我们采访的十多名受害者亲属都在中国内地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都表示，他们没有一个完全了解维吾尔自治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能够掌握准确和最新信息的汉人朋友。

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且为此发声的人，其汉人身份并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这种情况的最后一个已知例子发生在2018年2月的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阳一名叫李霖的汉族青年软件开发人员在乌鲁木齐探望家人时在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分享他看到的内容而被捕并被判处三年徒刑。¹⁹⁰

语音聊天应用程序Clubhouse是中国内地人第一此从受害者亲戚口中听说集中营的地方。这种情况就像许多西方应用程序一样，导致在很短的时间内Clubhouse被禁止的使用。在这短暂的时间给内地人讲述自己和家人遭遇的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和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表示，当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内地人时，他们感到惊讶，甚至大多都不相信¹⁹¹⁻¹⁹²。加吾兰·希尔买买提（Jevlan Sirmehmet）表示，也有一些汉人为听到他在Clubhouse讲述的经历而哭了。¹⁹³

第二个中国人群体是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我们看到与中国有着密切交往或与中国大陆非常近的中国人，例如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因不受中国国内强烈的虚假信息 and 自由限制的影响，对维吾尔自治区正在发生的事情采取非常积极的保护人权的立场。据了解，生活在没有共产党维权统治下的其他中国人有新闻和知情自由，与大陆的汉人不同。而这个群体不仅限于中国的外围。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美国到欧洲，所有可以获得信息自由的国家的中国人都包括在这一组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采取了反对侵犯人权的立场。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中国记者许秀中（Vicy Xu）因为对此发声而在中国大陆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许记者说，因为她研究维吾尔人面临的压迫，当局以她的亲属来恐吓她。¹⁹⁴

第三个汉人群体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政府的激励下被安置在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尽管与其他两个人群相比，他们的数量很少，但他们是重要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直接处于“问题”区域。其中一些汉人属于叫兵团的，被认为半军事组织的，正规和系统化的组织体系里面。国家已将大片肥沃的农田分配给这一群体。他们还充当民事执法人员，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协助警察。兵团人的定居点就在维吾尔古城市外建立。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们形成了一种汉人聚居的外城。最近，除了工人之外，大批的汉人在政府的强烈激励下进入兵团的同时，更多的涌入了维吾尔人聚居的城市。这种情况，会导致该地区的主人、即维吾尔人和拥有特权的汉人移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所有中国人中，在维吾尔地区的中国人（汉人）是最了解和目睹该地区侵犯人权行为的群体。然而，他们也是在种族关系和地区局势紧张之时，支持国家对维吾尔人实施压制性政策的一个群体。这一群体占世界15亿中国人口的不到 1%。

¹⁹⁰ 自由亚洲。（2021）。沈阳居民李霖发布新疆信息遭“煽动罪”判刑 关押三年仍戴脚镣

¹⁹¹ 2021年4月5日对古丽孜热·塔什买买提（Gulzire Tasmemet）的采访

¹⁹²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热合曼·萨图克（Abdurahman Satuk）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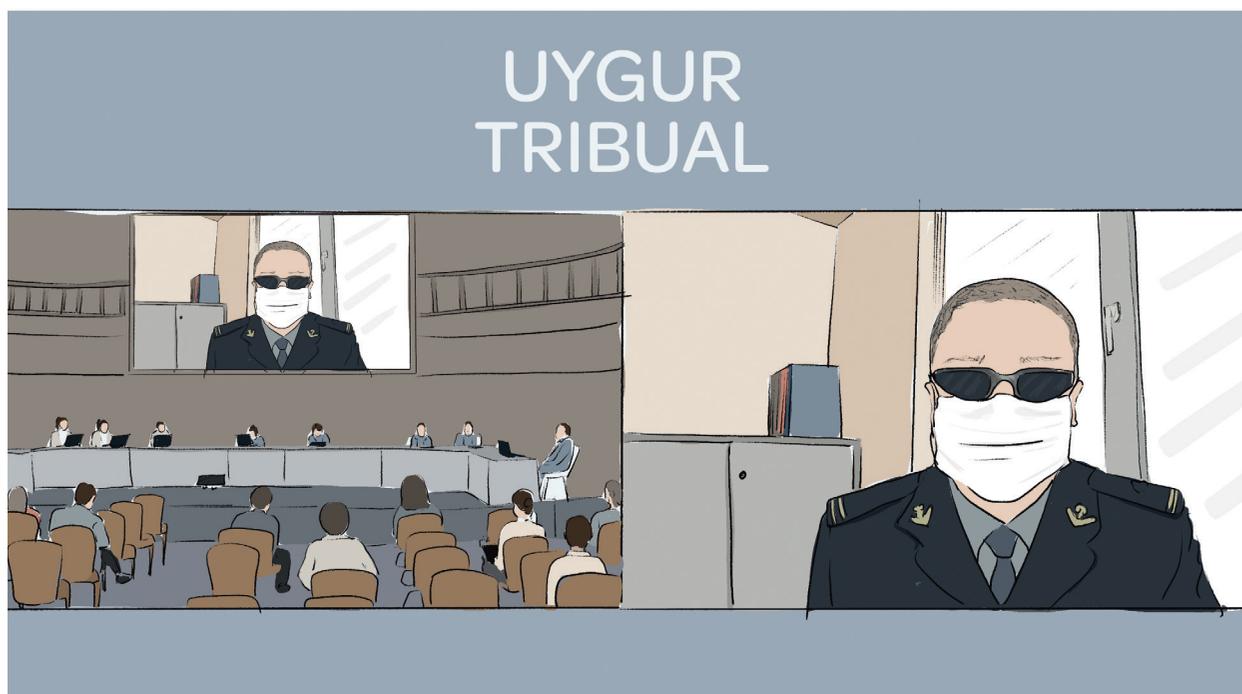
¹⁹³ 2021年4月7日对加吾兰·希尔买买提（Jevlan Sirmehmet）的采访

¹⁹⁴ 德国之声（DW）。（2021）。因跟踪新疆事件而被指控为女叛徒的许秀中（Vicy Xu）表示，永远不会放弃

在集中营被迫担任教师的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给我们讲述了之前在她工作的学校发生的一件事，解释民族间的紧张局势在儿童层面的反应：“在我最后工作的学校，有许多家长被关进了集中营的维吾尔学生。当他们问”爸爸，妈妈不在回来吗？“的时候；我回答他们说”国家带走了你们的父母，但是会放回来的“。但我知道，他们中多数人的父母不会回来。目睹这些对话的汉人学生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很高兴，并说：“太好了，我们希望他们把你们也都带走。”当维吾尔族学生说：“我们遵纪守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听到后感到非常难过。“我没法跟他们说”因为你是维吾尔人”。¹⁹⁵

10. 国际法中的集中营

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我们将从种族灭绝罪的角度讨论近年来（自2014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起的大规模拘留范围内执行的政策。评估将侧重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而不是特定案件中自然人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 一名前中国（汉族）警官在伦敦举行的，旨在独立调查中国在维吾尔自治区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维吾尔特别法庭上作证，描述了维吾尔人如何在拘留中心和集中营里遭受的酷刑。

-实际图片数字化存档-

¹⁹⁵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Kalbinur Sedik）的采访

I 国际法中的种族灭绝罪与国家对于种族灭绝罪的责任

禁止种族灭绝是根据国际法约束所有国家且不能被视为例外的强行法（上位法/命令性规则）类别中的一项规范。联合国大会及其 1948年12月9日第260A（III）号决议一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¹⁹⁶ 明确规定，根据国际法种族灭绝作为一项罪行，已被缔约国确认。该公约规定各国负有义务不仅惩罚而且防止种族灭绝，并在战争与平时时期对其当事方具有约束力。根据公约，缔约国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的义务是普遍适用的，是针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受任何地方/国家/地区的限制。¹⁹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7月20日签署并于1983年4月18日批准该公约，是缔约国。¹⁹⁸

公约第二条，即“构成种族灭绝罪的行为”栏里，种族灭绝罪的定义为如下：

本公约内所称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 (a)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 (b)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 (c)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 (d)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 (e)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在引述规定的框架内，种族灭绝罪的物质要素是上述五款所列行为。另一方面，精神要素是所涉及的行为（具有特殊意图/特别祭祀）的实施，目的是部分或完全消灭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实施以上所列任何行为之一均可体现灭绝种族罪的要件。因此，依照规定被实施灭绝种族罪的受害人在文章中用于特殊意图的表述“消除”不能理解为仅仅破坏/杀死群体成员的物理存在。根据条例被面临种族灭绝的受害人是一个民族，族群，种族或宗教团体；就其是否构成为种族灭绝罪的受害者而言，它在其地理上占人口的大多数或经济实力雄厚这一事实并不重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条约正文中提及的包括序言，在解释该条约时的评论也具有重要性¹⁹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该条例的序言中提及，联合国大会1946年12月11日第 96（I）号决议中²⁰⁰，种族灭绝被视为“整个特定人群生存的否认”。

¹⁹⁶ 下文将简称为“公约”

¹⁹⁷ 国际法庭. (1996).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 1996年7月11日. 第31页.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¹⁹⁸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公约的缔约国，但对第九条关于国际法院管辖权持保留。联合国条约集，“条约状态.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¹⁹⁹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1980).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⁰⁰ 联合国大会. (2946). 种族灭绝罪. 1946年12月11日, A/RES/96. 2021年5月21日访问

决议还指出，种族灭绝动摇了人类的良知，受迫害的人群及该群体对人类的文明和其他的贡献一并会被消失，给人类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这既违反道德规则，也违反联合国的精神和宗旨。因此，在关于灭绝种族罪是否发生的法律解释中，应以刚才引用的联合国的观点为依据。国际法院还认为，公约旨的目的是在确保某些人群的存在，这是公约所有条款的基础和解释标准。²⁰¹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²⁰²2001年编写的题为“国家的非法行为在国际上的责任”的报告中，构成种族灭绝罪的行为：如果是由根据一国法律具有国家机构地位、经一国法律授权行使部分权力或在有效控制下行动的个人或政府机构所为，则责任归属于那个国家。²⁰³

国家不是一个真实的自然人。因此，在确定国家因灭绝种族罪而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时，特殊意图的存在（部分或全部消灭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群体的目的），这是其精神层面上的要素，并不是基于主观心理条件；它是根据官方声明、政策、战略和计划实践等客观数据展现出来的。例如，在国际法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案中，由于存在特殊意图，许多类似暴行的先后顺序和针对同一群体的暴行，而不是肇事者的心理状态在个别的具体事件中，其可以理解为有计划的层面（暴力的模式），寻求客观的标准，例如总体计划的存在或行为模式的存在。²⁰⁴

国家以与安全有关的各种原因来免除因种族灭绝罪引起的国际法律责任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约第1条中以“哪怕是在战争状态下犯下”的表述来规定防止缔约国造成种族灭绝、惩治种族灭绝和不可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义务，将规定始终继续。事实上，国际法院在冈比亚/缅甸的判例中得出结论，缅甸军队与若开邦（罗兴亚）发生武装冲突并不构成缅甸可以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正当理由。²⁰⁵

II 在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种族灭绝罪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责任的评估

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以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灭绝种族罪行，构成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规定的灭绝种族罪。在国际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作为国家对这一灭绝种族罪负有责任。本节中，提供上述行为构成灭绝种族罪，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家对此罪负有责任的相关确凿证据。

A. 从犯罪的物质要素来看

为展现种族灭绝罪的物质要素，公约第2条中所列五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即可。至于维吾尔人，可以看出，上述每项行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一一且系统性地在实施。

²⁰¹ 国际法庭。（1951）. 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咨询意见）的保留. 第12页. 1951年5月28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⁰²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联合国宪章 13/1-a条款，由大会设立，制定和编纂国际法的一个委员会

²⁰³ 国际法委员会.（2001）.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第 4、5、7、8 条.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⁰⁴ 国际法庭.（200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一案，2007年2月26日. 第242页，第373页.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⁰⁵ 国际法庭.（2020）. 冈比亚诉缅甸，2020年1月23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1.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从采访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被关押在集中营、临时拘留中心和监狱中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民族，如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被判处死刑或因虐待或酷刑而死亡。以下是一些关于集中营中受害者被杀害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及例子：

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我看到过有人因酷刑而死，再也没有回来的，被针刺死的……当老年妇女们晕倒时，我们常常把她们放在牢房中间的空地上，医生来往她们的脸上擦一些东西，等两三个小时还没醒的话，就拉着她们的手拖走，我们就会认为她们是死了。一个名叫月热耶提 (Hurriyet) 的二十七岁女孩 (……)，然后我听说她死了。(……) 他们把女孩带走审问，她遭受了严刑拷打，失去了理智。当她回来时，她不停地大喊大叫。然后在午夜，他们把一个黑色的袋子套在她的头上，把她带走了。自从她回来后，她就没有说过话。他们把她带到黑屋子里惩罚她。一周后，当我因为心脏病去看医生时，我看到月热耶提 (Hurriyet) 的尸体被担架抬着 (……) 在法院等地方他们让一些人穿橙色背心。我们知道那些穿着背心的人会被杀死。大家都是这么想。他们对那些穿上那种背心的人说，我们会在一两个月内给你打一针，他们也知道他们会死。²⁰⁶”

巴克提阿里·努尔 (Baktiali Nur)：“他们带走那些难以站立数小时的人并折磨他们。在坐了15个小时一动不动时我有看到过死去的人 (……) 我看到了另一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是维吾尔人。那个青年从集中营带到了医院，当他回来时，我们看到他的胸部已被手术过并重新缝合过。第二天那个男孩就死了。他做了一次手术，就是被缝了很多，肋骨完全被打开过，又缝合过。我们不知道他的器官是否被盗或发生了什么，但他第二天就死了。他来自察布查尔县的马扎尔乡。²⁰⁷”

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有很多人在这些集中营里丧生。那些带走没有回来的人可能已经死了。我在洛普镇有一个朋友，他被打后没有回来。我们知道，人不来就说明是死了 (……) 维吾尔人快要灭绝了。许多维吾尔人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亲戚在哪里，他们发生了什么事。²⁰⁸”

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那些被叫去审讯的人一个月无法来上课。被叫去审问的人里有些人是毫无音讯没有回来过。有一个人是个企业家，他想，如果我很快的学习中文，把歌词都背下来，他们就会释放我。他很努力。他们把那个人带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当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说他有心脏病，审讯期间病死了。他们对所有人都说同样的话，我看到过两个人的尸体。集中营里的每个人每天都有三次一分钟的上厕所时间。他们会折磨那些一分钟内不出来的人。许多人因前列腺等疾病而中毒，且许多人因此死亡。我也亲眼目睹了死亡。我是在集中营刚建立的时候来的。我知道很多人刚进来时的样子，也知道每个人的变化 (……) 当我问那些消失的熟悉面孔时，警察说他们送那些人去工作或生病死了 (……) 警察说那里的妇女一直在打针和吃药，而且是为了绝育和其他疾病。对一个女孩起了副作用，她的月经一个半月都没有停，导致那个女孩流血过多而死。²⁰⁹”

²⁰⁶ 2021年4月26日对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的采访

²⁰⁷ 2021年3月24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 (Baktiali Nur) 的采访

²⁰⁸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的采访

²⁰⁹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奥马尔白克·阿利 (Omerbek Ali)：“我们认为那些被带去审讯后三天内没有回来的人已经死了。在我们隔壁的房间里，我们听说在审讯后带来了一个名叫优素福·阿布拉兹 (Yusuf Abliz) 的人的尸体。克拉玛依市一名警察的侄子也在那里被杀 (……) 他们在提供食物时，牢房里有个只有食物可以通过的窗口，我们从那个窗口里看到他是怎么死在那里的”²¹⁰。

2.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根据采访：被关押在集中营、临时拘留中心和监狱中的维吾尔人（以及属于其他穆斯林族群的人，如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遭受了严重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是很明显的。被拘留的受害者被迫生活在不人道的条件下，遭受身心暴力、性侵和性骚扰。下面列出了关于被拘留的受害者遭受的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伤害及第一手资料的主要例子：

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我们住的牢房里有四十个人 (……) 每个人的手脚上都戴着链式手铐。手脚之间也有铁链。两只脚被锁住，但只有一只手被锁住。长五米、高六米的房间里，有一个一米半的卫生间。它大约有三米宽。有个一米的走到得空出来供里面的人步行上厕所。厕所没有门，卫生间也在里面，上厕所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尤其是年轻女孩很尴尬。他们允许我们每个月一次在冷水中沐浴一分钟 (……) 早上，为我们提供馒头和用面粉与水混合制成的冷汤。中午只给面包 (……) 晚上给面包和白菜汤 (……) 白天，每人可以喝一杯水 (……) [审讯室]那里有一张床，没有摄像头。我也是在那里遭到性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回过神来，每次说起我都会哭 (……) 两个警察拉着我的手，另一个警察施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 当我问他们，难道你就没有母亲或姐妹吗？他们说，“你是畜牲，你是个混蛋，你不是一个母亲和姐妹” (...) 那个牢房里的每个人都有被性侵被殴打。没有年龄差异。我知道每个人都曾被性侵过 (……) 我在那一年瘦了二十公斤 (……) 我的头发也变白了”²¹¹。

塔碧瑟汗·玛鲁布刊 (Tabishan Marubkan)：“当我第一次去集中营时，我们每天坐在金属凳子上十四到十五个小时。正正一个月，我们每天都坐在那里，用一种军事话管理的方式。不许动 (……) 一个牢房里坐着十六个人。睡觉、坐着都在一个牢房里。牢房里有一张凳子可以坐。我们躺在离地面稍高的水泥地上睡觉。我们不能在那里容纳十六个人，床不够我们全部人躺，其余的躺在地上。牢房是二十平方米的面积，厕所也在牢房里面，没有门，没有封闭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营养不均衡 (……) 如果有人提高声音、喊叫或移动的话，他们把那个人往死里折磨 (……) 每周有16人必须在总共20分钟内洗澡完。只有一个淋浴喷头，只有冷水 (……) 每天坐下来，心理疾病的人很多。他们有的根本不会说话，有的头疼，头疼的厉害的会用头撞墙 (……) 我离开集中营后，我病得很重。我现在两个肾都有病，脸总是会肿。我到处都有病，我有很多病痛。在我进入集中营之前，我没有任何疾病。我甚至没有服用过阿司匹林。现在我的心脏也有问题。我的心脏一直在痛，血液没有流到我的心脏，流的太少了。我的肾也积水了，我的肾因为受凉而出问题了。（这里的医生是这么说的）然后我的小便里有血。说起来很遗憾，但我不得不说这一点，因为在那里得了性病，导致我现在不能和我的丈夫有性生活。”²¹²

²¹⁰ 2021年3月24日对奥马尔白克·阿利 (Omerbek Ali) 的采访

²¹¹ 2021年4月26日对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的采访

²¹² 2021年5月14日对塔碧瑟汗·玛鲁布刊 (Tabishan Marubkan) 的采访

巴克提阿里·努尔 (Baktiali Nur)：“我进去的时候有七个人。我来了以后，我们是八个人了，后来有十二个人左右了，人数增加了。大约有十平方米。房间里没有厕所。他们早上和晚上带我们两次上厕所。我们一天只能出去两次，除了这两次以外就不能再出去。只有两分钟（……）早上、中午和晚上，分三次给面包和米水（……）我们坐在铁椅上十五个小时一动不动（……）有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名叫阿布都萨拉木 (Abdulsalam)，他被带走了。当他回来时，两个胳膊是瘫痪的，他们指派我去帮那个孩子上厕所。我问他，你的胳膊怎么了，他说我的两只胳膊都挂在天花板上，我的脚从来没有着过地，四天后他们把我弄下来的时候，我的两只胳膊都瘫痪了。当我脱下他裤子时，他身体都变得又黑又烂了（……）我在那里被打断了手腕（……）离开集中营以后，我得了九种疾病；我的肾、肺、胃（……）每天都在被折磨，精神上、心理上和身体上每天都在被折磨着（……）我只想早点死，其他什么都没想，我没有想过摆脱那里。我祈求真主尽快让我死去，我向它祈祷。我除了死不想别的，这是我最想要的。²¹³”

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那个房间里有 25 个人，我们只能并排着躺。有时五六个人睡不着，地方不够躺着睡。他们就站着，靠在墙上。没地方坐（……）教汉语歌，记错一个字就打你（……）早上九点，警察来了就打人。他们每天打十五到二十分钟。用警棍爱哪里就打哪里……我们已经被铁链子锁起来了，我们无法躲避（……）和田的集中营的情况很糟糕（……）我们住的小牢房里有二十五个人。我们一半人靠墙睡，一半人在木板上睡。我们的手脚都被锁住了（……）女性经常被殴打。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音。有用铁丝敲打的声音，女人在哭，我们都能听到她们的声音（……）我的胸口还因为酷刑而受了伤。出来后，我去了医院。我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有持续的炎症及炎症分泌物。²¹⁴”

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在我当教师的六个月期间，里面人们根本无能洗澡。他们甚至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上厕所。他们穿着灰色的衣服。它就像内衣，就像睡衣一样薄。他的脚和手上都有镣铐和锁链。他们脚上是一双鞋，分不清是不是黑色的薄鞋。（……）里面的人都染上了虱子（……）我们上课的时候，警察会过来，说出五六个人的名字，然后把他们带走。教室下方是审讯室。他们在那里审讯，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有叫喊声和尖叫声。他们遭受了严刑拷打（……）他们里被审讯的一些人没有回来（……）他们躺在地上，没有座位，他们坐着盯着墙壁，他们永远见不到太阳，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水（……）他们看起来都生病了一样。他们的情况非常不不好（……）他们给集中营里的人送两颗白色的药丸。隔段时间，他们会打针和抽血（……）人们越来越失去知觉。他们只是在呆滞的看着。他们开始忘记他们的亲人（……）新人的脸还好一些，而老的则是身体和面部变成病弱的状态（……）我还问过我认识的警察关于性虐待的问题。我有听到，那里有很多汉族警察。他们都想在女子集中营里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强奸妇女，用电棍折磨她们的肛门、嘴巴和耳朵。汉族警察想在这些集中营里工作（……）我无法忍受我在那里时看到的一切，我把一切都憋在心里，因此，我也生病了，因为我不能与任何人分享它（……）我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²¹⁵。

²¹³ 2021年3月24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 (Baktiali Nur) 的采访

²¹⁴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的采访

²¹⁵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奥马尔白克·阿利 (Omerbek Ali)：“由于我不接受他们的诽谤，他们的反应变得更加严厉，然后他们开始使用电棍。我也忍受了电棍，后来改用橡皮棍，他们让我坐在椅子上，一直打我。然后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们把我的手绑在天花板上，继续殴打我（……）一段时间后，他们用工具折磨我的生殖器和敏感的四肢让我感到很痛苦。之后，他们松手，将细细的针夹在指甲之间，继续折磨（……）一边折磨，一边侮辱（……）就在这时，隔壁牢房里传来一个女孩的尖叫：“杀了我吧！”她这样的乞求着。被贬低和羞辱是让我最痛苦的折磨（……）我身上有疤痕、肿胀和瘀伤。我身上还有裂痕。我身体的一些部位就像腐烂的肉一样（……）我在心理上受到了巨大压力，现在我告诉你这些，我又开始不舒服了（……）我被带到集中营之前是115公斤，我离开时只有60公斤。我在里面的八个月内减了这么多体重（……）那里面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智。在那里，我们的一个名叫迪力夏提·瑟提瓦尔迪 (Dilsat Setuvaldi) 的兄弟在酷刑中被殴打，因此他的肾脏受损，他甚至不能走路，他的尿液里有血，他们甚至没有给他治疗。我们的另一位朋友阿里木·阿吾德 (Alim Avud) 患有痔疮，他的肠子出来一英寸多，厕所在房间里，没有门的，四周没有任何东西，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看到了阿里木 (Alim) 的那种状态，即使那样他们也没有治疗他。²¹⁶”

3. 消除该团体的全部或部分物质存在，蓄意改变群体的生活条件

迄今为止，采访中听到的目击者证词的表明，“消除该团体的全部或部分物质存在，蓄意改变群体的生活条件”也是符合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危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被集体关押在集中营，被迫生活在不人道的条件下，许多被拘留者丧生。

在该地区的定居点周围建造了许多新的集中营、临时拘留中心和监狱。在同一个地方，用于此目的的建筑物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以及用于其他公共目的的建筑物也被改造成集中营了。集中营里面维吾尔人普遍遭受了巨大的身体伤害并失去生命的“新的生活条件”是由国家一手直接准备的。

塔碧瑟汗·玛鲁布刊 (Tabishan Marubkan)：“当我们被关押在那里时，集中营在几个月内就建成了。被转移到那里后，对我们的折磨更加严重了。他们通过在旧集中营旁边建造和扩大该集中营。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我三月份被关集中营，七个月后也就是十月份搬到新的集中营了”²¹⁷。

巴克提阿里·努尔 (Baktiali Nur)：“然后他们把我转移到了我所在县的集中营里（……）那里曾经是一所职业学校。他们还带走了建造那所学校并将其捐赠给国家的维吾尔商人，把他带去集中营了。²¹⁸”

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我们的城市（和田）有一所监狱，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说，和田监狱非常拥挤，所以把我带到这里（……）2014年之前，只有教师和宗教人士被逮捕，但后来（截至2014年）所有为维吾尔人动笔的人，无论是公务员还是知识分子，都被带走了（...）维吾尔人即将消失。许多维吾尔人丧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朋友、

²¹⁶ 2021年3月24日对奥马尔白克·阿利 (Omerbek Ali) 的采访

²¹⁷ 2021年5月14日对塔碧瑟汗·玛鲁布刊 (Tabishan Marubkan) 的采访

²¹⁸ 2021年3月24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 (Baktiali Nur) 的采访

亲戚在面临着什么。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和田县的一名官员跟我们讲话。现在的情况和之前的情况不太一样。如果你不按照我们说的去做，我们会做我们能做的一切。“我们会把你扔到垃圾堆里，”他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官员说道。²¹⁹”

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从3月1日到3月21日，我培训了97人。男性90人，女性7人。在3月21日之后的几天里，来到集中营里的人数有所增加。有7-8千人。当我进入时，我们不能直呼任何人的名字，因为他们都穿着相同的衣服。他们的脖子上写着数字。大约有8,000人（……）我们开始教学三个月后，我问他们是否要考试。他们只是记录了成绩，但没有给我试卷。这只是个形式。如果有人说，这是一个教育营，那只是是借口。这是彻底灭绝维吾尔人的集中营（……）妇女集中营是一座6层楼的建筑，没有阳台。一个牢房里有30-40名女性。我猜整个集中营应该有一万人。²²⁰”

奥马尔白克·阿利 (Omerbek Ali)：“当我第一次被带到那里时，大多数被带到那里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商人和富人。后来，受过宗教教育的，受人尊敬的人也开始被带进来了。再后来，各行各业（……）被带到集中营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我们的房间里住了50个人。我在那里的时候，听说我们附近会建一个新的集中营，会有1.5-2万人。²²¹”

4.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人口政策外，为防止维吾尔族人口增长；强制进行诸如绝育、插入宫内节育器、堕胎和服用扰乱月经周期的药物等做法都是有确凿证据的。事实上，由于这些强制措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大的两个维吾尔人聚居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在2015年至2018年间下降了84%²²²。在“文化变迁”、“结对认亲”等项目框架内，强迫维吾尔族妇女与汉族同居和结婚，是另一种属于“防止团体内生育”的做法。数百万名育龄年龄的维吾尔人在集中营被隔离，以及他们由于不卫生的条件不再能够生孩子的事实也应该在相同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证人陈述如下：

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他们在那么多人面前扒光了我，然后给我做了尿检。如果有人怀孕了，那里有一个房间，他们在那里立即做堕胎手术（……）他们每个月给我们吃两次药，他们每十天通过门上的小窗户给我们打针，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医生。所有女性，甚至是年轻女孩，都因为服用了药物而停了月经。²²³”

塔碧瑟汗·玛鲁布刊 (Tabishan Marubkan)：“说起来很遗憾，但我不得不说这一点，因为在集中营里得的性病，我无法和丈夫一起过性生活”²²⁴。

²¹⁹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的采访

²²⁰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²²¹ 2021年3月24日对奥马尔白克·阿利 (Omerbek Ali) 的采访

²²² 阿德里安·曾兹 (Adrian Zenz). (2020). 绝育、子宫里的节育器和强制生育控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生育的运动. 詹姆斯敦基金会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0年5月21日访问

²²³ 2021年4月26日对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的采访

²²⁴ 2021年5月14日对塔碧瑟汗·玛鲁布刊 (Tabishan Marubkan) 的采访

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有多生孩子的禁令。我们的两个孩子有登记的户口, 其他的是偷偷注册的。(……) 如果被发现, 有15000人民币的罚款。2016年出来的朋友说: 它是交了30,000元人民币。对公务员处 30,000 罚款, 对普通人以 处25,000 罚款。2016年后罚款金额涨到了8万。²²⁵”

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当时, 我看到了一个我认识的警察。我们低声说下午见。警官说, 那里的妇女经常被注射和服用药丸, 以便进行绝育和产生其他疾病。药物对一个女孩有了副作用。她的月经一个半月都没有停。最终那个女孩因失血而死亡(……) 所有年龄在18-59岁之间的女性都必须进行绝育手术。包括任何住在集中营里和外面的女人。这个手术是在2019年的5月份也对我进行了。没有做这个手术的女孩也被强行嫁给了汉人。就算没有生过孩子的, 也得做这个手术。生了孩子的, 也得做这个手术, 再也不想要孩子也得做(……) 手术过程中, 排着队, 我们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排成一排。都是18岁以上的年轻女孩。我等了四个小时才做手术, 因为排队的人很多。每个居住的社区都有卫生中心, 我在那里做的手术。我不知道集中营里的女人忍受了怎么样的痛苦。她们以50-100人为一组。一位年长的医生和一位护士一起对我进行了手术。他们打了一针, 我昏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 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这种绝育是绝对不可逆的。²²⁶”

奥马尔白克·阿利 (Omerbek Ali): “当我在集中营时, 我有一个朋友叫哈利姆 (Halim), 我在克拉玛依和他一起工作的, 他被判处五年徒刑, 我知道他被判后他们派人到他家做“结对认亲”项目。因为我哥哥也在市政府工作。我不想更详细地谈这个话题。²²⁷”

5.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除了防止维吾尔族人口增加的措施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把维吾尔儿童与其家人分开, 并将他们关押在国家控制的儿童集中营和寄宿学校等场所。孩子们在没有使用母语的情况下只能接受中文宣传教育, 并被剥夺了他们继承自己的文化的权利²²⁸。尤其是最近, 数十万名父母被送往集中营的儿童被国家转移到无法与家人联系的偏远地区, 与家人分离²²⁹。证人和被害人对此事的陈述如下:

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对我来说, 最困难的事情是那些分娩的妇女, 并在第二天从医院接出来。那个一天大的婴儿怎么样了? 那些妈妈有乳汁, 她们正在被用药物切断她们的乳汁。那件事让我非常难过。²³⁰”

²²⁵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的采访

²²⁶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²²⁷ 2021年3月24日对奥马尔白克·阿利 (Omerbek Ali) 的采访

²²⁸ 人权观察. (2019). 中国: 与家人失散的新疆儿童. 2019年9月15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²⁹ 阿德里安·曾兹 (Adrian Zenz). (2019). 断根: 中国在新疆开展亲子分离运动的证据. 政治风险杂志. 卷:7. No. 7. 2019年7月. 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³⁰ 2021年4月26日对古丽巴哈尔·杰利洛瓦 (Gulbahar Celilova) 的采访

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他们把孩子超生的孩子都带到了儿童集中营（……）2017年5月，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们判处我妻子九年（……）我从未收到过我孩子的消息。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我的孩子中最大的现在18岁，最小的现在10岁。一个女孩，六个男孩。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怎么了。我看了很多视频，想看看是否有我的孩子，但我找不到他们。²³¹”

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被带到这个集中营里的人的家人什么都不知道。父亲不知道儿子，儿子不知道父亲，没有人知道（……）在我教书的学校，那些父母被带到集中营而没有来上课的孩子会被带到“周期性教育营”里。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些学校是非常保密的。6至12岁的儿童总是被带走。我在教书的时候，名单就发过来了。列有这些孩子的姓名和信息的名单会送到学校。我们时不时去检查，他们多大了，他们有多少兄弟姐妹……当这些集中营还没建立的时候，我们经常去他们家检查他们。我从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中听说过，同一家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叔叔说“我来照顾这些孩子，交给我”，他们也会把那些孩子强行带到集中营。我不知道孩子们在那里要呆多久。只有真主知道”²³²。

B. 从犯罪的精神要素来看

在谈论种族灭绝罪时，构成犯罪物质要素的行为必须以“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民族、族群、种族或宗教团体”为目的。前标题中提到的所有受害者陈述都表明，这些行为是针对某个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和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讲突厥语的穆斯林人群体）的。事实上，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汉人或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的非汉人民族，如锡伯族等非穆斯林人口并未受到这些行为的影响²³³。将伊斯兰教信仰的自然方面定为刑事犯罪，例如祈祷和阅读古兰经²³⁴，是破坏维吾尔文化的历史遗产结构，也表明这些行为是有特殊意图的²³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4月发表了一系列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开始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极端主义根植于维吾尔社会，并提到对该地区人民进行数字化监控的必要性以及培养当地人提供教育的必要性。在此期间，习近平下令国家的新政策毫不犹豫地、坚定地使用武力，绝不留情，即使这些人（维吾尔人）被释放了也要继续进行

²³¹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的采访

²³² 2021年3月26日对喀丽比努尔·瑟迪克 (Kalbinur Sedik) 的采访

²³³ 有个叫锡伯族（满族血统）的民族。生活习惯与蒙古人类似，但他们说汉语，读汉字，那个民族从没有人被抓过。2021年4月10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 (Baktiali Nur) 的采访

²³⁴ “他们问，“你为什么出国？你在哈萨克斯坦有没有去过清真寺或与大胡子的人交谈？”我回答说，“我在那里做生意，我只去一个星期，我家在那里，我在那里还能做什么。”他们坚持要让我认罪（……）2013年后去清真寺的人压力很大，因为他们一直被审问他们，于是很少有人去清真寺。我是不去清真寺的。” 2021年4月10日对巴克提阿里·努尔 (Baktiali Nur) 的采访

²³⁵ “2013年，每一个村把那些读古兰经、去清真寺、去宗教学校、祈祷和尊敬读古兰经的人都记录在案。然后逮捕开始了（……）在和田市有二十座大清真寺。我们收到消息，只有两座清真寺仍然屹立不倒，其他所有的清真寺都被摧毁（2017年信息）（……）历史清真寺也被摧毁。还有300-400年历史的清真寺。柯子科巴扎尔 (Kizikbazar) 有个清真寺，他们也摧毁了它” 2021年4月6日对 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 (Abdulhaber Recep) 的采访。

“教育”和“改造”²³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按照主席的讲话和指示，要求全区安全部队做好“重磅”“打击”的准备，并在许多泄露给媒体的2017年发布的文件中多次下令“应收尽收”²³⁷。同样在2017年，位于该地区、人口几乎全是维吾尔人的莎车县在一次国家官员和安全部队集合在城市广场的露天集会上政府官员（中共书记）给予了指示，并说道，“要彻底摧毁他们（……）从根切除他们”²³⁸。作为集中营受害者的一名证人的以下陈述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采取行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或者确保安全：

“（……）当我们在监狱里时，和田区的一名官员与我们讲过。现在的情况和之前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不按照我们说的去做，我们会做我们能做的一切。他说“我们会把你扔进垃圾堆里”。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补充说道²³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策工作会议上表示，“贯彻落实，表明党的新时期治疆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新政所讨论的战略应该长期持续下去，并指示他包括党/国家官员的听众，把实施这一战略作为一项“政治使命”²⁴⁰。这份声明包含了所有为灭绝维吾尔人而实施并反映在证人声明中的做法，该声明是在2020年9月作出的。发表声明的时间表明，由国家首脑会议本身于2014年发起的新战略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击恐怖主义”或“提供安全”。

构成种族灭绝罪的行为；如果是由根据一国法律具有国家机构地位、经一国法律授权行使部分权力或在有效控制下行动的个人或政府机构所为，则责任归属于那个国家。旨在消灭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突厥人，特别是维吾尔族人的政策，是从国家最高层开始的分级和协调的指挥和指导链中实施的。因此，上述行为不可能归咎于第三方或国家控制之外的巧合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可能逃避其国际法律责任。因此，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行为，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的政策，构成种族灭绝罪，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家对此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

²³⁶ 奥斯汀·拉姆齐（Austin Ramzy）和克里斯·巴克雷（Chris Buckley）。（2019）。新疆文件—“绝无怜悯”：泄露文件揭露中国如何组织大规模拘留穆斯林。纽约时报，2019年11月16日。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³⁷ 奥斯汀·拉姆齐（Austin Ramzy）和克里斯·巴克雷（Chris Buckley）。（2019）。新疆文件—“绝无怜悯”：泄露文件揭露中国如何组织大规模拘留穆斯林。纽约时报，2019年11月16日。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³⁸ 奥斯汀·拉姆齐（Austin Ramzy）和克里斯·巴克雷（Chris Buckley）。（2019）。新疆文件—“绝无怜悯”：泄露文件揭露中国如何组织大规模拘留穆斯林。纽约时报，2019年11月16日。2021年5月21日访问

²³⁹ 2021年4月6日对阿布都勒哈拜尔·热杰普（Abdulhaber Recep）的采访

²⁴⁰ 王春翰。习近平表示，中国将继续努力同化新疆穆斯林。华尔街日报，2020年9月26日。2021年5月21日访问
详情请看：克里斯·巴克雷（Chris Buckley）。（2020）。中国主席习近平不理睬批评，称新疆的政策“完全正确”，《纽约时报》，2020年9月26日。2021年5月21日访问

11. 文献

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202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新疆的拘留网络辩护, 称“幸福”正在上升.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9-28/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uyghur-xinjiang-correct-happiness/12708930>

阿卜杜拉·阿尔·加哈维 (Abdullah Al-Ghadhawi). (2020). 叙利亚的维吾尔圣战分子, 新线战略与政治研究所. 2020年3月18日.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newlinesinstitute.org/uyghurs/uyghur-jihadists-in-syria/>.

阿德里安·曾兹 (Adrian Zenz). (2019). 集中营之外: 北京在新疆的强制劳动、扶贫和社会控制的长期计划. 政治风险杂志 7, No. 12. 2019.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jpolrisk.com/beyond-the-camps-beijings-long-term-scheme-of-coercive-labor-poverty-alleviation-and-social-control-in-xinjiang/#_ftnref9

阿德里安·曾兹 (Adrian Zenz). (2019). 断根: 中国在新疆开展亲子分离运动的证据. 政治风险杂志. 卷:7. No. 7. 2019年7月.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jpolrisk.com/break-their-roots-evidence-for-chinas-parent-child-separation-campaign-in-xinjiang/>.

阿德里安·曾兹 (Adrian Zenz). (2020). 绝育、子宫里的节育器和强制生育控制: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生育的运动. 詹姆斯敦基金会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0年6月 (2020年7月21日更新). 2020年5月21日访问

<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Zenz-Sterilizations-IUDs-and-Mandatory-Birth-Control-FINAL-27June.pdf?x71937>.

阿德里安·曾兹 (Adrian Zenz). (2018). “彻底改造他们, 使他们养成健康的心态”: 中国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运动. 中亚调查, (2018): 12.

阿德里安·曾兹 (Adrian Zenz). (2018). “彻底改造他们, 使他们养成健康的心态”: 中国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运动. 中亚调查, (2018): 1-27.

安德鲁·查茨基 (Andrew Chatzky) 和詹姆斯·麦克布莱德 (James McBride). (2020). “中国的大规模道路倡议”, 对外关系委员会. 2020年1月28日.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s-massive-belt-and-road-initiative>.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2020). 维吾尔人在被出售：新疆以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视.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aspi.org.au/report/uyghurs-sale.](https://www.aspi.org.au/report/uyghurs-sale)

奥斯汀·拉姆齐 (Austin Ramzy) 和克里斯·巴克雷 (Chris Buckley). (2019). 新疆文件—“绝无怜悯”：泄露文件揭露中国如何组织大规模拘留穆斯林. 纽约时报, 2019年11月16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1/16/world/asia/china-xinjiang-documents.html>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 (2014). 中国停止摘取死刑犯的器官.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032444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 中国“思想转化”营内部. (2019). YouTube.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Id2ZP3h0c>

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之声. 中国被指控对数百万维吾尔人进行残酷镇压.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bbc.co.uk/sounds/play/p06gcp5t>

本·布兰查德 (Ben Blanchard) 和迈克尔·玛蒂娜 (Michael Martina). (2015). 巴黎之后，中国呼吁世界支持新疆，路透社. 2015年11月15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rance-shooting-china/after-paris-china-calls-for-worlds-support-in-xinjiang-idUSKCN0T506K20151116>

本·韦斯科特 (Ben Westcott). (2019). 中国否认有“集中营”，告诉美国“停止干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19年5月6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cnn.com/2019/05/06/asia/china-us-xinjiang-concentration-camps-intl>

“一带一路” (BRI) 倡议.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beltroad-initiative.com/belt-and-road/>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2020). 阿迪达斯的回应.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adidas-response-4/>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2020). 宝马的回应. 2021年5月24访问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bmws-response/>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2020). 耐克的回应. 2021年5月24访问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nikes-response/>

凯瑟琳·普茨 (Catherine Putz). (2018). 为什么中国会帮助阿富汗在巴达赫尚建立军事基地?. 外交官杂志. 2018年1月5日.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why-would-china-help-build-an-afghan-military-base-in-badakhshan/>.

中国日报. (2015). 新疆伊宁县开展“去极端化”教育. 2021年5月16日访问.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827151028/http://xj.people.com.cn/n/2015/0114/c188514-23545423.html>

王春翰 (Chun Han Wong). 习近平表示, 中国将继续努力同化新疆穆斯林. 华尔街日报, 2020年9月26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wsj.com/articles/xi-says-china-will-continue-efforts-to-assimilate-muslims-in-xinjiang-11601133450?mod=searchresults&page=1&pos=1>

详情请看: 克里斯·巴克利 (Chris Buckley). (2020). 中国主席习近平不理睬批评, 称新疆的政策“完全正确”, 《纽约时报》, 2020年9月26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26/world/asia/xi-jinping-china-xinjiang.html>.

达拉格 (Daraj). 2020年6月25日, 中国如何出售从维吾尔族穆斯林囚犯身上提取的“清真器官”? 2021年5月27日访问

<https://daraj.com/49104/>

达伦·拜勒 (Darren Byler). (2021). 新丝绸之路的中国人口管理设施: 论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 2021年3月/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2020-21-wilson-china-fellowship-essays-rise-china-and-its-implications>.

德国之声 (DW)。(2021)。因跟踪新疆事件而被指控为女叛徒的许秀中 (Vicy Xu) 表示, 永远不会放弃。2021年5月27日访问

<https://www.dw.com/zh/%E5%85%B3%E6%B3%A8%E6%96%B0%E7%96%86%E9%81%AD%E6%8C%87%E5%A5%B3%E6%B1%89%E5%A5%B8-%E8%AE%B8%E7%A7%80%E4%B8%AD%E7%A7%B0%E7%9F%A2%E5%BF%97%E4%B8%8D%E6%B8%9D/a-57106094>

伊丽莎白·罗森塔尔 (Elisabeth Rosenthal)。(2001)。联合国官员担心中国将反恐战争作为镇压的借口。纽约时报, 2001年11月10日。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nytimes.com/2001/11/10/world/un-official-fears-china-uses-terror-war-as-front-for-abuses.html>

国际劳工组织 (ILO)。(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2017年3月30日。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4.detail?p_lang=en&p_isn=103954&p_country=CHN&p_count=1189

国际劳工组织 (ILO)。C029 —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 (第 29 号)。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12100:P12100_INSTRUMENT_ID:312174:NO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2002)。“东突厥斯坦”恐怖势力无法逍遥法外。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xw/t34101.htm>

弗格斯·瑞恩 (Fergus Ryan)、丹妮尔·凯夫 (Danielle Cave) 和 内森·鲁瑟 (Nathan Ruser)。(2018)。绘制的新疆“再教育”营地图。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aspi.org.au/report/mapping-xinjiangs-re-education-camps>

健康欧洲 (Health Europa)。(2020)。强制摘取器官：“我要去中国，他们正在枪毙我的捐赠者”。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healtheuropa.eu/im-going-to-china-theyre-shooting-my-donor/97063/>

人权观察。(2019)。中国：与家人失散的新疆儿童。2019年9月15日。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hrw.org/news/2019/09/15/china-xinjiang-children-separated-families>.

人权观察. (2018). “消灭意识形态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运动. 2018年9月.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china0918_web.pdf

国际法庭. (200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一案, 2007年2月26日. 第242页, 第373页.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91/091-20070226-JUD-01-00-EN.pdf>.

国际法庭. (1996).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 1996年7月11日. 第31页.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91/091-19960711-JUD-01-00-EN.pdf>

国际法庭. (1951). 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咨询意见)的保留. 第12页. 1951年5月28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12/012-19510528-ADV-01-00-EN.pdf>.

国际法庭. (2020). 冈比亚诉缅甸, 2020年1月23日.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178/178-20200123-ORD-01-00-EN.pdf>.

国际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icc-cpi.int/resource-library/official-journal/rome-statute.aspx>

国际法委员会. (2001).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第 4、5、7、8 条.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draft_articles/9_6_2001.pdf.

维吾尔国际支持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Uyghurs). 维吾尔活摘器官.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isupportuyghurs.org/en/genocide/organ-harvesting>

伊朗国际. (2021). 伊朗人厌倦了与中国达成保密协议—官员们保持沉默.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iranintl.com/en/world/iranians-weary-secrecy-around-pact-china-officials-remain-silent>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2015). 监狱里的领袖伊力哈木·土赫提—我的道路和我的目标: 维吾尔突厥人和中国问题, 希拉 (Şira) 出版社. 2015年9月. 哈米提·格克图尔克 (Hamit Gökçürk) 编译, 第85页, 第235页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2014).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的讲话. (RFA维吾尔频道). 2014年1月31日。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2013). 美国之音: 中文电视记者董方的采访. 2013年11月7日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2009). 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座. 2009年10月29日

袁敬东. (2011). 阿拉伯之春与中国不断演变的中东政策. 世界政治评论. 2011年12月20日.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0992/the-arab-spring-and-chinas-evolving-middle-east-policy>

约翰·陈 (John Chan). (2020). 报告显示新疆棉业强迫劳动的规模. 中国数字时代. 2020年12月15日.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0/12/new-report-exposes-vast-scale-of-forced-labor-in-xinjiang-cotton-industry/>

约翰·萨德沃思 (John Sudworth). (2020). 中国的“污染”棉花. BBC. 2020年12月.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ww.bbc.co.uk/news/extra/nz0g306v8c/china-tainted-cotton>

洛普县政府. (2015). 自治州对我县去极端化工作进行绩效评估. 2015年11月21日. 2021年5月24日访问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827145214/http://sl.loulannews.com/a/yiliaojiaoyu/20151121/4080.html>

玛丽娅·特瑞达尼尔 (Marie Tredaniel) 和 朴K. 李 (Pak K. Lee). (2017). 解释新疆“恐怖主义”暴力的中国框架: 来自安全化理论的见解. 民族文集 46. No.1 (2017): 13.

娜塔莉亚·麦克帕特兰 (Natalya McPartland.). (2021). 美国的强制绝育违反国际法. 人权脉搏.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humanrightspulse.com/mastercontentblog/forced-sterilisations-in-the-us-contravene-international-law#:~:text=FORCED%20STERILISATION%20BREACHES%20INTERNATIONAL%20LAW,crime%20and%20crime%20against%20humani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01). 江泽民主席通过电报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 并与布什总统通电话, 表明中方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chnun.chinamission.org.cn/eng/chinaandun/securitycouncil/thematicissues/counterterrorism/t2690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01). “东突厥斯坦”组织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与奥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的联系.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fmprc.gov.cn/ce/ceun/eng/zf/fk/t28937.htm>

自由亚洲. (2021). 沈阳居民李霖发布新疆信息遭“煽颠罪”判刑 关押三年仍戴脚镣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7-02232021113025.html>

特德·罗伯特·格尔 (Ted Robert Gurr). (1970). 人们为何造反,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0年

国际法委员会. (2021).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legal.un.org/ilc/.](https://legal.un.org/ilc/)

联合国条约集, “条约状态.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1&chapter=4#7.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1999).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2(a).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undocs.org/E/CN.4/1999/68/Add.4>

联合国大会. (2946). 种族灭绝罪. 1946年12月11日, A/RES/96.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b00f09753.html>.

联合国安理会. (2009). 关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决议. 2021年5月14日访问.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sanctions/1267/aq_sanctions_list/summaries/entity/eastern-turkistan-islamic-movement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05). 联合国难民署关于基于强制性计划生育法律或政策的难民申请的说明.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refworld.org/pdfid/4301a9184.pdf>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1980).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155/volume-1155-i-18232-english.pdf>

单伟 (SHAN Wei) (音译) 和陈刚 (CHEN Gang) (音译). (2009). 乌鲁木齐暴动与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 东亚政策, (2009): 15.

华尔街日报. (2016). 中国人体器官摘取的噩梦. 2021年5月21日访问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nightmare-of-human-organ-harvesting-in-china-11549411056>



İYİ Parti Genel Merkezi
Mustafa Kemal Mh., 2120. Cd., No:9 Çankaya/Ankara
0312 408 08 08